



4

ZHANHOUGUO ZHONGDASHIJI ANJISHI

●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

严寒扼杀 “布拉格之春”

——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始末

● 曹宏 著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5 4549 8

★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丛书

严寒扼杀“布拉格之春”

——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始末

● 曹 宏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7年12月，捷共正统派领导人诺沃提尼（左）在布拉格与秘密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交谈。



1968年1月，杜布切克接替诺沃提尼，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

民族英雄斯沃博达（左）与杜布切克相互祝酒。1968年3月底，斯沃博达接替诺沃提尼，担任捷克斯洛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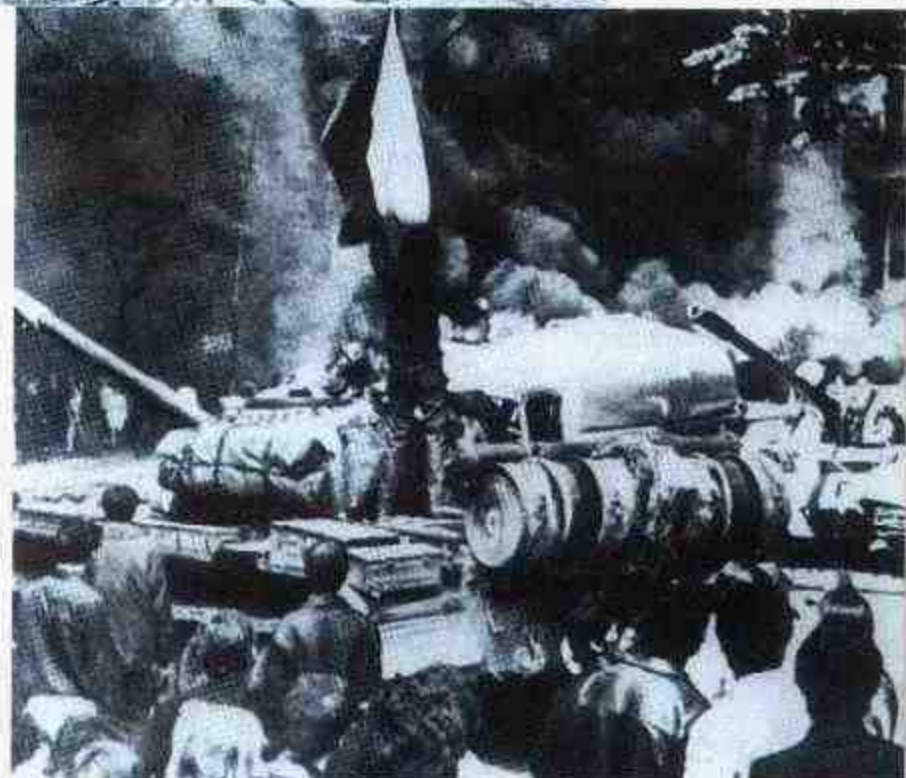
自1968年6月起，苏联及华沙条约国的部队举行了多次针对捷克的军事演习。

敢于向莫斯科挑战而闻名世界的南斯拉夫总统（右）访问捷克在机场受到托布切克的欢迎。

1968年8月9—10日，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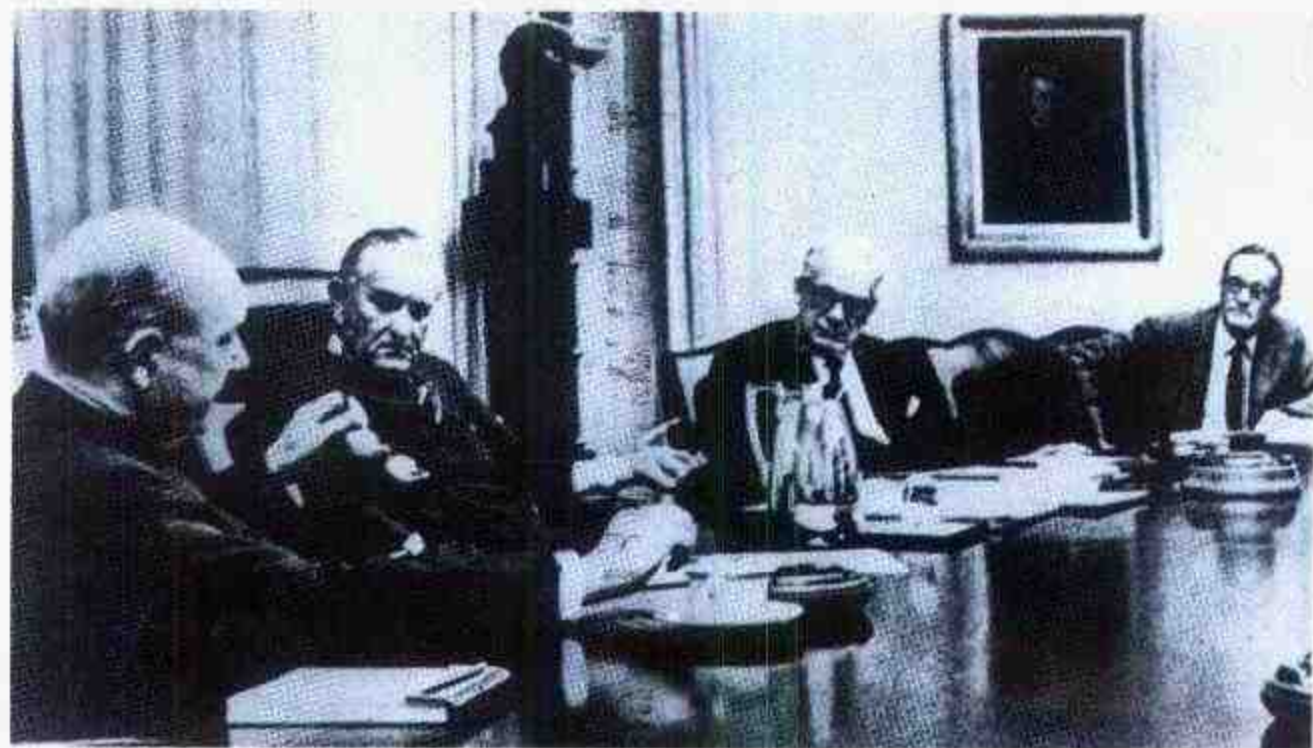
8月20日深夜，苏联及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的部队开始入侵捷克领土。苏联装甲部队在布拉格市区遭到市民的阻挡。



学生们站在苏军坦克上挥舞着捷克国旗



布拉格的市民们乘车上街，表示对杜布切克政府的支持。



美国总统约翰逊与高级助手们会商，要求苏联及其盟国从捷克撤军，并决定暂停发表关于约翰逊访苏和举行技术性核谈判的公告。

勃列日涅夫被迫与来访的捷克总统斯沃博达商讨释放被捕的杜布切克等人的问题。



目 录

引 子 截然不同的两次出兵	1
---------------------	---

第一章 历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

● 工业发达的中欧古国	7
● 慕尼黑绥靖政策的牺牲品	10
● 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19

第二章 艰难曲折的改革之路

● 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25
● 诺沃提尼的政变阴谋及其垮台	33
● 杜布切克与“入道的社会主义”	39

第三章 “布拉格之春”

● 剧烈动荡的国内局势	46
-------------------	----

● 控制局势与德累斯顿会议	52
● 四月中央全会和《行动纲领》	57
第四章 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寒流	
● 捷苏两国领导人的莫斯科会谈	65
● 对于苏联军事入侵的种种猜测	72
● 格列奇科和柯西金来访	75
● 华约部队军事演习	80
第五章 杜布切克说：“不！”	
● 杜布切克拒绝出席华沙会议	90
● 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	95
● 铁托访捷与乌布利希的“黑信”	109
第六章 突如其来的闪击入侵	
● 克里姆林宫入侵决策的前前后后	115
● 军事突袭的成功与政治上的失算	124
● 从“座上宾”到“阶下囚”	136
第七章 捷克斯洛伐克的抗争	
● 不屈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146
● 政治家们的顽强抗争	152
● 契尔沃年科的连续惨败	159

第八章 “有限主权论”与城下之盟

- 斯沃博达：“我去把杜布切克要回来！”
..... 167
- “不签字就别想离开克里姆林宫！” 175
- 勃列日涅夫大谈“有限主权论” 187
- 在屈辱条约上签字画押 195

第九章 入侵引起的反响及恶果

- 勃列日涅夫坐到了刺刀尖上 205
- “布拉格之春”的结局及其领导人
的命运 215
- 苏军入侵埋下的祸根 225

引 子

截然不同的两次出兵

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

在它实际存在的 70 个年头中，曾经两次遭到外国军队的占领。一次是它的西面邻国，昔日的纳粹德国军队；一次是它的东面邻国，昔日的苏联红军。苏联红军的坦克曾先后两次出现在它的首都——布拉格的街头。而这两次的情景却是如此的不同。

1945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清晨，6 年来一直在纳粹德国铁蹄蹂躏下的布拉格市，突如其来地响起了枪炮声和呐喊声。原来，布拉格人民在苏联红军从东面、美军从西面步步逼近的胜利鼓舞下，再也抑制不住对解放的渴求，终于在这一天爆发了反对德国占领军的武装大起义。起义者们在街头筑起了 1600 多个街垒，并向龟缩在布拉格城中的德国驻军发起了攻击。

驻布拉格德军立刻对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德军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无情地冲撞着街垒和碾压着起义者。位于伏尔塔瓦河左岸高地上的德军大炮轰鸣着，炮弹雨点般地飞过河面，落在布拉格的巴黎大街和老城广场上。15 世纪建造的市政大楼被炮弹直接击中。起义者凭借着重重街垒，同

占绝对优势的德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起义者抢占了布拉格电台，通过电台呼吁各地人民发动起义，支援首都。捷克斯洛伐克各大中城市纷纷响应，加入了全国总起义的洪流。

正当人民起义进行的时候，5月7日凌晨，德国最高司令部在法国的兰斯签署了向盟国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文件。该文件规定，一切敌对行动应于5月8日午夜停止。但是，正在从东向西退逃的纳粹部队仍想控制布拉格，驻在附近的一个党卫军师也被召来镇压起义及掩护驻军的撤退。德国人的想法是尽可能保住经布拉格的通道，逃往西面。对于难逃俘虏噩运的德军来说，他们宁可投降美军，也不愿当苏军或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俘虏。

布拉格的解放者究竟由谁来充当，这在当时是个十分微妙的国际问题。

就当时军事形势而言，美军解放布拉格的可能性要比苏联大得多。5月6日凌晨，正准备向南攻入奥地利的艾森豪威尔麾下的美军第3集团军左翼部队，已经挺进到布拉格以南的卡罗维发利——比尔森——捷克—布杰约维策一线。此时，第3集团军指挥官巴顿将军只要愿意，他的坦克部队只需两个小时便可开抵布拉格城下。在德军不愿恋战、军心涣散的情况下，布拉格城对于美军来说，真算得上是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而位于东面的苏联红军，此时距离布拉格却还有着整整三天的路程。

比尔森市的人民热烈欢迎盟军的到来，并且希望美军能立刻向北挺进，去援助正在布拉格鏖战的起义军。领导比尔森起义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塔斯在1968年曾回忆说：

美国人到了我们这里，布拉格的起义者仍在呼救。我

和我们国外部队的联络官西特克中校一块请求魏尔凯将军（归属第3集团军指挥的美军第1军第2师副师长）援助。魏尔凯将军表示他无权单独决定任何问题，但他答应电告在纽伦堡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电说我们得等到早晨4点……早晨4点，艾森豪威尔不同意去那里作战，关于布拉格的问题已另有决定……

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另有决定”，指的就是美苏两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关于战后东欧诸国将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默契。但不知英国首相丘吉尔是真不了解这一内幕还是不愿承认这一决定，总之，他在战后所写的《胜利和悲剧》一书中回忆说：他、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曾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过一项协议，“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谁先到谁就可以夺取”。而照4月下旬的形势来看，美国入抢先解放布拉格是有充分把握的。

丘吉尔自然很想让捷克斯洛伐克首都落入西方手中，从而取得对该国未来新政府的干预权。4月30日，他在给刚刚接替病故的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的信中写道：“毋庸置疑，由贵国军队解放布拉格以及尽可能多地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领土，会使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大为改观，并会对邻近国家产生很大影响。相反，如果西方盟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不起重大作用，那么，这个国家将走南斯拉夫的道路。”

可是，已经单独解放了东欧和中欧诸国的苏联，却不愿意与美军共同分享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利。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立刻对于美第3集团军企图推进到伏尔塔瓦河和布拉格的想法“作出了强烈反应”。杜鲁门总统迫于苏方

的压力，要求艾森豪威尔不要去激怒强大的苏联人。

但不知是巴顿将军自己萌生了扩大战果的念头，不肯轻易放弃布拉格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还是出于比尔森等地捷克人的强烈吁请，总之他于5月7日秘密派出特使，向新成立的领导起义的捷克民族委员会提出，美国装甲部队可于5月8日凌晨进入布拉格。不过特使又解释说，由于极端微妙的政治局势，此举只有在得到捷克民族委员会的邀请后，才有可能实施。

当时接见美军特使的正好是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34岁的捷克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斯姆尔科夫斯基拒绝了巴顿将军的请求。他对美军特使说道，虽然苏联红军离布拉格还有一整天的路程，但是布拉格的捷克人宁愿让苏联人解放，而不愿被美国人解放。1967年，斯姆尔科夫斯基曾在一次公开集会上解释说，他当时拒绝巴顿的建议，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美军的占领会影响到共产党对捷克斯洛伐克将来的计划。而对于这一点，比尔森的低级共产党人显然没有考虑到。

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是捷克民族委员发言人。他的态度最终剥夺了美军扮演布拉格解放者的企望。于是，直指柏林的四路苏联大军中最南翼的依·科涅夫元帅所统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于5月9日凌晨进入了布拉格。

对于布拉格的广大市民来说，他们所渴望的只是能早日从德国法西斯奴役下获得解放，尽快结束长达6年之久的被奴役的生活。他们既不会去考虑究竟是由美军还是由苏联红军来解放自己，更没有想到在这种选择后面，竟然有着如此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

如同一切被解放的城市一样，布拉格人民对于首先出现

的苏军坦克部队表现出了无比的热情。首都布拉格顿时化作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人们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开入城中的苏联红军，邻街的楼房阳台上和窗口也都站满了挥动着手臂的市民。欢呼的人群在街道上包围了作为解放者的苏联红军。坦克上撒满了鲜花，红军战士的钢盔上也被套上了树枝做成的桂冠。

布拉格市民的代表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用面包和盐欢迎解放者。小孩们高兴地爬到坦克顶上，安详地坐在苏联红军战士们的怀中。一些勇敢的姑娘也爬到坦克上，热烈拥抱和亲吻着满面灰尘的红军战士，表达着发自内心的感激和崇敬之情。欢喜若狂的布拉格市民在大街上尽情地唱歌跳舞，彻夜不停。

布拉格市民及所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将永远记住这一天，是英勇的苏联红军把他们从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了出来。布拉格人在斯米霍夫区斯捷班尼克兵营前建起了一座石台，并将第一辆开进布拉格的苏军坦克永远地陈列在上面，以表对苏联红军的永久的致谢和敬意。之后每年的5月9日，布拉格人都要举行隆重的集会，庆祝苏军解放布拉格周年纪念。这一天，也被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定为国庆日。

时间转瞬间过去了23年。1968年8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熟睡之中的布拉格市民突然被飞机轰鸣声和坦克隆隆声震醒。苏军坦克部队及伞兵部队在一夜之间，涌进并占领了这座古都乃至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布拉格市民以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都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然入侵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举动震惊了。而且这个入侵者不是他人，竟是他们一直极为尊重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当苏军坦克23年后再度开进布拉格时，所打出的依然是

“解放者”的旗号。它们声称这次出兵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前来帮助镇压“反革命”和抵御西方入侵的。但当时正热心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任何反革命威胁；而且从始至终，也不曾有任何一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承认向苏联政府发出过这种“邀请”！

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老大哥”！这就是曾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敬佩和崇拜了20余年之久的“解放者”！苏军的入侵之举，将保留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心中的所有的美好东西，在一夜之间便击得粉碎。

不仅如此，它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想起了30年前对布拉格的另一次占领。1939年3月15日，他们含着同样悲痛的眼泪、举着同样愤怒的拳头，面对过纳粹的带有卐标志的坦克。

如果说，1945年5月苏联红军的坦克开进布拉格，标志着正义最终能够战胜邪恶的话，那么1968年夏天苏联军队的坦克再次兵临布拉格城，就只能算是对一个主权国家最粗暴、最无耻的干涉了！

苏联政府为什么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这次武装入侵？其政治背景和复杂的决策内幕又是什么？这次成功的军事突袭是如何实施的？入侵发生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政府作出了哪些反应？入侵最终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些正是本书想给以回答和介绍的内容。

第 一 章

历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

● 工业发达的中欧古国

捷克斯洛伐克曾是一个位于中欧的内陆国家，国土面积 12.78 万平方公里。其版图东西长、南北窄，中腹细、两头尖，像一头雄狮俯卧于欧洲中部。捷克斯洛伐克北面与波兰有着最长的边境线，西面如同一把三角铲插入当时的东德和西德，南边自西向东依次与奥地利、匈牙利接壤，东面与苏联接壤。由于它位于中欧腹地，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了欧洲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

捷克斯洛伐克整个国家自西向东，依次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三个地区组成。全国人口约有 1550 万，主要人口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属于两个非常接近的西斯拉夫民族。捷克人的故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64%；斯洛伐克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斯洛伐克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30%；其余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等少数民族。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是该国的官方语言，首都设在波希米亚中心的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多山的国家。波希米亚整个地形为高原盘地。最古老的捷克编年史家科斯马斯在 12 世纪初叶曾这

样写道：波希米亚“四周环山，形成这个国家的疆界，乍看起来宛若由一个连亘不断的山脉包围起来……说来奇怪，这里四周全无河川流入境内，而所有大小溪流完全注入一条大河，名为易北河，经此而注入北海，由此可见全境位置之高。”位于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之间的摩拉维亚，其东、北、西三方也都环绕着丛山峻岭，只有南疆是开阔的摩拉瓦河沿岸的多瑙河盆地，其中哈纳一带则是欧洲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而位于东陲且一直延伸到乌克兰民族居住地的斯洛伐克，则更是被喀尔巴阡山脉横贯境内，全境只有西南一小部分属于多瑙河平原盆地。

早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就有原始人类开始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定居下来。草木茂盛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为动物栖身的良好场所。于是，越来越多的以狩猎为生的原始人类，在成群结队的漂泊中被吸引到这里。到公元700—1000年，摩拉维亚已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大部落。9世纪到10世纪初，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斯拉夫人建立了大摩拉维亚国。以后，捷克地区形成了捷克王国，位于伏尔塔瓦河畔的首都——布拉格，成为闻名的文化和商业中心。斯洛伐克则属于匈牙利。自17世纪初叶起，捷克也丧失了独立，和斯洛伐克一起分别隶属于奥匈帝国的奥地利和匈牙利。

多山的国家显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山区的矿产资源和丰富的水利资源，却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矿物有煤、褐煤、铀、铁、铅等。早在1680—1781年间，以纺织和玻璃制造业为主的捷克工场手工业就步入了惊人的发展时期。纺织工业的发展始于波希米亚北部克尔科诺什山（巨山）和克鲁什涅山（矿山）的山麓地带，山间的水流给最初的机器提供了丰富的水力。玻璃工业则是在

波希米亚北部发现晶体矿之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此奠定了波希米亚的世界声誉。到18世纪上半叶，波希米亚玻璃取代威尼斯玻璃，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19世纪初，捷克地区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过程。从工场手工业到大规模工厂生产的过渡，首先开始于纺织品生产。之后，随着蒸汽机的传入，食品工业和重工业也开始转入工厂生产。新兴资产阶级兴办的工厂最终取代了贵族们所拥有的手工业。19世纪下半叶，捷克地方的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特征是机械工业的发展越来越超过了纺织工业，捷克也随之成为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

大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兴阶级及广大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越来越不能忍受奥匈帝国的专制统治，在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的激励下，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长期的争取民族独立斗争。1918年10月28日，随着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崩溃，资产阶级的捷克民族委员会即以新的国家的名义接收了政权。在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同样组成一个斯洛伐克民族会议，会议于1918年10月30日在马丁召集，并宣布斯洛伐克同捷克合并。

捷克斯洛伐克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消息使西方大国极为吃惊，但又不得不面对这一既成事实。中断了3个世纪的捷克不仅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斯洛伐克也加入了进来。从此，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这两个西斯拉夫民族开始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这一合并增强了国家实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民族问题。

独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成为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10位，主要以生产拖拉机、发电

机、汽车、飞机、船舶、车床等机械制造闻名于世。此外，钢铁和化学等部门，制鞋、啤酒酿造业也同样著名。

● 慕尼黑绥靖政策的牺牲品

1934年，纳粹党执掌德国政权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独立开始受到了威胁。当希特勒于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已经陷入德军的腹背夹击的态势之中。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先利用这一有利态势拿下欧洲战略要地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再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北进基地，配合东西普鲁士夹击波兰。因此早在1937年6月（即吞并奥地利之前），德军总参谋部就制定了193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突然袭击的秘密行动计划，代号为“绿色方案”。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奥匈帝国中独立出来的国家。在其西北部的苏台德地区，居住着325万日尔曼人。当纳粹病毒从德国传入了这一地区后，当地的法西斯分子亨莱茵等人于1933年成立了“苏台德日尔曼人党”，要求并入德国，演变成为希特勒侵捷的内应。纳粹德国外交部一直在秘密资助着“苏台德日尔曼人党”的活动，为希特勒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寻找着借口。

193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情报部门均得到可靠消息，德国4个摩托化师已集结于德国一侧，并已做好侵捷准备。5月20日下午，捷克斯洛伐克内阁在贝奈斯总统的主持下，在布拉格城堡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实行部分动员，做好迎击德军的入侵的准备。

由于捷方显示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和强烈的抵抗侵略的决

心,加之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德国不得不对外宣称,关于德军在捷边境集结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但根据战后缴获德国总参谋部成员哈尔德将军的文件可以看出,当时希特勒是因为考虑到德军实力还不够强大,尚不足以击败防御设施坚固、装备精良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才放弃实施“绿色方案”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军入侵的危机却并没有过去。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盟友的英、法两国,此刻正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它们一心想把纳粹德国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去吞噬掉当时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满足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愿望,则正好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于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和换取本国的“和平”,英、法两国决定不惜牺牲自己的盟友了。这便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

1938年8月3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派遣伦西曼伯爵,去捷克斯洛伐克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名曰“应捷克斯洛伐克请求”,实际上却是奉张伯伦的旨意去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伦西曼在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疲于奔命,满口答应苏台德人的“回归”德国的要求,竭力将苏台德人的这一要求强加给布拉格政府。

而与伦西曼舌枪唇剑相配合的,则是希特勒再次捡起了“绿色方案”。在新方案的头条中醒目地写道:“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所谓“最近”,是指希特勒在命令中说的“最迟到1938年10月1日能够付诸执行”。德国在8月份动员了10万军队进行军事演习,德国飞机则不断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空进行骚扰。

希特勒还在暗中与匈牙利霍尔蒂政府相勾结,鼓动他们说:“匈牙利若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就必须尽快

采取行动。谁要想赴宴，至少得先帮一下厨。”而当时的波兰政府也一直紧随着希特勒。1938年整个夏天，德国驻华沙大使冯·毛奇都在向柏林报告说：波兰不但不会让苏联假道波兰援捷，而且波兰对捷克也表示出了强烈的占有欲望。

希特勒为了进一步制造声势和迫使西方大国让步，8月23日又在基尔军港举行了一次旨在炫耀军事实力的演习，并特意邀请各国驻德武官参观。果然，法国空军参谋长在观看过德国飞机表演后惊呼道：“如果在9月底就打仗，法国空军一定会一败涂地，甚至连一架飞机都不会剩下！”

希特勒乘机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进行恫吓，一方面又于9月中旬试探着邀请张伯伦访德，以便就苏台德问题举行会晤。

张伯伦，这位年近七旬的大英帝国的主宰人，一生从未坐过飞机。但他接到邀请信后，为了向希特勒乞求和平，竟平生首次乘坐飞机飞行7小时，屈尊俯就地来到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参加会晤。难怪当希特勒接到张伯伦同意前来的电报后，不禁欣喜若狂地惊呼道：“我的天哪，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英国政府的软弱态度促使德方在会谈中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希特勒在会谈中毫无商量余地地叫喊道：

“不论用什么方法，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300万日耳曼人都须重返祖国。我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一千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我今年49岁，如果德国为捷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我准备牺牲我壮盛之年的全部精力领导德国度过危机……当然，如果因此而引起大战，我将表示遗憾。不过这种危险不会使我的信心有任何动摇……我已做好了战争准备，甚至是世界大

战。其他国家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决不会后退一步。”

张伯伦则拱手相送：“我可以代表个人说，我承认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我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我个人的态度，并努力促其批准。”

希特勒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之后又假惺惺地作出保证：“如果满足德国对捷克的要求，它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协议。”而这位英国首相对于希特勒的谎言竟然信以为真。张伯伦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说：“虽然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后可以令人相信的人。”

随后，英、法两国政府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并于9月19日联合照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捷将苏台德区交给德国，其他日耳曼居民杂居区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决定。英国政府还向捷政府承诺，在捷割让了上述领土后，英国将参加对捷新疆界提供的“国际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拒绝了这份照会，但在英、法的强大压力下，最终决定接受照会的要求。

9月22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携英、法方案飞赴德国戈德斯堡，与希特勒举行双边会晤。人们翘首以待，战争还是和平？

当希特勒听完张伯伦所讲的方案后问道：“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德国？”

“是的！”张伯伦做了肯定的回答。

“但我得说声抱歉。由于过去几天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变成了废纸。”希特勒冷笑道。此刻他对于英、法方案已经不感兴趣了。

第二天，即9月23日，希特勒以备忘录形式又向张伯伦提出了新的要求，史称《戈德斯堡备忘录》。《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当年10月1日之前，从苏台德区撤走其全部军政官员；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凡日耳曼居民占50%以上的地区由德国实行军事占领；日耳曼人不占多数的地区通过投票决定归属；投票应于同年11月25日之前举行。

尽管这些要求大大出乎张伯伦预料之外，但他仍表示将向捷方转达德国这些新的要求。张伯伦希望德国在他进行协调时，不对苏台德区采取军事行动，并提出希特勒应做出两点保证：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将是其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保证英、德友好。希特勒对此表示同意。

然而，这个《戈德斯堡备忘录》不仅遭到英国部分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于9月25日拒绝了这一欺人太甚的要求，并在全 国征召入伍者近100万人，准备抵抗德国入侵。

9月26日，希特勒向捷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定捷必须于9月28日（星期三）下午2时之前，就是否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作出正式答复。27日下午，希特勒发出命令，令21个加强团（7个师）组成的突袭部队，从训练区转入捷克边境的出击点。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法国也开始了针对德国的军事动员。战争已迫在眉睫。故西欧舆论将1938年9月28日称为“黑色星期三”。

尽管英、法两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有互助同盟条约，不能不故作强硬地宣布了局部军事动员，但英、法两国领导人并不想为一个小小的捷克斯洛伐克而卷入一场欧洲大战。希特勒抓住了英、法两国的软弱可欺，于9月28日下午2时前12分钟，致电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政府，建议于次日与德国在巴伐利亚的慕尼黑举行四国首脑会晤，商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慕尼黑是奥地利的一座城市。它对于希特勒来说意味着奇耻大辱。15年前，他就是因为在这里的一家啤酒馆发动军事政变而被关进了监狱。因此，这次他特意选择了这座城市作为欧洲四大国首脑会晤的地点，希望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在这里迎接欧洲三个大国的首脑，挽回15年前丢尽的脸面。

那天一大早，希特勒就到德奥边境去迎接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在驶往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指着地图上的捷克斯洛伐克，自豪地对墨索里尼说道：“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1938年9月29日下午12时30分，臭名昭著的阴谋会议在慕尼黑的柯尼斯广场的元首府开场了。出席会议的是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法国总理达拉第、英国首相张伯伦和德国元首希特勒。

就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商人出身的张伯伦却还想在细节问题上讨价还价，以表示对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友好”。他在会谈发言中问道：“我想知道在苏台德区的公有财产转交给德国以后，由谁来赔偿捷克政府？”

“根本没有赔偿！”希特勒蛮横地喊道。

“难道说，农民被驱逐以后，连他们的牲畜也要被扣留吗？”

希特勒火了：“时间对于德国来说太宝贵了。我不想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再浪费任何时间了。”

“那么我要求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会议。这个要求该不过分吧！”张伯伦似乎在为盟友争得“平等”地位。

希特勒早已看透了张伯伦软弱的内心世界。他毫不让步地咆哮道：“在我的面前，我不想看到捷克人的影子！”

最后，会谈四方达成一项屈辱性的妥协：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的房间里，随叫随到。于是在下午会议进行时，有

两名捷克人被冷淡地带到了隔壁一个房间里等候着。晚上，英国外交官威尔逊来到了隔壁房间，把四国协定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交给他们一张捷克人应该撤出的苏台德区的地图。

尽管这两位捷克代表再三提出严正抗议，但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9月30日凌晨1时，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达拉第在《慕尼黑协定》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慕尼黑协定》全称为《德国、联合王国、法国及意大利间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戈德斯堡备忘录》的翻版。这样一来，就等于批准了对捷克斯洛伐克主权的肆意的侵犯。

“黑色星期三”终于没有爆发战争，但其代价却是西方大国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主权的彻底出卖。最为荒唐、也最为可悲的是未经主人同意，一次小小的会议就把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给肢解了。

会后，英、法政府立即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强令其满足希特勒的领土要求。两国领导人甚至威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说，如果不接受希特勒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被视为侵略者。这真是强盗的逻辑！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惟一可以依靠的，就剩下社会主义的苏联了。苏联最初为避免与德国单独作战，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曾提出过与西方大国共同援助的方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苏联政府业已宣布了新的决定：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苏联履行同盟国义务，即使与捷克斯洛伐克订有盟约的法国拒绝提供援助，苏联仍将单独提供这种援助。

苏联政府的这一改变，显然是想将希特勒的军队远拒于国门之外。但是以贝奈斯总统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却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充满了恐惧之心。在他们看来，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无疑会使国内的工人阶级势力大

增，并最终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于是，贝奈斯总统未经议会讨论批准，就屈服于英、法两国的压力，决定投降了。

1938年10月至11月，德国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苏台德区面积为2.85万平方公里，人口360万。这一地区归属德国后，使德国的国力大大增强。此外，北部的特青被波兰占去，南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被匈牙利霸占去。这一系列的瓜分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1/3以上的领土和居民，损失了近40%的工业，而且丧失了原有的坚固防御工事。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已失去了抗击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慕尼黑的出卖意味着将捷克斯洛伐克置于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并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1938年10月，贝奈斯总统在他的外交政策失败后宣告辞职。继任总统为亲德国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哈恰。希特勒虽然占有了苏台德区，但其野心却远远没有满足。他要的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签字还不到10天，甚至苏台德区的和平占领还没有完成，希特勒就向德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发出了准备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密电。后来只是由于国内反犹太人骚乱，这一行动才得以推迟。

在纳粹鼓动下，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分裂运动十分活跃。就连一向对柏林百依百顺的哈恰政府也认识到，如果不将分裂分子立刻镇压下去，希特勒就可能利用由此引起的纷乱为借口，进军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1939年3月6日解散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自治政府。3月10日，哈恰又下令逮捕了斯洛伐克的部分政府官员，并实行了戒严。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这一举动立刻惹恼了希特勒。他蛮不讲理地痛斥道：

“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是靠德国的恩惠才得以免遭进一步肢解。德国人已经表现出了最大的自制，然而捷克人却不知道感恩戴德。最近几周以来，情况变得无法容忍了。贝奈斯的阴魂又在借尸显灵了。”

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斯洛伐克于3月14日宣告“独立”，成为附庸于德国的“自治国”。只剩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块捷克人土地的哈恰总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请求希特勒给予接见，以便使这个国家得以苟延残喘。

1939年3月14日晚10时40分，哈恰的专列驶进柏林安哈尔特车站。这位捷克总统受到了国家元首的待遇，并且下榻在最豪华的阿德隆饭店，但这丝毫也不说明希特勒承认捷克的国家主权。就在当天夜里1时左右，希特勒接见了哈恰，并且冷冰冰地宣布道：

“上星期日，即3月12日，我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让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把捷克并入德国。”

哈恰听后目瞪口呆。随着最后一点希望的破灭，他竟急得昏了过去。当他被纳粹医生的强心针抢救过来后，一名德国官员把一只冷冰冰的话筒塞到了他的手中，强令他与布拉格政府通话，宣布元首的决定。哈恰在电话里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捷克内阁，并建议投降。

3月15日凌晨3时55分，穷途末路的捷克总统步履蹒跚地再次回到了希特勒的面前，并在他自己国家的死刑判决书《德捷协定》上签了字。该协定规定，把“捷克人民的命运交托给大德意志国家元首”，并建立由德国委派的总督直接管制的所谓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签完字后的希特勒显得兴奋异常。他冲进自己的办公室，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位女人，并对她们高声叫道：“孩子们！这是

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千古！”

3月15日清晨6时，德国军队大举进入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没有遇到一点抵抗。黄昏时分，希特勒以征服者姿态进入了布拉格。第二天，他在布拉格城堡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已成为德国的保护国。与此同时，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和东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则被德意法西斯的盟国匈牙利占领。希特勒终于如愿以偿，最终撕毁了《慕尼黑协定》，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境。

在此期间，英、法等西欧大国并未履行《慕尼黑协定》附件所规定的原则，坐视捷克斯洛伐克惨遭肢解和并吞。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欧洲重要工业国家的吞并，使其经济和军事潜力有了巨大的增长。从此，欧洲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39年9月，以德国入侵波兰为标志，规模空前和异常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国张伯伦政府所谓的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换取“一代人和平”的绥靖政策，至此宣告彻底破产。

● 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1939年秋，流亡在巴黎的前总统贝奈斯在法国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并从逃亡国外和侨居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中招募人员，组织军队。1940年法国沦陷后，该委员会又迁到英国，并改组为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

贝奈斯临时政府的战时政策是，保证资产阶级能够在战后获得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为了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国内抵抗

运动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设在伦敦的临时政府的广播电台，经常不断地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发出呼吁，要他们等待命令，暂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在英国帮助下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也始终在后方保存实力，以便在战争结束的最后关头回国去接管政权。

与资产阶级政府的不抵抗态度相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却从没有停止过对德国入侵者的反抗。1939年10月28日，布拉格人民在庆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集会上，抗议德军的占领。抗议活动遭到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数千名大学生被捕并被关进了集中营。11月7日，德国占领军又关闭了布拉格的所有大学。

1941年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喀尔巴阡山一带组织了游击队，以武装斗争打击法西斯侵略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发生了怠工事件。被激怒的占领者派德国党卫队保安处长、秘密警察的副首脑海德里希到布拉格，接替冯·纽拉特担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保护长官”。1942年5月29日，当海德里希乘车前往布拉格途中，被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两名捷克人用英制炸弹将其座车炸毁，海德里希脊椎骨被炸断，于6月4日身亡。捷共领导的国内抵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捷共中央委员伏契克被法西斯逮捕后，写下了著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后，于1943年9月英勇就义。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转入反攻。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带来了新的希望。流亡伦敦的贝奈斯临时政府，不得不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政治地位，置于靠拢苏联的基础之上。1943年12月12日，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捷苏友好

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贝奈斯和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

此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同法西斯作战中得到迅猛发展。而逃亡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则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1943年，在索科沃洛战役中，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亲法西斯的斯洛伐克政府军官兵也纷纷投向苏联红军，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愈发强大起来。

1944年夏，苏军向波兰境内推进，法西斯的“斯洛伐克国”风雨飘摇。群众性的游击队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各地的政府守备队也纷纷倒戈参加了游击队。1944年8月29日，爆发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起义军与游击队密切配合，占领了斯洛伐克中部大部分的重要城镇，最终汇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支重要抵抗力量。当年秋季，苏联红军在外喀尔巴阡发动攻势作战。经过杜克拉战役后，苏军于1944年10月4日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形势的发展迫使以贝奈斯总统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于1945年春由伦敦移驻莫斯科。临时政府在那里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就关于建立新政府和改变解放后的国内政治关系举行了谈判，作出了组建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新政府的决定。

1945年4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在东西斯洛伐克的科希策市正式成立。该政府在多党联合原则的基础上，包括了所有未出卖祖国利益、未同纳粹党人合作的各政党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担任总理，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担任第一副总理。

4月5日，民族阵线在科希策宣布了共产党人起草的民

族民主革命纲领，又称《科希策政府纲领》。纲领宣布：以民族委员会为新的国家政权机构，废除军事官僚机构，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动员所有力量彻底击溃法西斯德国占领军；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完全平等；惩办卖国贼和附敌分子，禁止反动党派团体活动；建立新式军队；没收德国占领者及卖国贼的财产，将其占有的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等。科希策纲领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革命纲领，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1945年5月9日，苏联红军最终抢在美军之前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领土及首都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5年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依据《科希策政府纲领》的要求，实行了对银行、保险公司、矿山和大工业的国有化，使得50%以上的工业转到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手中。新政府还同时进行了初步的土地改革，将170多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了17万中小农民和农业工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希望在苏联支持下，通过议会道路取得对共和国的领导权。在1946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38%的选票，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党，并与社会民主党一道在议会中占有了微弱多数。贝奈斯总统授权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组成一个新政府。根据选举结果，新政府包括了民族阵线的各个党派的代表。新政府向新选出的制宪国民议会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国民议会的主要目标是在两年之内准备一部新宪法，以便巩固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其要点应为设置各民族委员会、实行国有化和建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新关系。此外，纲领还要求制定一个1947—1948年的两年经济计划，其主要任务在于消除战争创伤，使工

业产量超过战前指数的 10%，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47 年，由于苏美两大国之间的冷战，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同年，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因严重旱灾发生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此情况下，围绕是否应接受“马歇尔计划”的问题，捷政府中的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 12 名部长与共产党部长之间产生了分歧。他们企图利用这次经济危机制造政府危机，把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1948 年 2 月 13 日，国家社会党等 12 名部长在政府工作会议上，指责共产党员内务部长诺塞克，擅自用共产党人代替布拉格地区 8 名非共产党的警官，要求内务部长撤销命令，并要求在 17 日政府会议上报告执行情况。

2 月 20 日，12 名政府部长又向总统贝奈斯提出声明，并威胁说如果 13 日的决议得不到执行，他们将退出政府。当天，他们就向总统提出了辞呈，企图迫使总统站在他们一边。但由于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政府部长人数的一半，总统无权解散政府，而只能任命新的部长来补上因辞职而空出的职务。

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西部缓冲地带上的重要一环。苏联不能容忍它落入西方势力范围，为此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捷共此时也向人民发出保卫人民民主政权的总动员，号召把反动官员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同时运用手中掌握的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紧急状态。

2 月 24 日，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举行总罢工，要求总统接受国家社会党等 12 名部长的辞职。25 日，贝奈斯总统被迫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同意 12 名部长辞职。29 日，一批共产党新部长加入内阁。

3 月 10 日，在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上，哥特瓦尔德总理就改组后的民族阵线新政府的政策发表声明，指出一些重要

内容将被补充进新政府的纲领。声明还提出，在选举前将要完成一些特殊新任务：对所有资本家的各种企业凡雇佣人数在 50 人以上者均收归国有；对所有超过 50 公顷的大地产和所有投机买卖土地或租佃给劳动农民的土地，均予征购。该声明最后被制宪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

1948 年 5 月 9 日，即苏军解放布拉格三周年国庆日，议会作为制宪会议在这一天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新宪法（故又称《五九宪法》）。6 月 9 日，宪法正式公布。宪法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由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两个平等的斯拉夫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宪法继承了《科希策政府纲领》的原则精神，确认生产资料国有方针。宪法还保证公民享有传统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五九宪法》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部人民民主性质的宪法。

贝奈斯总统一直拒绝在新宪法上签字，6 月 7 日，他最后选择了在辞去总统职务的文件上签字。贝奈斯在给哥特瓦尔德的附信中表示：希望“共和国能避免一切灾难，希望全体公民能在相互容忍、友爱和宽恕中生活和工作，希望他们也祝愿他们能够享受到应该得到的自由”。

6 月 14 日，国民议会一致选举克·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共产党领导人萨波托茨基被提名为总理。6 月 27 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与清算了自己右翼领导之后的社会民主党合并。两大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不仅结束了近 30 年来的工人运动的严重分裂状态，也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壮大为国内最大的政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至此，共产党通过合法的议会形式，最终巩固了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地位。

此后，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

第二章

艰难曲折的改革之路

● 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解，可以简单地归纳为这样一个公式：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这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经典模式。

然而，东欧各国在经过一段实践后却发现，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于是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考虑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进行的改革探索，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其中的一个。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顺利完成了历时两年的经济复兴计划之后，从1949年至1953年进入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但在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一直照搬苏联的政治模式，不仅妨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甚至对社会主义法制也构成了威胁。此外，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致使捷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人们开始

对苏联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提出了疑问,并希望通过改革,摸索出一条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适应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在1956年6月召开的捷共全国代表会议和1957年6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捷共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领导人就曾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最初设想。主要内容是:主张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提高和扩大国民议会的作用和权限;限制中央的指令性计划,缩小中央集中计划和物资分配的范围;改组和整顿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重视关心物质利益的原则,对职工实行奖励制度;用劳动生产率指数取代总产值指数;改组工业结构,撤销原属中央各部的总管理局,将全国1417个工业企业按照生产专业,合并成383个“生产单位”。

应该承认,这些改革设想都是合理的。虽然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其内容还没能冲破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更多是一些局部性调整,但在当时这已经是极为大胆的尝试和可贵的探索了。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极为谨慎的改革方案,也未能得到捷共党内和政府内强大保守力量的认可。各项改革主张甚至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中途夭折了。

进入60年代后,捷克斯洛伐克再度掀起了改革浪潮。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其内政、外交均受到苏联的严格控制。苏联还力图通过华沙条约和经互会,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由于大搞“国际分工”与“生产专业化”,捷克斯洛伐克原有的工业体系遭到破坏,捷国内生产停滞,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重,市场供应不足,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要求政治、经济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摆脱苏联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已成为捷共党内有识之士和全体人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面控制，是通过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实现的。诺沃提尼是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他1904年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工人家庭，早年当过钳工。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后，他先后担任过布拉格区委、州委书记。1935年，诺沃提尼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此为莫斯科所认识。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捷克期间，诺沃提尼为布拉格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成员。1941年9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关进集中营，直到解放。1946年捷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1年当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1953年1月任联邦政府副总理，同年3月继哥特瓦尔德任捷共第一书记。1957年又兼任共和国总统。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政治上诺沃提尼依仗苏联的支持，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他一味追随苏联，大搞个人崇拜，培植私人势力，压制民主，从而引起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极大不满。其中民愤最大的，当属50年代以“清除铁托分子”为代表的肃反扩大化问题。

早在1948年，南斯拉夫战时游击队领导人，建国后任南共中央主席、共和国总统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就提出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新概念。铁托还试图摆脱苏联控制，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实行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持大国沙文主义立场的苏联，立刻把南共的正当要求视为“民族主义”和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背叛。苏联在对南斯拉夫施行经济制裁无效后，又通过它所控制的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修正主义政党，将其排斥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

随后，苏联为了防止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在东欧蔓延，又在其他东欧国家进行了“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尽管在南

斯拉夫争端中，捷克斯洛伐克是紧随苏联指挥棒转的，但它这次也未能幸免于难。1951年11月24日，受苏联控制的捷安全部门指控捷共中央总书记、国家行动委员会主席斯兰斯基犯有叛国罪而将其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等13位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自1952年11月27日开始，又对斯兰斯基等人进行了连续数天的“公开审讯”，法庭指控他们为“托洛茨基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卖国贼”。12月2日，斯兰斯基等11人根据上述罪名被处以绞刑。这就是令人震惊的斯兰斯基审判案。

斯兰斯基一案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东欧各国“清洗铁托分子”运动中发生的最大悲剧之一，为此引起了捷共党内和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一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损害社会主义声誉的事件，成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经济上，长期实行的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粗放式的发展经济的方针，已经严重不能适应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情。1962年举行的捷共十二大在改革问题上大踏步后退，又导致了捷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农业由于强制性的集体化大伤元气，整个农业生产力仍然停留在1930年的水平上。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严重缺乏。每天清晨，带着网兜的家庭主妇们就开始在食品店门前排起长队，这已成为布拉格的一大景观。此外，住房问题也日益尖锐。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俄斯特拉发、科希策这些大城市，年轻人常常因没有住房而结不了婚。一位经济学家曾大发牢骚地说道：“我们忙着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把建设住房给忘了。”

在民族问题上，解放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曾把斯洛

伐克人争取民族权利的要求，当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加以打击。之后又大幅度削减斯洛伐克民族机构的权力，从而加剧了捷、斯两大民族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从60年代起，文化界要求民主自由，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市民游行事件时有发生。

严酷的经济现实和党内外有识之士强烈的改革呼声，迫使诺沃提尼不得不同意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某些改革。

改革的酝酿过程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1963年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1965年捷共中央先后公布《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针》和《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1966年着手实施改革方案。1967年7月1日，由捷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教授设计、捷共领导人切尔尼克和科尔德在主席团倡导的新经济体制，正式付诸实施了。

希克经济理论最重要之点是：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现实地重新确定工资和物价；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和工人实行物质刺激和经过一个长的时期后，把任意规定外汇比价的捷克斯洛伐克克朗，变成成为一种国际性可兑换货币。经济改革的目标不仅是治愈国民经济中长期积累下来的弊病，而且还要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具有国际竞争能力。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内最大阻力，来自诺沃提尼为首的党和政府中的官僚体制。虽然最初诺沃提尼曾经允许希克设计新的经济体制，但在1967年这一年当中，他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希克进行这项工作。在苏联模式统治的19年间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经济官僚机构，从信贷到劳动，一切决策和分配都是建立在集中体制之上的。这样的官僚机构是不会赞同希克提出的分权思想的。在中央各部

委中，在各级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中，在工厂和农场里，占据着舒适位置的大小官员们，也不会轻易地就被布拉格的小小教授冥思苦想出的主意赶下台去。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管理完全渗透了党的影响，实际上不可能按照经济考虑作出任何决定。相反，人事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才是压倒一切的。

所以，尽管经济改革从1967年1月1日正式开始了，但在一年当中几乎没有作出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克教授似乎也已预见到这一点。他写道，新经济模式可能会遭到“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界或社会上的恶霸们”的反对。不过，他最后还是乐观地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一项进步的社会发现或迟或早总会占据优势，因为它是克服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前提。”

然而，现实却与他的估计相去甚远。到了5月，希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早先是过于乐观了。他在对一个外国记者谈话时说：新经济体制“只在一些企业中和在一些小事情上被采用。阻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继续把它当儿戏。但到了明天，政府将不得不强迫推行这个（新经济）体制。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由于经济改革计划受阻，致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到1967年中期更加恶化，濒于崩溃的边缘。1967年的经济计划要求捷对西方的出口额提高11%，但到8月份为止反而降低2%。曾经以质量优良闻名的捷克斯洛伐克产品，现在也已经面目全非，以致外商都不再愿意购买它了。

希克发表了一系列电视讲话，向全国人民摆出捷经济状况的严酷现实。他称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经济就像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食橱”，已经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布施”了。他还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用以证明过去统治者留

下的是怎样一个烂摊子：钢产量中的一半质量低劣；捷克工人要劳动 117 个小时才能买一架半导体收音机，而西德工人却只需要动用 12 个小时的收入；捷克斯洛伐克在住房建筑方面极为落后；用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口重工业产品，使国家遭受到巨大损失（这牵涉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安排）。

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捷共中央在 2 月、5 月和 9 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不得不把大部精力放在经济问题上。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在 9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对经济计划失灵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意见。杜布切克成为改革派领袖，实际上也是从这次中央全会上开始的。

杜布切克 1921 年 11 月 27 日出生在斯洛伐克西部山区托波尔恰尼县一个贫寒家庭。父亲 1917 年曾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共产党。1925 年响应第三国际号召，赴苏联支援社会主义建设。4 岁的杜布切克随家人迁居苏联，在苏联读完小学和中学。回国后，他于 1939 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投入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4 年 8 月，杜布切克参加了著名的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民族起义，并在游击队的战斗中负过伤。

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杜布切克开始从事党的基层工作。由于他聪明、勤奋，政治条件又好，1948 年被任命为特伦钦县县委书记。到 1955 年，他已被晋升为州委书记了。此间，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曾于 1952—1955 年进入考门斯基大学法律系学习，并且坚持读完了法学院的全部课程。1955—1958 年，杜布切克又被送到莫斯科苏共中央党校进行深造。从苏联回国后，自 1958 年起当选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1960 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1963 年春，杜布切克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并兼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杜布切克是诺沃提尼一手提拔起来的党的领袖，两人的最后分手起源于诺沃提尼对斯洛伐克民族的歧视政策。在1967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在发言中指出，计划规定全国基建投资的28%用于斯洛伐克。但在上半年，实际上用于斯洛伐克的投资却低于22%。为此，他要求纠正这种不平衡现象，并建议建立一种投资基金，以便更好地分配现有资金。

对于他所领导的地区经济情况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对待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其他意见，杜布切克逐渐站到了公开反对诺沃提尼的立场上去了。所以有人说，诺沃提尼最终是绊倒在斯洛伐克这块石头上。

1967年8月末，诺沃提尼携夫人对斯洛伐克进行了一次少有的正式视察，正好赶上斯洛伐克纪念马季采协会（一个与旅居国外的斯洛伐克侨民保持文化联系的组织）成立100周年，以及第一所讲授斯洛伐克语的高等学校成立100周年的活动。而诺沃提尼不明智之处，就在于他偏偏选择了这个时间来到斯洛伐克来抨击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他在图尔昌的圣马丁发表演说时讲道，斯洛伐克问题已经不复存在，1945年以来斯洛伐克经济的发展证明这个地区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是欣欣向荣的。他还错误地从列宁著作中引用了一句话，说什么联邦制只能是暂时的而不能是永久的。这就等于拒绝考虑关于成立联邦的议论。

诺沃提尼讲完话后，会见了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被会见者中包括杜布切克和比拉克。会见时有人提出，“马季采”协会的房子中的一部分用作了博物馆，如果能为它建造一所新的大楼，肯定会受到斯洛伐克人的欢迎。诺沃提尼回答说，用不着盖什么大楼。他认为“马季采”的收藏品应该搬到布拉格去陈列。杜布切克终于忍耐不住了。他大发脾气，向诺

沃提尼高声嚷道：你没有权力作出这样的侮辱斯洛伐克人的建议。随后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诺沃提尼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并立即返回了布拉格。接下来又是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杜布切克在发言中猛烈地抨击了诺沃提尼。

● 诺沃提尼的政变阴谋及其垮台

1967年10月30日，捷共召开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召开这次会议，是想辩论“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并对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一基本的总结。但是，在会上，斯洛伐克的问题却压倒了其他问题。有人提出建立联邦的问题时，诺沃提尼再一次辩解说，斯洛伐克问题已经解决了。当他严厉地指责主张建立联邦制的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杜布切克挺身而出，予以了坚决的反击。

实际上，自9月中央全会以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这次杜布切克一到布拉格后就发现，他所住的“布拉格饭店”的房间里的电话线已被掐断，并且还发现秘密警察在跟踪他。对于如此明目张胆的特务活动，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的杜布切克也忍受不住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杜布切克站出来指责诺沃提尼的“行为像一个独裁者”，并蓄意破坏经济改革。他还指责诺沃提尼随意干涉斯洛伐克的经济，重申了他在9月中央全会上提出的指控。

诺沃提尼则威胁说，如果斯洛伐克的经济希望提高到捷克地区的水平，它就不得不依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帮助。既然杜布切克对过去这些事务的处理方式提出了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就可以分开了。斯洛伐克可以自行其

事，但以后就别再想得到捷克的帮助了。

杜布切克也毫不后退地向诺沃提尼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他说，这已经不再是个斯洛伐克的问题了，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治制度问题。“在讨论经济分立之前，我们必须讨论政治分立，从上面分起，从党的领导分起。”

斯洛伐克的代表们都紧密地团结在杜布切克的周围，要求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结构、工作方法和党与国家的关系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杜布切克强调指出，这不仅是斯洛伐克人的看法，而且也是使共产党重新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的一项基本要求。此时，全会上的捷克领导人也起来支持斯洛伐克人的意见，甚至就连普通的中央委员们也开始希望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这次中央全会只开了两天，诺沃提尼组织起草的决议根本没得到通过。诺沃提尼眼见再开下去，恐怕连自己的第一书记职务也难保住，于是以党的领导人还要参加总统府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50 周年的活动为由，宣布暂时休会。11 月初，诺沃提尼飞往莫斯科，去参加那里举行的庆祝活动去了。

就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正巧在布拉格发生了查理大学的学生因学生宿舍经常停电和暖气不足而上街游行的事件。当游行遭到警察镇压后，查理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开始频频抗议警察的暴行，要求查处对殴打学生负责的警察。一些教授则走得更远，提出了调查警察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要求保证完全的学术自由。11 月 20 日，在查理大学哲学院举行的第二次集会，很快又演变成了大学师生们的 9 小时静坐抗议。

尽管大学生事件与中央全会无关，但却使诺沃提尼本已不高的威信愈加低落。诺沃提尼回国后便发现，在捷克最高领导

层中，他的对手人数已因这次事件而突然增加到几十人了。

诺沃提尼为保住自己的位置，采取了两项行动。一是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于12月4日在中捷克、北捷克和西捷克举行秘密军事演习。这一罕见的冰天雪地中的冬季演习，实际上意味着军队对布拉格的包围。诺沃提尼已经做好了必要时让军队保护自己的准备。二是请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立刻给莫斯科发了一封急电，要求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尽快赶到布拉格来为他保驾。

1967年12月8日，勃列日涅夫秘密访问布拉格。在两天的访问中，勃列日涅夫试图说服诺沃提尼的反对派，但没能成功。而在他访问期间，当时惟一没有在布拉格的高级领导人就是杜布切克。但勃列日涅夫却多次问起过杜布切克。

12月9日晚，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一行。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除杜布切克之外都出席了宴会。勃列日涅夫默不作声地吃着，当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他突然宣布他即将离开布拉格回国。至于在捷共党内两派斗争的问题上，他不想站在任何一边。他说：“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中央不干涉你们的内政。”

诺沃提尼及其亲信们听后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因为此话貌似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只要勃列日涅夫不公开表态支持诺沃提尼，就等于变相地支持了诺沃提尼的反对派，至少是默认和容忍他们拉诺沃提尼下马。

更令诺沃提尼感到不安的是，勃列日涅夫一行在返回莫斯科途中，还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作短暂停留，并特意去看望了杜布切克。虽然勃列日涅夫与杜布切克等人谈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显然他已决定支持杜布切克了。1968年8月26日莫斯科谈判时，勃列日涅夫在发言中对杜布切克说：

“我是从一开始就愿意帮助你反对诺沃提尼的。在1月份我就问过你：他的人对你有威胁吗？你想换掉他们吗？你想换内务部长吗？想换国防部长吗？你还想换谁？可是你却说，不用换，这都是些好同志。”

勃列日涅夫的态度无疑使改革派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改革派中的重要人物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其回忆录中也写道：“当我们得知有人要求勃列日涅夫同志来访问时，我们担心的是他为什么要来。但是，当我们知道了他的观点时，大家都很高兴。”

此时此刻，诺沃提尼大概正在后悔，根本就不该邀请勃列日涅夫访捷。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仅没帮上一点忙，反而在暗中撤了他的台。他甚至开始怀疑勃列日涅夫是在报复他3年前的不忠。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一伙搞下台时，他曾给克里姆林宫发过一份倒霉透顶的电报，对其密友赫鲁晓夫的倒台表示惋惜。想来想去，他觉得邀请勃列日涅夫这步棋真是走错了。

勃列日涅夫的态度迫使诺沃提尼只有破釜沉舟，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了。在这次冒险行动中，诺沃提尼的主要助手是捷共中央安全部门负责人马穆拉。此人从1961年起担任党中央第八部部长，专门负责党组织、政府和军队中的保卫工作。此外，参与这一阴谋的第二位重要人物是马穆拉的副手、分工负责军队中保卫工作的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少将。参与这一阴谋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是国防部副部长扬科上将。

12月4日，在布拉格周围地区的军事演习开始后，马穆拉、谢伊纳和扬科就开始在高级将领中做工作，以争取他们支持拟议中的政变。马穆拉等人甚至暗示说，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表态，必要时苏联将通过武装干涉来支持诺沃提尼。当

12月8日勃列日涅夫表态后，他们又极力对下面封锁消息。

行动时间定在了12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开会的那几天。到那时，军队将开进布拉格，向改革派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撤换诺沃提尼的企图。如果改革派仍不肯就范，就发动一次全面的政变。16日之前，阴谋者已命令驻扎在布拉格以北25英里的第1装甲师和第13步兵师处于戒备状态，并随时准备开进首都。与此同时，马穆拉也已签发了逮捕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的逮捕证。

然而，这次政变阴谋最终未能得逞。12月17日（星期日），捷军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得到了有关这一阴谋的消息后，立即报告了杜布切克等人。18日，调部队进入布拉格的书面命令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党中央主席团的紧急秘密会议就召开了。会上，改革派领导人揭露了这次政变阴谋。尽管诺沃提尼在会上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对于这一阴谋毫无所知，但在当天骤然中止了的波希米亚军事演习，却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阴谋的存在。人们分析，很可能是诺沃提尼从突然召开的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中意识到了阴谋的败露，于是立即下令取消了这次政变计划。

12月19日，在党中央主席团继续开会的同时，捷共又秘密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不断地在主席团会议和党中央大厦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间穿梭来往。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在为自己争取支持和选票。这时，第一次有人正式提出了要诺沃提尼下台。

在党中央主席团中，改革派还没有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来把诺沃提尼赶下台。在当时的10名主席团委员中，支持诺沃提尼的有6票，而要求诺沃提尼下台的只有4票，即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和杜兰斯基。这4个人都是希克经济思想的支持

者。单从这点上便足以看出，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改革与保守的较量。两个会议再次休会，并决定过完年后立即复会。

1968年1月2日(星期三)，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复会。出乎诺沃提尼预料，十多天的休会竟使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多少年来一直是诺沃提尼最亲密的战友的亨德利赫，竟然把票投到了改革派一边。此外，总理列纳尔特显然是看准了风向，也倒向了另一边。于是，在三天后的表决中，诺沃提尼被撤销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但继续保留共和国总统的职务。

接下来就是由谁来接替诺沃提尼担任第一书记的职务。当时，杜布切克并不是改革派公认的领袖，他只不过是造反者之一。他造反的动机，首先是为了维护斯洛伐克的利益，其次才是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胜利。因此，最初在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名单中，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在1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围绕谁来接替诺沃提尼担任第一书记争论得非常激烈。诺沃提尼提议由列纳尔特担任第一书记（尽管这位总理倒戈的一票最终使他下台），而改革派则推出切尔尼克，认为他在担任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期间业绩颇佳。但这两人在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却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票数。于是，为了打破僵局，切尔尼克提议杜布切克作为候选人，诺沃提尼也表示同意。最后，杜布切克在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1968年1月5日晚9时，广播电台向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下台和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尽管当时人们对于这一人事变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但随着日后事态的发展，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一事件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经济改革，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杜布切克与“人道的社会主义”

当后来被西方称作“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序幕刚刚拉开的时候，既没有战鼓擂，也没有号角鸣。因为不仅一般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尚未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就连后来成为“布拉格之春”领袖的杜布切克，在上台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也没料想到这场改革的最终结果。所以有人说，杜布切克成为一名社会主义改革者，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归根结底，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浪潮把他推上了高峰。

杜布切克是一个极难认识、理解和评价的人。据说，他只有几个知心朋友。他是属于那种腼腆的、内省的、复杂的人物。尽管杜布切克没有大放异彩的才华，但却具有着巨大的内在力量。在平时，他总是表现出如同斯美塔纳谱写的纯捷克乐曲般的柔和；而在关键时刻，他又能表现出钢铁般的坚强。

杜布切克是一位忠诚的、为革命肯于献身的共产党员。这种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精神，来自于共产党员父亲的熏陶和年轻时在苏联所受的教育。当诺沃提尼及其他党的高级干部们沉溺于纸醉金迷的时候，杜布切克夫妇和三个孩子在布拉迪斯拉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汽车，娱乐活动也仅限于游泳和看他最喜爱的特伦钦足球队赛球。他不抽烟，只是偶尔喝一两杯葡萄酒。他穿着古板、朴素，但待人却十分和蔼可亲。

1968年的改革最初是本能的，随后才发展成为自觉的、有纲领、有计划的尝试。在杜布切克刚刚掌权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改革计划。而且无论是杜布切克还是苏联人，都没有想到这场改革最后会发展到苏联要入侵的程度。

苏联人当时是完全友好的。就在杜布切克当选后的第二天,1968年1月6日,他便收到勃列日涅夫发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贺电祝他工作顺利并向他保证,苏共中央坚信,苏捷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诚挚友谊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月29日,杜布切克飞抵莫斯科,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东欧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新领导人当选后首先出访的都是莫斯科,以接受盟主克里姆林宫的审查,然后再到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在莫斯科,杜布切克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他向东道主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同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关系,不会因为捷领导人的更迭而受到影响。

双方会谈的内容是广泛的,从加深捷苏两国合作到一系列各种国际问题。其中包括克里姆林宫1964年起就想召开、但遭到中国、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坚决反对的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克里姆林宫希望捷共新领导能够支持他们,而杜布切克满足了苏联人的愿望。他表示捷共不会执行一条干扰苏联世界政策、干扰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活动的路线。

从事后发表的会谈公报上可以看出,杜布切克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克里姆林宫的审查。因为公报在评价这次两党领导人会谈时,使用了“热烈、友好、诚挚,对会谈中涉及的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这类词语。善于捕捉信息的各国记者们都知道,如果会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话,那么一贯严格控制公报口径的莫斯科则将使用会谈是在“坦率和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一类语汇。

接下来,杜布切克又于2月4日在靠近捷匈边境的科马尔诺城,与很早就已认识的匈牙利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举行了会谈。能讲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语的杜布切克,向卡达尔

介绍了他对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计划，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计划。这给赞同改革并正在推行一项谨慎的经济改革计划的卡达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2月7日，杜布切克又在靠近波兰边界的摩拉维亚工业城市俄斯特拉发，同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举行会谈。2月19日，捷共又派出在书记处负责国际联络的书记考茨基飞往布加勒斯特，向罗马尼亚领导人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形势。

但在对东欧各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旨在寻求支持的访问中，杜布切克却疏漏了一位重要人物，即没同民主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乌布利希会面。而乌布利希是当时共产党人中的元老，就连勃列日涅夫有时也要对这位见过列宁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礼让三分。果然，几个月后乌布利希成了折磨杜布切克的主要人物之一。

尽管最初克里姆林宫并未看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然而这一改革运动却在沿着自己的道路飞速发展。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最先吹响进行体制改革和反对苏联控制号角的，竟然是在苏联出兵后取代了杜布切克、并且反过来诋毁和镇压这场改革的胡萨克。1968年1月12日，一直身处局外的胡萨克在斯洛伐克的文化刊物《文化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旧的纪念日和新的希望》的文章，并从此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胡萨克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伟大思想中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实践中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忘却。这些年来，我们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能将民主原则

运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从而导致各种社会机构的错误，使它们官僚化，使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受到干扰，同时引起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民族关系上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这些人也许想用幼儿园的方法来管理国家。孩子们，拉住我的手，都抓住那根绳子，不然你们会走丢的；这个你们先别问，你们还不懂，等你们长大了再问吧；还有，要是你们不听话，我就要处罚你们。我希望合乎逻辑的是：我们也是成年人，有文化的个人和公民；我们是成熟的和有文化的民族。必须从这点出发作出关于整个社会实践的结论。

也有必要回忆一下杜布切克在《真理报》新年号上写的这些话：“过去的时期检验了过去取得的成就和我们今后保持和发展这些成就的能力。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向一个具有新的质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特点，同时对我们的工作有了极高的要求。”杜布切克当选为我们党的领导人，使他的这些话具有了纲领性的内容。

所有希望我们的问题能够按照进步的精神得到解决，希望我国社会实现现代化，希望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复兴过程得以完成的人们，都应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来，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但愿这些新的希望不是幻想，1968年已把我国社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名为捷改革运动摇旗呐喊的人，则是后来成为“布拉格之春”中坚人物的斯姆尔科夫斯基。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任捷政府的林业部长，已成为杜布切克改革的重要谋士，并

于两个月后进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出任国民议会主席。这位无所畏惧地把自己的思想坚持到底的老共产党员，于1968年1月21日，在工会机关报《劳动报》上，以相当权威的语气发表了他对新局的想法：

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我们不能容忍再度发生这种情况。关于问题应如何解决的不同观点，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用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决不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高级领导职务不应当是终身的。应该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光荣地离开和回到高级职务，甚至最高职务。

在经济领域中，必须将经济改革坚决继续推行下去，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发展。它的原则必须贯彻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在社会领域中，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充分调动一切创造力量，改造、发展和创建一个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而正在逐步成为改革运动领袖的杜布切克，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和使捷克斯洛伐克能沿着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保持独立的道路前进的目标。杜布切克关于“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他上任后不久产生的。这可能与 he 获得了阅读党的秘密档案权力后，第一次详细地了解到了20年来迫害、暴行和冤案的血淋淋情况有关。据他的一位朋友说，杜布切克当时失声痛哭，并且发誓

一定不让这种事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重演。

1968年2月1—3日，统一农业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举行。杜布切克选择了这个并不算重要的会议，进行了第一次公开露面。戴着眼镜显得文静甚至有些羞怯的杜布切克，在大会发言中讲道：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也包括处理人民意见的方式：人民是否真正感到他们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作出决定，他们是否真正感到他们是在参与处理和决定这些重大问题……政府必须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让农民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主动性，而不是向他们发号施令，叫他们何时和怎样去收割和播种。

然后，杜布切克宣布：党正在准备一个《行动纲领》。它将明确规定“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并阐明“党在社会、国家和经济领域的当前政治任务”。

三天以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开始讨论《行动纲领》。党中央主席团采取了坚定的步骤，宣布今后“党中央开会的气氛应该是：允许自由批评和建设性的交换意见，也允许对不同的建议和立场作出评价”。

中央主席团还许诺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开会讨论的情况将公开发表。”这表明将通过党内生活透明度实现真正的民主。尽管受到诺沃提尼等人的牵制，中央主席团还是宣布：人民代表机构——国民议会将替代党的机构，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决策机构。目的是实现党政分开，以彻底改变党在国家生活各个领域中专揽一切的有害做法。

2月25日，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电台发表谈话，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主张党政分开。之后，他又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发展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问题。他在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勇敢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归根到底，这也是我们对于自己和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责任。”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斯姆尔科夫斯基则提出了一个更为勇敢的命题，即共产党国家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平等。同时他还提出，经济发达的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需要建立“这样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它甚至可供有着成熟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欧洲工业国借鉴”。这就意味着，总有一天，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要克服长期停滞而重新振兴起来，并且还要以某种方式，摆脱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过于苛刻的监护。

与此同时，曾经当过外贸部副部长、因大清洗而坐牢11年之后又重新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洛布尔，则于2月20日的一篇广播评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复杂并具爆炸性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调整好它在经济领域中“同苏联的不平等关系”？

显然，摆脱苏联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共同心愿。这一点从1968年2月15日在法国格勒诺尔举行的奥运会冰球赛上就可反映出来。当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以5：4战胜了保持不败记录的苏联队后，几十万观看电视实况转播和听了电台广播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涌上了街头，热烈庆祝这一极具象征性的胜利。

第三章

“布拉格之春”

● 剧烈动荡的国内局势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在2月里增强了势头，它具体形成并明确了方向。认真地推行经济改革，强调对全国性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和公开辩论，坚持正义和法制，这些被称之为“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已成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谈论的重要话题。

捷国内形势此刻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极力地争取着介于他们之间的思想混乱、方向不明、对日益迅速发展着的局势心中无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

谁能赢得群众，谁就将赢得胜利。对于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来说，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在1968年2月份，改革派对于自己事业的号召力仍估计过低，而对于保守派的说服力则估计过高。基于这种形势分析，尽管斯姆尔科夫斯基、希克和胡萨克等激进分子一再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杜布切克却宁愿走一条更为稳妥的中间道路，稳中求胜。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诺沃提尼却在此时无意中帮了改革派的忙。

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掌握的重要艺术之一，就是善于审

时度势地激流勇退。但是，被解除了捷共第一书记职务的诺沃提尼，显然缺乏这种自知之明。也许他对于仍然保留着的总统职务看得过于认真了。实际上，那不过是杜布切克为表示与50年代大清洗的做法彻底划清界限而作出的一种姿态。诺沃提尼只须看看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处境，就应该明白捷共新领导的良苦用心。但他却不明此理，居然经常走出总统府去发表政治演说，不自量力地充当起保守派的代言人。

1968年2月17日，诺沃提尼来到他所珍爱的契卡德工厂。这个大工厂是他当权时特意精心扶植起来的企业之一。他在契卡德工厂的演讲内容，无非是保守派当时所使用的惯常武器，即改革派推行的改革将直接危害工人的切身利益。

诺沃提尼警告工人们说：“请你们相信我，如果让希克那一伙人实行他们的改革计划，成千上万的人就要失业，工资要降低，物价要上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就会乱得无法收拾。”

但出乎诺沃提尼意料的是，他的这番演讲却只博得了出于礼貌的寥寥掌声。第二天，该讲话内容被刊登在已被解除了新闻检查的报纸上。其效果正如Z·A·B·泽曼所指出的：“诺沃提尼实际上帮了改革事业的忙。因为他这样一来，就使得辩论不得不扩展到工厂中去，扩展到广大公众生活中去。”

如果说最初关心改革事业还只限于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及敏感的知识界的话，那么随着诺沃提尼政治演说的负效应的作用，改革和国家命运便渐渐成为基层党员和广大群众们的热衷话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介入，卷入运动的人们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和自己一派的态度了。于是，捷克斯洛伐克很快就陷入了两种对立力量的猛烈冲突之中。

杜布切克对于大清洗并不感兴趣，但对于那些占据着很大权力且具有广泛影响面的保守派官员，却再也不能容忍下

去了。为了保证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他必须立即进行相应的组织调整。对于改革派来说，当时首先需要控制的两个关键部门就是思想文化机构和公安机关。

2月19日，杜布切克主持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虽然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党的《行动纲领》的草案，但会议还同时撤销了马穆拉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的职务。国内保卫工作原则上归内务部主管，但是马穆拉却直接指挥这项工作。他实际上是捷克斯洛伐克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苏联克格勃的密切合作者。多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的保卫部门在马穆拉及其副手、内务部副部长沙尔戈维奇的统治下，已经变成了一个连中央主席团都不便插手的独立王国。

马穆拉被撤职后，杜布切克安排他到列特尼亚尼的飞机工厂当了一个职员。而接替马穆拉职务的，则是对于粉碎诺沃提尼军事政变立了大功的捷军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当时他不仅及时地将这一阴谋通报给了杜布切克，而且还劝说各军区司令支持杜布切克，至少是保持中立。由这样的人来掌握国内安全工作，改革派自然就放心得多了。

但是保卫部门的清理工作却进行得极不彻底，或许是改革派还一时未能来得及。总之，许多类似沙尔戈维奇这样的人并未撤掉。而当6个月后苏联入侵时，这些潜伏下来的克格勃走狗便顺理成章地扮演了可耻的内应角色。

对意识形态部门的改组也在同时进行。2月16日，党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召开了诺沃提尼下台后的第一次会议，规划今后的工作方针。该委员会撤掉了哈弗利切克的主席职务，而由科泽尔接替。该委员会宣称，会议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认为必须“彻底克服对待文化艺术和对待知识分子的简单化态度”。会议还提出，党的干部应该集中力量

完成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而不要去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

正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稳步进行之时，改革派不仅迎来了标志着捷共由同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到一家掌权的“二月事件”20周年纪念日，也迎来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东欧各国的“检查团”。1948年2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议会道路夺取了全国政权。从那以后，每年的2月22日和23日两天便被定为纪念日。

这一天，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卡达尔、乌布利希、日夫科夫以及齐奥塞斯库等人，以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庆祝活动为名，一起来到了布拉格。这实际上是他们（齐奥塞斯库除外）对捷共新领导班子的第一次现场观察。于是，这次庆祝活动也就变成了考察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否属于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一次机会。对于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上述考察大员们来说，那只能是不容置疑、也不可稍加变更的苏联模式。

正在试图向苏联模式发起挑战的杜布切克，今天必须就这一最敏感问题作出正面的回答。于是，杜布切克在庆祝大会的发言，便成为他的改革思想的最完整的阐述。他讲道：

50年代初，我国人民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戏剧性变革之一。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国家和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这样深刻的变革，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不幸的是：当时党的领导人令人遗憾地没有能够避免的缺点和错误，竟然也和这些确实伟大的变革一样巨大。在党内生活中也有过不少挫折，其后果我们至今仍然感觉得到……

在无端怀疑的气氛下，发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

的消极现象，从而使上述问题以及同样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更加复杂化，由此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共产主义。我认为，替一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忠诚地为祖国效劳过的人们真正地恢复名誉，发展我国的进步事业和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为整个社会和党的全面民主化所作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从政府系统和党的系统两个方面来纠正过去的冤案，要彻底地、毫无保留地这样做。

科学和文化可能是党的活动中最复杂和最敏感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对象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工作需要人们深刻的理解和赞赏，而不能停滞，不能公式化，不能缺乏耐心和要求过急。……我们的政策必须建立在信任和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之上。凡是对科学发明创造和艺术创作有害的东西，凡是有可能引起关系紧张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加以消除。……不过，党必须保证文艺创作要有助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形成，党不能放弃它的这个权利和义务。

不把党看作一种进行政治领导的力量，而是看作一个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枝节问题的机构，这种陈旧的观点近来又占了上风。……我们的许多行政部门、经济部门以及公众机构的工作缺乏有意义的实际内容，群众的积极性得不到鼓励，我们的许多工作流于形式，这些情况的产生主要应该由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理解来负责，对于这一点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了。……

对于我们党来说，在目前形势下充分实现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意味着为发挥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各种意见的争论和交流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让每一个共产党员充分地、如实地、及时地了解国内外大事，以便他能对党的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及其行动提出意见，对他工作的部门中党的活动提出意见。简言之，这在目前就意味着在保持基本的集中制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更多地、特别是更加深入地发展各种形式的民主，不仅是在党的上层组织，尤其要在下面，在党的基层和党员群众中发扬民主。

杜布切克的这些坦率直言自然不得到勃列日涅夫等人的赞赏。尽管勃列日涅夫在随后的发言中并未作出反应（实际上他也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作出反应），但是苏联《真理报》在报道杜布切克的讲话时，却把上面引用的几段话全部删掉了。这就足以表明苏共中央的态度。如果克里姆林宫原就怀疑这里正在搞“修正主义”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怀疑就更加厉害了。

就在庆祝“二月事件”之后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杜布切克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国防部刊物《人民防御报》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写的一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揭露了总统及其一伙在去年12月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谢伊纳将军的名字，但暗示得已十分明显。谢伊纳见势不妙，两天后（2月25日）便携带儿子途经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逃到意大利（后美驻罗马大使准予其到美国政治避难）。

随着这一军事政变计划的被揭露，要求诺沃提尼下台的呼声响彻全国各地。其结果是政变主谋之一扬科上将于3月14日自杀身亡，以及3月22日诺沃提尼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然而，谢伊纳叛逃事件所引起的深远后果还远远不止于此。

就在叛逃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68年2月28日，华

沙条约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飞抵布拉格。这位苏军元帅就谢伊纳的叛逃以及由此在情报方面和安全方面引起的后果等问题，与杜布切克、诺沃提尼、总理列纳尔特和国防部长洛姆斯基举行了秘密紧急会谈。

作为负责军队保卫工作的谢伊纳无疑掌握了捷军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以及关于国家安全的情报和关于干部的个人情况。因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以不排除北约部队有可能对捷采取军事入侵为理由，顺便视察了捷军的防务。这恐怕才是雅库鲍夫斯基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

8月份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捷军情报官员估计，组织这次进攻的参谋紧急计划工作，肯定在2月末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认为，调动包括装甲兵、炮兵在内的50多万部队参战，以及还要组织5个国家充分的后勤支援，这项工作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一切在当时并未引起杜布切克等人的怀疑，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事业仍在继续进行着。

● 控制局势与德累斯顿会议

1968年3月5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杜布切克主持下召开。会议免除了亨德利赫全面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职权，接替他的则是主席团委员、年轻的改革派什帕切克。会议还规定了一套从党的最高领导层到基层组织之间互通情况的制度。这套制度是为了落实全党进行充分协商，以便对《行动纲领》和其他新政策进行公开辩论而规定的。

在3月9日、10日和17日、18日这两个周末，中央主

席团成员分别与各州、县党组织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行动纲领草案和其他新的政策思想。州、县党组织的代表向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在党中央这一民主姿态的鼓舞下，广大党员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最后主席团发现，出现了一股要求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的热潮，而这种情况在捷共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党员群众对于国家大事冷眼旁观、不闻不问的沉闷局面，从此开始得到扭转。

3月13日，内务部两个党组织通过一项决议，抗议部和司局领导在转变保卫机关的职能问题上采取“拖拉”态度。决议强调指出，秘密警察至今未能得到清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对公安人员的态度”。换句话说，在全国民主气氛的鼓舞下，就连秘密警察也在争取人民的支持了。

3月14日，国民议会主席团对内务部长库德尔纳和总检察长巴尔图投了不信任票，并且指示最高法院院长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为历史冤案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

3月15日，诺沃提尼奉命宣布撤销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的职务。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批准这一决定的同时，还批准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撤销其主席胡迪克和工会中央理事会撤销帕斯蒂日克领导职务的决定。

与此同时，在50年代大清洗中受害最深的外交部党组织，也开会批判亲苏的外交部长戴维，并且严肃地批评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他们要求惩处那些对过去“不正常状态”负有责任的人员，并且宣称，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在保持与苏联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

在3月13—15日举行的党中央主席团会议宣布，新的人事变动方案已经准备好了，它将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在展望今后工作时，党中央主席团宣称，将彻底

结束国家生活中的一切“不正常现象”，恢复名誉的工作将加快进行，选举的民主程序将得到恢复。但同时，党中央主席团也意味深长地对一切“走极端的行为”发出了警告。

3月17日，杜布切克在布尔诺党的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再次提出警告，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杜布切克重申：在他的领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忠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呼吁报刊编辑和广播工作者们不要把国家的重大问题过分“急躁”地提出来。他说，审慎稳重是必要的，以便“整个我们的社会确实能够掌握所提出的问题”。党希望报刊杂志能够“有助于加强新政策的基本方向”，促使“广大阶层的人民对党的政策采取积极的态度”。他还表扬了报刊、电台等宣传工具在这次新的政治运动中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说：“很久以来，我国公民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国家大事”。

可以看出，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领导人，一方面为国内出现的空前少有的民主气氛感到高兴，同时也在担心运动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有可能成为苏联攻击改革甚至进行武装干预的把柄。从那以后，改革派领袖们在讲话中频频地发出了类似的劝告。

3月13日，头发斑白并总是面带笑容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出面，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采尔纳”大厅向几百名青年讲了话。他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复兴计划的目标，同时提醒青年人不要过火。在这次讲话中，斯姆尔科夫斯基甚至暗示了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并郑重地向青年学生们发出警告。他说：“我们常常看到青年人表露出他们对苏联的厌恶，在冰球赛的时候尤其明显。当然，爱什么还是不爱什么，这是各人的私事，是不能勉强的。可是，你们必须考虑到一个现实：你们去看看地图，在学校里或者在家里看看地图，看

看我们的国境线，谁是我们的邻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政治之中的。……希望你们不要忽视我刚才说的话，不要拿它当儿戏。千万不要低估你们对我国安全所负的责任啊！”

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这次演讲给他的青年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3月20日，当青年们得知他将在“代表大会礼堂”再次向青年党员和其他人讲话时，在这座只有3000个座位的礼堂里，竟挤进了6000余名听众。

斯姆尔科夫斯基再次意味深长地对青年们说道：“你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成为更为激进、更加革命的人。但是，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人却应该注意，避免使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期发生任何意味着灾难的事情。”

这次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大会最后通过了一个送交国民议会的决议。决议提出如下要求：诺沃提尼下台；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实行出国旅行自由；实行更有效的经济改革；对一切事情都要“说真话”。决议强调，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复辟资本主义。决议还要求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建立“平等关系”。

就在同一天，国民议会主席团也就对总统的信任问题和“国内政治形势”召开了会议。议会下属的好几个委员会都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讨论对诺沃提尼投不信任票的动议。

3月22日，诺沃提尼终于顶不住了，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职务。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主席团投票接受诺沃提尼辞职。按照宪法规定，在新总统选出来之前，由政府代行总统职权。于是，列纳尔特总理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代总统。从那以后，诺沃提尼便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头号无人理睬的人。

1968年3月23日，杜布切克等五位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被召到德累斯顿去参加华沙条约国领导人会议。原来，自从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卡达尔、乌布利希和日夫科夫上月访问过布拉格之后，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来的局势发展大为震惊。他们一致决定，立即召开一次华沙条约国紧急会议，逼迫杜布切克交待：他那酝酿中的《行动纲领》究竟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

会议的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肯定，即杜布切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自封的共产主义法庭上，几乎是孤军作战。且不说勃列日涅夫和哥穆尔卡、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及卡达尔等人的围攻，就是他所带去的四人当中，也只有切尔尼克是坚定的改革派，而代总统兼总理列纳尔特、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尔德和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比拉克，则都持反对改革的立场。

返回布拉格之后，在别人急切的追问下，杜布切克承认，确实有人对捷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遇到危险表示担心。但他说，他已经使兄弟党的领导人相信，从共产主义事业的角度看，捷国内形势很好。

德累斯顿会议无疑是捷改革派和华沙条约保守派之间的第一次大对抗。但苏联却有意将这一裂痕来掩饰。塔斯社在发表的公报中平淡地宣称：“与会者表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保证该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冲淡杜布切克是被叫去受训的印象，捷官方在声明中有意将这次会议说成是讨论经互会间经济合作的问题。

但是，表而的平静无法掩盖底下的涌动。危机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据捷情报部门报告，苏联军队在向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东部边界接壤地区调动。

当时，勃列日涅夫及其他华约领导人所关心的，绝不仅

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的问题。在1968年初，整个东欧地区都处于一种危险的动荡状态。诺沃提尼的下台，无疑再度鼓起了华沙的反苏情绪。就在哥穆尔卡前往德累斯顿之前一个星期，波兰首都华沙爆发了195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罗马尼亚继2月份当场退出布达佩斯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后，这一次又公然拒绝参加德累斯顿会议。勃列日涅夫已经隐约地感觉到，捷克斯洛伐克这块砖的脱落，很可能将引起华约大厦的崩溃。也许正是从这时开始，他就已经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德累斯顿公报并没直接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还冠冕堂皇地宣称，会议“在真诚的友谊、平等、互相信任、互相支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会议结束四天之后，东德共产党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哈格，即开始对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发起了攻击，指责他的讲话是在为西德政府效劳。随后，东德和波兰都开始对布拉格电台进行干扰，并禁止捷克斯洛伐克报纸流入境内。而一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沉默不语的莫斯科《真理报》，也开始通过对西方报刊文章的批判，间接地对捷共政策发起了攻击。

● 四月中央全会和《行动纲领》

1968年3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布拉格城堡的西班牙大厅开幕了。会议将讨论酝酿已久的指导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行动纲领》。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并没有被德累斯顿的审讯所吓倒。在他们掌权近三个月后，现在终于要提出自己的纲领，并委托自己的人来付诸实施了。

对于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会议，改革派领导人们不敢有一点疏忽。捷武装部队总司令部于当天发出命令：在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期间，停止一切军事演习。这是改革派采取的重要安全防范措施，以免有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已处在坦克的包围之中。

中央全会的第一个议程是提名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曾担任过教育部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现为党中央负责教育和科学的书记齐萨士呼声最高。齐萨士无疑具有担任总统的资历和声望。但由于他与改革派过于接近，因此有人担心他的当选，会使苏联人感到是对他们的公然挑衅。于是，杜布切克向主席团提议，由72岁的斯沃博达将军作为总统候选人。

斯沃博达是二战期间在苏联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司令，1954年任国防部长，然后任副总理，最后又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监禁。这位白头发、蓝眼睛、面容慈祥的老将军是第一批被恢复名誉的，并且在1965年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斯沃博达自恢复名誉后，一直在军事历史研究所撰写军事历史。这确实是担任一个挂名总统的最好人选，既能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喜欢，也能让莫斯科满意。而且捷语中“斯沃博达”是“自由”的意思，这恐怕也是这位老将军能够赢得大家喜爱的重要原因。于是，杜布切克的提议马上得到了几乎所有中央委员的一致赞同。斯沃博达也没有辜负改革派的厚爱。8月苏联人侵后，若不是他以死相威胁，被苏军逮捕的杜布切克等人恐怕早就客死他乡了。

克里姆林宫始终在密切地注视着捷共中央全会的动向。就在斯沃博达当选总统的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员的集会上发表了一个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关意识形态的讲话。他强调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直接影响”是不

能与人分享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战线。”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民族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在中央全会4月1日的会议上，代表们听取了杜布切克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概述了《行动纲领》的基本思想、共产党的新作用、以及自1月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逐渐形成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

杜布切克所领导的改革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是：用指导性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使企业拥有更大的决定生产、投资和分配的权限；逐步向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过渡，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企业上交利润制改为税收制。

在政治和思想理论方面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具有人道方向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党垄断政权，主张党政分开；设立开放性的民族阵线，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体制；给人民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取消新闻检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允许多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

就在杜布切克作报告的前一天，即3月31日，3000余名原政治犯在布拉格集会，成立了一个叫作“K—231俱乐部”的团体。“231”是捷克斯洛伐克《保护共和国法》的编号，当年这些人就是根据这项法律而被监禁的。“K—231俱乐部”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分部，公然宣称他们的目的是为恐怖统治下的受害者恢复名誉，伸张正义，赔偿他们的损失。显然这是一个企图在未来的公开选举中与共产党角逐政权的政治团体。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这类团体还会不断出现。

因此，杜布切克在报告中承认，目前国内存在着“许多种互

不相同、互相对立的利益”。他警告说：不能在“民主和恢复名誉的招牌下”让“某些非社会主义的风尚”复活和进行“报复”。杜布切克等改革者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经过改革，恢复了活力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民主方式，战胜其他一切兴起的思想派别。

杜布切克在他的报告中说道：“由于我们的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由于我们党的历史功绩，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权利宣告：共产党仍然是我国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有组织的进步力量。”接着他又解释说，共产党必须对社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党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时，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必须重新树立党的威信。……任何人的威信都不是一经享有就永远存在的。”

针对某些人对蓬勃兴起的改革浪潮的担心，杜布切克在报告的最后说道：“我们不要害怕这种浪潮。让我们向这种浪潮学习。对我们党的信任和党内的自信心正在增强。”

4月2—4日，中央委员会最后解决了党的领导机构问题，产生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书记处，确定了政府和国民议会的领导人选。在党内，诺沃提尼、亨德利赫、拉什托维奇卡、杜兰斯基、西穆涅克、胡迪克和列纳尔特辞去了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诺沃提尼最后一个职务——民族阵线主席，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撤销。

但新的班子还远远不尽人意，因为改革派还不具备建立一个清一色领导层的实力。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是两派妥协的产物。在中央书记处中，一些有战略意义的职务仍被保守派占据着。这些人对贯彻杜布切克的政策毫无用处，相反，他们倒是抓紧一切机会来阻挠和破坏改革。在由11人组成的主席团中，杜布切克能够依靠的只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被任命为国

民议会主席)、什帕切克、克里格尔(被选为民族阵线主席)和切尔尼克,还有一个主席团成员巴尔比雷克(同时当选为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倾向于保持中立。于是,在 11 名中央主席团成员中,改革派和保守派各占 5 人,刚好平分秋色。这就使得杜布切克不能顺利地将自己的意图贯彻到全党。

杜布切克在准备实施《行动纲领》时,所拥有的就是这样——一个改革派与保守派混杂一起的阵容。这是杜布切克最感苦恼的问题,恐怕也是导致这场改革运动最终失败的内在原因。

随后,中央全会对《行动纲领》草案进行了热烈充分的讨论。这个长达 63 页的文件的基本论点是,主张走一条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宣称:“我们要建立一种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未知的条件下开辟和实验新的道路,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性质。”改革的基本宗旨是:“必须整顿政治制度,使之有利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把最广泛的民主同受过科学专业训练的领导结合起来。”

关于共产党的作用,《行动纲领》提出:“共产党依靠人们自愿的支持。它在实现其领导作用时,不是靠对社会的统治,而是靠最忠诚地发展自由、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努力。它不能用强制手段获得权威,而必须不断重新以自己的行动来获得权威。它的路线不能通过发布命令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党的工作和自己的理想所具有的说服力来贯彻。”

《行动纲领》还否定了勃列日涅夫所坚持的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观点,声称:“党坚决谴责想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互相对立的企图……党将努力消除可能使各阶级和阶层间关系紧张的一切因素。”它强调要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紧密团结、富有创造性的社会。它号召,为过去的受害

者充分恢复名誉；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邦共和国；制定新宪法，以替代1960年通过的按照苏联模式制定的宪法。

在分析1968年1月以前的经济形势时，《行动纲领》猛烈地抨击了过去捷共喜爱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认为这种“虚伪的平均主义”是集约化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平均主义“是有害的，因为它袒护懒汉和责任心不强的人而损害勤劳和舍己为公的人，袒护非熟练工人而损害熟练工人，袒护技术和业务上落后的人而损害有才能的、积极主动工作的人”。

在论及舆论自由和文化自由时，《行动纲领》写道：“文艺的社会影响是不能没有政治意义的。我们将注意使宪法保证的舆论自由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共产党必须鼓励和引导文艺作品，努力使文艺作品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能够有效地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这是共产党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外交政策，《行动纲领》作了如下阐述：“迄今为止，我们的外交政策没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来进行积极活动，没有主动用自己的观点去阐述和对待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捷共中央、国民议会、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尽快克服这些缺点，使我们的外交政策既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也充分体现它的国际利益。”

《行动纲领》提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表示要坚决与其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它同时拒绝把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隔绝。它宣称：“在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我们将积极地推行和平共处政策。我国的地理位置和作为一个工业国的需要与可能，都要求我们执行一条更加积极的欧洲政策，其目的是发展互利关系，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

为了表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这历史关头的心情和希望,《行动纲领》最后写道:“现在,我们正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形势。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我们要运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要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我们的国家对国际共运是负有责任的,它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主传统。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些条件,任何人也不会原谅我们。”

1968年4月6日,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也于当天结束。

中央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斯沃博达总统提交了辞呈。斯沃博达总统立即责成新当选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组织新的内阁。两天后(4月8日),切尔尼克新内阁宣告成立。它是一个古怪的混合体,其中既有支持《行动纲领》及其政策的改革派,也有反对这个纲领的保守派。

在五位副总理中,代表斯洛伐克的是胡萨克和一个知识分子佐洛特卡教授。这两人在当时都被看作坚定的改革派。授予胡萨克的任务是起草新的选举法、宪法和筹备实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邦化。另一位副总理希克教授是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人。第四位副总理是哈莫乌兹,他的任务是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经互会。第五位副总理是诺沃提尼当政时的内务部长斯特劳加尔。这样一种组合,无疑使保守派以及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拥有了一个立足点。这样,在“布拉格之春”政府诞生的时候,就在自己的成员中安插下了将来毁灭它的人。仅仅6个月之后,切尔尼克、胡萨克和斯特劳加尔就按照莫斯科的旨意,形成了摧毁“布拉格之春”的三驾马车。18个月后,连切尔

尼克也滚落尘埃，只有胡萨克和斯特劳加尔两人分享大权了。

如果说在总理和副总理中，改革派还占有优势的话，那么从包括各部部长的整个内阁来看，从党和国家的各中央领导机构来看，改革派却并不占有优势。因此有人这样评价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政权：

它像是一座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出头露面推行改革新政策的英雄和支持者是杜布切克、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在低一层的还有希克、什帕切克、帕维尔、哈耶克和加卢什卡……但是藏在水底下的却是改革反对者——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斯特劳加尔、列纳尔特，还有胡萨克和楚尔这样的神秘人物。

但是，不管怎么说，捷共四月中央全会通过了指导改革的《行动纲领》，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全会之后，捷共又开始为50年代冤案进行了平反，改革运动步入了高潮。报刊和电台的节目愈加活跃起来，人民群众对政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政治要求。一时间，民主空气、“自由”气氛弥漫全国，出现了西方人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局面。

不幸的是，苏联等国的武装干涉中断了“布拉格之春”。捷共中央的《行动纲领》未能得到贯彻实施，因而也无从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更难以对其功过加以评说。但从杜布切克的报告和《行动纲领》的内容上评价，“勇敢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一个可给欧洲工业国借鉴的这样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则是“布拉格之春”应该肯定的主流和大方向。

第四章

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寒流

● 捷苏两国领导人的莫斯科会谈

《行动纲领》在捷共中央全会上的最后通过，是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取得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它既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将全面、迅速地铺开，同时也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破釜沉舟，公然向苏联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宣战。

在捷共中央全会闭幕后的一个星期里，苏联报刊对捷共中央全会和《行动纲领》没有发表任何报道和评论，始终保持着令人生畏的沉默。苏联人绝不会赞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它越是沉默，就越使人感到不安，越使人感到深不可测。

的确，莫斯科此刻并没有睡大觉。捷共的《行动纲领》和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严重不安和极度关注。

1968年4月9—10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全体中央委员听取勃列日涅夫所作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据报道，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特

别谈到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并详细论述了布拉格发生的事件。

尽管苏联官方发表的会议公报并没有披露报告的具体内容，但它却特别强调了“德累斯顿会议的重大意义”。公报宣称，苏共中央全会“再一次表示，我们党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的不断加强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这就等于宣布，苏联在它感到社会主义受到威胁的时候，对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进行武装干涉。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公报是后来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霸权主义理论的前奏。

4月12日，沉默了将近10天的苏联《真理报》终于开始报道捷共中央全会了。不过，《真理报》的报道所引用的都是保守派在会议上的发言，并且硬把一个根本不知名的中央候补委员赫努佩克的发言，当成捷共中央全会的最主要的发言来报道。该发言谴责了“右派的过火行为”，并威胁说，工人将走上街头保卫正统的共产主义。《真理报》选中此人，也不是偶然的。赫努佩克曾任捷驻苏记者，以后在苏军占领时期长期任胡萨克政府的外交部长。《真理报》此时的做法，无非是想让苏联读者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布拉格，改革派是不得人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将勇敢地保卫共产主义的正统。

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和捷克斯洛伐克保守派的诅咒，并没有能对日益高涨的布拉格改革发生任何影响。4月9日，斯沃博达总统任命切若夫斯基为新的总检察长。4月18日，国民议会确认斯姆尔科夫斯基为议会主席。博切克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而赋予新的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的迫切任务，就是为50年代的大清洗及其以后的受害者恢复名誉。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是《行动纲

领》的要点之一。杜布切克改革派的威信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它是否能实现这一承诺。然而，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许多冤案，尤其是50年代的大清洗，都是在苏联人参与下炮制出来的。

对于这一点，莫斯科和布拉格都是心照不宣的。早在4月2日，布拉格的《学生》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新发现的证据足以证明，20年前轰动一时的扬·马萨里克之死不是自杀，而是被杀害而死的，并要求立即调查核实。扬·马萨里克是1918—1935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被人们尊为“国父”的托·马萨里克的儿子，1948年2月在哥特瓦尔德的新内阁中留任外交部长。但就在这一年3月10日清晨，人们突然发现他摔死在自己住宅的窗户外面。

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心中，扬·马萨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连续性的象征。因此在当时，人们如同1937年悼念他父亲那样隆重地哀悼他。现在，人们又再次谈到了他的死因。4月16日，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尖锐地提出：“贝利亚卫队”（指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在这个事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紧接着又以明显的挖苦口吻请求道：希望“我们的苏联朋友”能在弄清马萨里克神秘之死的问题上提供协助。

而捷国防部机关报《人民防御报》在4月中旬发表的、新任军事检察长里赫特中校的文章，则更是一针见血。文章写道：“应该坦率地说，最大的罪恶昭彰的破坏法制的行为并非我国的产物，而是贝利亚的‘长臂’直接造成的。”与此同时，1952年曾任捷公安部长的巴契列克为洗清自己也发表声明说：对于苏联派秘密警察官员马卡罗夫将军和哈乔夫将军担任捷国防部总顾问一事，当时的捷总统哥特瓦尔德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苏联硬给塞了进来。声明还叙述了米高扬到布

布拉格来安排斯兰斯基审判案的情况。

布拉格的这些所作所为，无异于火上浇油。

4月底，华沙条约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再次来到布拉格，与捷党政新领导举行了会晤。尽管作为华约总司令访问该条约的一个成员国属于正常现象，但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却对此感到担忧和不安。布拉格一些报纸开始透露：元帅此行的目的是建议在捷领土上举行一次军事演习，参加部队有包括苏军在内的华沙条约各国军队。

5月3日，捷国防部长楚尔公开承认了报端的猜测，但所用词语却极为含混：演习的规模还没有完全确定，很可能只是一种“参谋演习”，而不是像1966年的“伏尔塔瓦”演习那样的全面军事演习。但这条消息还是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当头浇下了一盆冰水。在这关键时刻到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显然是想对布拉格改革派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

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担心不无道理。不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放他们进来之后，谁知他们走不走？”从那时起，苏联军事演习像恶梦一样，一直萦绕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心头，直到苏军人侵那一天。

5月3日晚上，在楚尔发表声明几个小时之后，数千名群众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举行了一次事先得到了许可的集会。这些被拟议中的军事演习搞得焦虑不安的人情绪极坏，结果这次集会很快就演变成了反苏示威活动。然而，这些布拉格人却并不知道，就在他们集会的当天午夜，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比拉克等四位党政领导人，正“应苏共中央的邀请”乘飞机赶往莫斯科。

这次召唤显然是突如其来的。对于这样一次两国间的最高级会谈，苏联竟然没有事先打过招呼，更不要说进行什么

预备会议了。用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话说，“我们简直是被召去受训斥的”。

5月4日，飞抵莫斯科的捷党政代表团四成员，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四人举行了会谈。捷代表团首先听取了苏联领导人对布拉格事态的一大堆不满的话。会谈期间，苏方的秘书不断地向勃列日涅夫递送捷国内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而勃列日涅夫所感兴趣的只是保守派一方的观点，哪怕仅仅是某个根本不出名的小镇里发生的小事。而这些材料大都是契尔沃年科大使从捷国内保守派那里搜集和呈送上来的。

隔着宽大的会议桌，勃列日涅夫不断地把这些材料推到捷领导人前，要求他们对此作出解释。杜布切克等人读完这些材料后，对苏联人搜集的情报感到不解和吃惊。例如关于“五一”节的情报，他们竟然对有数百万人参加的热烈拥护捷共政策的群众庆祝活动视而不见，相反却对分别只有几十人参加的“非党人士俱乐部”、“K—231俱乐部”的会议津津乐道。

尽管苏联人对捷国内的真实情况和整个形势并不感兴趣，但是捷代表团却认为必须把捷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苏联同志。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先后发言，向勃列日涅夫列举了许多更为全面和重要的事实，并且指出，这些要比他们所搜集的一大堆所谓的情报重要得多。

接下来，苏方坚持要求捷共立即对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予以镇压。而捷方则表示，一般地来说，我们将采用民主讨论和谈判的方式来控制我国政治热情的爆发；只有当事态发展已属不正常并且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而谈判又不能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才会采用行政的手段来对付这种极端行动。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苏方并没有就最关键的捷共中央四月全会展开深入讨论。勃列日涅夫只是强调说，苏共中央对此将保留意见。由于苏方根本不想深入了解捷共的改革纲领及捷国内的真实情况，最后双方便以保留意见而草草结束了政治方面的会谈。

在整个政治方面的会谈中，捷代表团成员比拉克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他公然站在苏方立场上，对捷国内所发生的改革进行攻击。这就使得杜布切克等人在会谈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事后，斯姆尔科夫斯基气愤地说道：“实际上他不是我们代表团的第四名成员，而是他们的第五名代表。所以我们不是四比四，而是三对五。”

接下来，双方进行了经济方面的会谈。切尔尼克以捷总理的身份提出了希望苏联给予贷款的请求。他详细地陈述了捷克斯洛伐克需要进行加工工业现代化和逐步改革工业结构及布局的理由。此外，捷方还打算扩大住宅建设。这一切大概需要4—5亿卢布的贷款。他说：“我们是从苏联得到这笔急需的款项。如果苏联不能借给我们那么多，那么我们就只好向国际银行或其他国家去借。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要向西方借这笔钱的话，我们也将严格地在贸易基础上进行，而决不允许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苏联总理柯西金对于贷款请求没有作出明确回答，只是含糊地说道：“我们将研究捷方的请求。”随后，柯西金话锋一转，满怀敌意地问道：

“捷克斯洛伐克究竟是想为谁生产消费品？是不是为了出口？我想提醒你们的是，西方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不会需要捷克斯洛伐克的消费品。所以你们借助西方贷款生产的消费品，最终还是得拿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上去销售，而且主

要是苏联市场。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也同样不需要你们的消费品，我们需要的只是你们的机器设备。”

柯西金这番经过深思熟虑的发言表明，苏联根本不赞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工业结构及布局的改革。他们希望捷继续保持旧有的工业发展方针和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这样，缺乏原材料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就只能依附于苏联，随之而来的便是完全服从于苏联的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代表团在苏联只逗留了不到 36 小时，5 月 5 日中午便飞抵国内。这次政治和经济会谈可以说是毫无结果。会谈的真实结果秘而不宣，发表的公报也只是说，会谈是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还是从中体会出了某种不祥之兆。

深切的关注 and 不安笼罩着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感到有必要告诉人民一些情况。于是，他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话。谈话指出，在莫斯科双方讨论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我们解释了我们是如何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而努力的。我们的苏联朋友以谅解的心情听取了我们的解释”。

杜布切克接着说道：苏联人“表示相信，得到绝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能够顺利实现它的目标。在好朋友之间通常不会用客客气气的外交辞令，而是互相平等和开诚布公地进行交谈。本着这种精神，苏联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担心我国的民主化过程会被人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必须指出，从一月中央全会以来，我们党经常强调指出，它根本不同意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过火行为，而且把坚决反对这种过火行为看作是自己政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杜布切克这番相当坦率的谈话，不仅未能消除捷克斯洛

伐克人的疑虑，反而使他们对苏联人的疑虑更加深了。

● 对于苏联军事入侵的种种猜测

杜布切克等人从莫斯科回国才两天，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就接踵而来。

5月7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否认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报刊关于扬·马萨里克之死可能与“苏联顾问”的活动有关的报道，并将其称为“捏造和挑衅的报道”。

5月8日深夜，华沙条约国领导人纷纷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举行会谈，商讨对策。而没有接到邀请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则完全被蒙在鼓里。这就清楚地表明，会谈的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因拒绝参加旨在谴责别国共产党的一切会议，因此也没有出席。

5月9日是苏军解放布拉格23周年纪念日。科涅夫元帅率领一批苏联将军，前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尽管庆典如同往年一样搞得热闹隆重，但科涅夫一行阴沉的面孔和紧闭的嘴唇却大煞风景。不少布拉格人感到，5月9日这一天是他们自1月以来最紧张的一天。此时此刻，他们所想到的不是23年前苏军对他们国家的解放，而是担心当年的解放大军是否会卷土重来？

就在当天，华沙条约国首脑开会的消息从莫斯科传来，而同样是华沙条约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竟被拒之于会议大门之外。其中意味着什么已是不言自明。与此同时，华沙、东柏林等地的报道也都在说，用坦克开路的苏联部队正通过波兰向捷边境推进。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布拉格。世界各地的报

刊编辑们开始考虑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一名驻布拉格的美国记者接到通知，要求他写一篇谈论“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变成越南”的电讯。

当天夜晚，西方国家驻波兰武官纷纷向国内发回了苏军向捷境调动的情报。有人怀疑，这个消息是苏联人有意透露给西方国家驻华武官的。其目的是警告杜布切克：如果他坚持贯彻他的纲领，必将会大难临头！

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次苏军部队的调动并非是虚张声势，而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确实打算在5月9日、10日采取迅速军事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没有扩散之前就加以切除。这种考虑在上一周杜布切克等人访问莫斯科之后更加成熟，因此才在5月8日将华沙条约国首脑们紧急召到莫斯科，要他们同意采取这一军事行动。

这种看法在入侵后得到证实。据分析，苏联当时放弃了入侵，一方面是由于苏共中央内部和华沙条约国首脑们尚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另一方面则是莫斯科歪曲捷改革的舆论宣传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没有为军事入侵制造出充足的理由和借口。但更主要的是克里姆林宫希望捷共中央里的保守派提出干预和援助请求，这样苏联人才好彻底摆脱掉“侵略”的恶名。然而在5月份，却没有一个捷共高级领导人肯于扮演这种可耻的角色。

就在驻乌克兰的苏联第一喀尔巴阡集团军调到波兰并正向捷边境进发之时，就在捷国内敏感的知识分子以及外国记者对于入侵的种种猜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做法却显得更为谨慎。

捷军事情报机关直到5月9日晚还不知道波兰境内有部队调动一事。到次日早晨，华沙条约组织驻布拉格的联络官才

通知捷国防部，“部队调动”正在进行。捷当局既不愿使公众惶惶不安，但又不能回避现实，于是就采用了引用广播电台“外交记者”的话这种间接方式予以透露。捷通社发表声明称：

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外交记者从消息灵通人士处获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事先得到关于华沙条约军队在波兰南部进行正常调动的消息。记者继称，捷克斯洛伐克政界人士认为，某些通讯社的报道，把这种部队调动说成是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乃是一种政治挑衅。

5月11日，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就5月初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发表文章。文章指出：“与过去类似的会议相反，这次会议公报没有提意见一致和团结。外国记者由此推测，与会者没有达到完全的一致。”文章表达了会议将捷克斯洛伐克摒之于外的不满，接着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希望这次莫斯科会议的“参加者没有提出‘开除’捷克斯洛伐克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问题”。其用意显然是在暗示莫斯科，切莫再犯当年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类似错误。

捷共领导人在当时（直至其后的3个月里）对于苏军是否有可能发动武装入侵究竟作出何种估计？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斯姆尔科夫斯基在70年代初与记者的谈话记录（见《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苏联侵捷前后》）中找到答案。

记者问：“据说苏联人在一开始就提出了警告，并且暗示他们将必须进行干涉。你们是否可以推断出，他们同时也在考虑进行军事干涉呢？”

斯姆尔科夫斯基回答说：“这种说法我们也听到过。但是我可以肯定，直到1968年8月20日晚上11点半以前，关于他

们决定用军队入侵我国并占领我国的说法，我没有直接地从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个人那里听到过，也没有间接地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过。如果我听到过这类话，哪怕是从第二者那里听到，我也会坚决地、具体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会向党的主席团提出这个问题。总之一句话，我不会不管这件事。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我参加过同苏联领导人的几次会谈，在会谈中也从未听到过这类话。”

记者问：“你也没有听到过其他的威胁性的话，或者表明可能要采取经济制裁和其他制裁等的威胁性的说法？”

斯姆尔科夫斯基回答说：“我没有听到过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出他们要进行军事干涉之类的话。听到的只是批评、他们的论断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有关这种威胁的话，即使是间接的、隐讳的威胁的话，我也没有听到过。”

苏联人的不动声色，显然成功地麻痹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对于军事入侵的警惕性。

● 格列奇科和柯西金来访

苏联的军事入侵虽然没有在5月份发生，但是莫斯科以及华沙条约国与布拉格之间的唇枪舌战却愈演愈烈。

5月8日，一直是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门重炮的苏联《文学报》发表文章，点名指责支持改革的捷共学者普罗哈兹卡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对苏联。第二天，民主德国的《新德意志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该报还连续发表文章，谴责捷改革派“与西德复仇主义者”狼狈为奸。5月14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又发表文章，恶毒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创建人马萨里

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并说他在1918年曾经用20万卢布收买人去暗杀列宁……

捷克斯洛伐克对于这些攻击立刻予以还击。5月13日，布拉格电台国际时事节目评论说：苏联、东德和波兰对捷的攻击“是如此骇人听闻的蛊惑之词，以致对这一套颇为熟悉的人也为之瞠目结舌……我们从亲身体验中知道，少数几个人用什么方法和诡计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整个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近2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相信，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5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切尔尼克和两位副总理希克、胡萨克，在布拉格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切尔尼克首先讲话，他宣称，新政权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他告诉记者们，国民议会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报道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此外，一个建立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新宪法和一个新选举法也正在起草之中。希克则对经济改革发表了谈话，并宣布说，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在经济方面进一步实行权力下放，以便提高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计划。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切尔尼克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邀请苏联总理柯西金来访。但是，估计他“不会近期前来”。可是三天后，柯西金却突然在布拉格出现了。

但在此之前，5月17日中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8名苏联高级将领组成的代表团，首先突然抵达布拉格机场。当谈到此次访问的目的时，苏联官方的惟一的解释是：他们是来同捷军队新领导人互相认识一下的。

由于苏军代表团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捷克斯洛伐克记者仓促地赶到了机场进行采访。当晚布拉

格电视台播放了女记者哈弗利奇科娃在机场采访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的镜头。

风姿绰约、美艳照人的女记者把话筒举到了将军的面前，问道：“据最近巴黎一家报纸报道，您曾在4月25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过，只要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援助，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您能否谈谈是否确有此事？”

于是，布拉格人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都看到了苏联将军的尴尬：在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叶皮谢夫勉强微笑了一下，用俄语回答道：“这是胡扯。”随后即以匆匆离去的步伐，结束了这次令他极为恼火的采访。

这时，电视新闻突然被打断。播音员插播了一条最新消息：苏联总理柯西金刚刚飞抵布拉格进行“短期休假和治病”。而一小时后，捷通社发表的公报又说，柯西金是应捷共中央的邀请来访的，“估计柯西金在捷逗留期间，将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就双方关心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这是在格列奇科抵捷5小时之后的又一次突然来访。苏联方面直到柯西金的专机从莫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才向布拉格通知了苏联总理的这次访问。于是，当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外交部长哈耶克，以及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刚刚赶到机场，柯西金的专机就降落了。

据西方一些苏联问题专家分析，柯西金与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苏斯洛夫，在苏联最高领导决策层中属于“鸽派”人物。当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以及华沙条约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最起劲地叫嚷要对捷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柯西金和苏斯洛夫最初是反对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苏联在此时派出柯西金访捷，显然是想在军事入侵前通过

劝说解决问题。

5月18日，柯西金前往总统府与捷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似乎对于会谈结果十分满意。捷通社在当晚发表的一条消息中称：捷方与苏联总理的会谈表明，“捷克斯洛伐克选择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谅解”。随后，柯西金就带着他的孙女前往卡罗维发利疗养地。捷通社也受权宣布，苏联总理将在那里进行10天的疗养，并将在那里与切尔尼克总理就经济援助问题举行会谈。

西方记者们对于这种类似莫斯科公报的提法表示怀疑。但是，受权与少数外国记者谈话的捷共官员强调，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们说，在莫斯科会谈以及随即召开的华沙条约领导人会议之后，确曾存在着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装干涉的“现实可能性”。可是，莫斯科后来断定，没有可能及时在布拉格组成一个会“要求”苏联帮助政府，因而武装干涉的计划已被抛弃。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开始感到最危险的关头已经度过。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捷方领导人的一厢情愿。格列奇科元帅及其智囊团在捷期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入侵这个国家的可能性的考察和研究。与此同时，他们还与捷有关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苏联军事代表团在大谈了一通苏捷友谊之后，便以共同防御联邦德国为借口，提出了在捷驻扎1个师的要求。当驻军要求遭到捷方严辞拒绝后，他们又提出要在捷境内举行华沙条约国的军事演习。

捷方以军事演习将妨碍田间夏收为由予以拒绝。苏方则强调，这将是一次只有少数参谋人员参加的司令部演习，不会对捷农村工作有太大的影响。捷方找不出理由反对，只好同意。但捷方提出，演习结束后华沙条约国部队必须立即撤

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当苏方对此作出保证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5月24日宣布，华沙条约国将于6月份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以检验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协同和指挥能力，改进部队和指挥机关的战斗准备状况”。

5月22日，即格列奇科一行突然返回莫斯科的当天，外界纷纷传说，这表明苏军元帅和将军们对柯西金过分调和的姿态感到不满。布拉格报纸也满怀忧虑地报道说，格列奇科等人之所以急忙赶回去，是为了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情况。

相比较而言，柯西金在捷的表现似乎更带有和平与安宁的气息。5月19日，身穿一件深色大衣、头戴银灰色礼帽的苏联总理，领着他的孙女伊利娜在卡罗维发利散步。在5名苏联保安人员的暗中保护下，他们从一个泉眼走到另一个泉眼，心情愉快地喝着矿泉水。这安详的祖孙俩并未被众多的东、西德游客们认出来。下午，他们又在维多利亚式的黄色的雅沃里纳别墅小憩。

但是，就在5月24日捷方宣布军事演习的消息之前几小时，柯西金也提前4天结束了他的“疗养”，匆匆返回了布拉格。他在卡罗维发利与切尔尼克举行的经济会谈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官员对于苏方突然中断谈判，感到迷惑不解。以后的事件表明，这是苏联最后一次尝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既然杜布切克及其改革派表示，劝说或收买都不能使他们放弃改革决心，那么就只好采取别的手段了。

当布拉格最终被迫同意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时，杜布切克等人可能还没有理解到它的含义。这次军事演习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已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军事危机之中。

● 华约部队军事演习

1968年5月29日至6月1日，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五月全会”）在布拉格城堡召开。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确认杜布切克的领导并支持其政策；撤掉若干名誉扫地的亲苏人物的高级职务；而最重要的是使党的全部机构“民主化”，并决定召开一次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令改革派感到沮丧的会议。尽管在全会召开前的几天中，写给捷共领导的信件和电报如雪片般飞来，纷纷要求撵走保守派。但当全会开幕之后，杜布切克等人才发现，改革派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不能控制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因此，他们想将主要保守派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计划最终落空。这一任务只好留到9月上旬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去解决了。

改革派在这次全会上取得的少数成果是：将诺沃提尼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暂停诺沃提尼及其他6名官员（前公安部长巴契列克、前司法部长拉伊斯等）的党籍，以审查他们在50年代大清洗中起的作用。

除此之外，最终通过在9月9日召开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改革派在这次中央全会获得的又一重大胜利。杜布切克寄希望于搞好在夏天举行的党代表选举。这样，在9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能选出一个改革派占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来，从而为《行动纲领》的全面推行和改革的深化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保守派对于能将最后摊牌推迟到9月的十四大上也感到

满意，因为这就给了他们、也给了莫斯科更多的时间。他们已经预感到，在此期间很可能会发生其他事件，来帮助他们的事业成功。而这种保守派所企盼的意外的事件，恰恰就在“五月全会”召开的第二天就发生了。

5月30日，参加华沙条约军事演习的苏联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立刻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以至于人们对正在进行之中的中央全会都不再关心了。

5月29日，以华沙条约部队总参谋长、苏联将军卡扎科夫为首的华沙条约总部代表到达布拉格之后，只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告，说苏、波、匈、捷四国部队将参加这次演习。

5月31日，布拉格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苏军车队从乌克兰的乌日戈罗德地区开进斯洛伐克的电视片。这突如其来的部队调动使捷克斯洛伐克十分诧异。因为原定于6月份举行的军事演习似乎提前了，而且捷军事情报官员说，苏军的人境事先并没有得到捷国防部的同意。

此外，这次军事演习的规模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格列奇科来访时双方达成的协议，捷国防部长楚尔曾于5月24日宣布，6月份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举行的是一次“参谋演习”。5月30日，楚尔在广播电台中的讲话中也是说，苏、波、匈、捷四国只派出“人数很少的部队”来参加“司令部参谋演习”。可是后来他又说，参加演习的每一个师将由“二三百人”来代表，而据捷国防部人上报告说，这种被代表的师至少有10个。这样，所谓“参谋演习”的人数至少就增加到3000人之多。

苏联在捷共中央全会召开期间突然提前举行军事演习并扩大演习规模，无非是想向改革派施加压力。果然，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演习”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中央委员会中的保守派，使他们比1月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团

结和充满信心。原本寄希望在这次全会上向保守派发动进攻的杜布切克，结果却不得不在保守派的进攻前处处防守，陷入相当被动的地位。

6月1日“五月全会”闭幕时，只发表了一个《五点决议》：1. 保证共产党对于社会的政治领导作用；2. 保卫社会主义的发展，保卫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3. 努力使新的政治制度能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相适应；4. 反对一切破坏法制、瓦解国家机关的企图；5. 在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运的关系。

如果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达到的改革成果相比较，这是一个倒退的决议。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杜布切克，终于决心投入激烈的战斗了。中央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他就来到摩拉维亚重镇布尔诺市，在6000人参加的党的干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对政局进行了坦率的批评。

他说，“右派”和“保守派”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中“最大的危险”。紧接着，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人叫作“反动派”，并把他们的活动同莫斯科联系在一起。杜布切克指出：“在各种大小会议和公开场合，我们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对于苏联的态度，我们驳斥了对捷苏联盟的一切攻击，就像驳斥对我们党的攻击一样。可是，我们仍然看到——尤其是在最近一个半月之内——这么多的消极反应，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与会者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杜布切克接着讲道：“必须说清楚，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政策看作是别人应该效法的榜样。我们不会根据我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衡量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我们保留根据我们的情况和传统来处理我国内部事务的权利。既然如此，我们也不要去剥夺别国的这

种权利，不要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来干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杜布切克在布尔诺演说的时候，他的战友们也在全国各地向党组织进行着改革的宣传。保守派也同样很活跃。因为双方都知道，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今后几个星期要选举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决定谁胜谁负的关键时刻。

此时，替代诺沃提尼而成为保守派新领袖的是捷共中央书记、47岁的阿·英德拉。保守派在5月份就议论说，英德拉是苏联看中的人选，让他“在目前乌七八糟的情况结束之后”取代杜布切克担任捷共第一书记。

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加紧了分化改革派的工作。

1968年6月4—14日，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礼节性回访，捷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率领捷议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飞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后，捷国民议会代表团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欢迎。随后，代表团前往斯大林格勒进行第一站友好访问。在那里，斯姆尔科夫斯基利用一切机会介绍捷国内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强调了对苏联良好的兄弟般的关系是不可动摇的信念。尽管他只是原则性地提到了两国间的分歧，并没有谈及细节，但还是引起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注意。

三天后，当代表团从斯大林格勒返回莫斯科并飞往里加时，曾任驻捷大使的齐米亚宁成了捷议会代表团的新向导。在飞往里加的途中，齐米亚宁提醒斯姆尔科夫斯基：希望他在讲话中不要谈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不要谈那些民主化之类的问题。接着他又解释说，苏联人消息不灵通，他们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既然三言两语讲不清楚，那么就只会

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混乱。斯姆尔科夫斯基满足了主人的愿望，此后在讲话中便很少谈及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改革情况。

访问即将结束时，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为苏联记者举行了招待会。他对苏联记者的提问作了通俗而明确的回答。但是，当一名记者以挑衅的态度指责捷克斯洛伐克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并向其贷款时，斯姆尔科夫斯基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据理力争道：“苏联政府拿不拿西方贷款呢？拿。你们甚至允许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公司以及日本的许多大公司来苏联投资建厂。向西方国家贷款，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苏联就是这样做的，我也认为这是正确的、可取的。但令人奇怪的是，惟独当我们要做这类事情的时候，尽管范围还要小得多，你们却要指责我们，这是为什么呢？”

在即将告别苏联时，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代表团受到了勃列日涅夫长达一个小时的正式接见。接见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勃列日涅夫甚至“眼含热泪”地表示，苏联从没有想要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进程。

但当会见结束后，勃列日涅夫却又把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人留下来个别谈话。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单独会谈，就连极为亲苏的捷驻苏大使柯茨基都没让在场，苏联方面也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

此时，勃列日涅夫的腔调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对捷局势的发展表示担心和不满。接着又谈起了领袖问题。在谈到杜布切克的个人经历和党的工作经历时， he 表示了对捷共“一月全会”的选举结果感到不满，暗示杜布切克不适宜担任捷共第一书记的职务。

随后，勃列日涅夫话锋一转，又以十分友好的口气谈起

了斯姆尔科夫斯基本人。他说，苏联领导人在这几个月中对你不很了解。在德累斯顿会议上对你的攻击请你原谅。据斯姆尔科夫斯基本人讲，他当时真是被勃列日涅夫的这番花言巧语给感动了，并且原谅了他们。

但很快斯姆尔科夫斯基便搞清了勃列日涅夫的用意。勃列日涅夫不断地夸奖斯姆尔科夫斯基是献身革命事业40年的老同志了，弦外之音是想让他出来负责，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从此之后能够按照苏联人的意愿来发展。斯姆尔科夫斯基立即予以严辞拒绝。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这席话使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知道他在向我建议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采取既适当而又明确的方式加以拒绝。我保卫了杜布切克。我不仅捍卫了我们的政策，而且也保卫了杜布切克。我说，形势发展很快，一下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杜布切克能够控制局势，他能够成为一个党的真正领袖。总之，我干脆地拒绝了这个实际上已经向我提出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竟然向杜布切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进行瓦解试探，可见此刻克里姆林宫推翻杜布切克的决心是多么强烈了。

正在进行之中的华约军事演习，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最为关注的焦点。

6月初，捷国防部长楚尔接到苏联方面的一项秘密要求，要他许可苏联坦克和飞机参加华沙条约国部队的“参谋演习”。不知楚尔是否答应了这一要求，但事实是6月3日夜至

4日凌晨，一支强大的苏联坦克师从波兰悄悄地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整个布拉格都在议论着规模日见扩大的军事演习，据说第二天还将有大批苏联部队涌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驻布拉格的美国记者塔德·舒尔茨为了搞清楚情况，于6月5日清晨驾车朝利巴瓦方向驶去。

在从布拉格通往赫拉德茨—克拉洛维的公路上，他遇见了一批指挥交通的捷军事警察，并可以看到苏军在路边田间架设的电台。这条公路上的每座桥梁都换上了新的交通标志，他由此得出结论：大量重型军事装备的运输即将开始。当他驶离赫拉德茨市的时候，看见3架米格21战斗机低空飞过。在赫拉德茨和奥洛莫乌茨之间，他发现了几辆用帆布蒙着的火箭运输车。再往前又是一个由100余辆卡车组成的长长的车队……显然苏军的先头部队甚至连规定的演习时间都等不及了，提前就越过边境进入捷克境内。

6月上旬，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部队也紧随苏军之后开了进来。华沙条约国部队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蝗虫一般迅速涌入，以至于从各个方向涌进的这支大军究竟有多少人数，就连捷军事情报部门也都说不清楚。

6月18日，华沙条约的军事演习正式开始。据一些外国记者估计，此时以演习为名调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波、匈、东德部队，至少有2.5万人之多。但也有入估计，到整个军事行动结束时，开入捷境内的外国军队也许不下5万人。这实际上是苏军8月20日入侵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占领。

就在演习接近尾声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6月27日，一份由小说家瓦楚利克执笔、有70名具有代

表性的知识分子签名的致“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及所有人”的声明，发表在《文学报》和其他报刊上。

尽管这份被人简称为“两千字声明”的文件，满怀激情地表达了知识界坚决支持捷共领导及其《行动纲领》的良好意愿，但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无知。针对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压力，“两千字声明”写道：

最近时期，外国势力干预我们国内的发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不安。面对优势，我们要庄严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要先冒犯别人。我们可以向自己的政府表示，只要它按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手拿武器来支持它。

杜布切克也意识到这是一份极端危险的文件。它那十足的火药味肯定会煽起克里姆林宫的怒火，并最终导致可怕的后果。然而，这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正在布拉格的苏共中央委员、《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已经向莫斯科发回了“两千字声明”的全文。克里姆林宫的反应可以说是近乎歇斯底里了。

先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在捷共党中央大楼门前的台阶上，遇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怒气冲冲的齐米亚宁。这位昔日的苏联驻捷大使竟然不顾外交礼仪，当众怒斥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很快，杜布切克也接到了勃列日涅夫打来的电话，抗议这一“反革命”的正式宣言。杜布切克回答说：“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苏方的提醒将会受到极大的重视，并将对此采取最坚决的措施。”

随后，杜布切克即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

切克和克里格尔等人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一致同意为平息苏联的怒火和不给克里姆林宫以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口实，必须尽快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发表一篇声明，对“两千字声明”进行公开谴责。

捷共中央主席团很快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后被简称为“一千字声明”）。主席团声明承认，“两千字声明”的签名者并没有破坏的企图，根本不是反革命；但也对该声明中关于在政府遇到危险时“甚至手拿武器来支持它”的说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它试图唤起人们狂热的做法是“对整个民主化过程的明显的威胁”。第二天，杜布切克又一次谴责了“两千字声明”。

从表面上看，布拉格官方的谴责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怒火并未因此而真正熄灭。随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苏联及东欧各国始终抓住“两千字声明”不放，称之为“反革命”宣言书，并且围绕着声明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了一系列猛攻，大造舆论。“两千字声明”最终成了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借口。

可是在当时，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他们开始纷纷离开城市，到乡间度假去了。数千名外国旅游者也都涌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汽车同参加演习的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及军车混杂在一起，显得是那样地不协调。

不过，也有个别头脑清醒的人对于形势表示了担忧。6月底，一位布拉格记者私下的分析也显得颇有道理：

我们要根据逻辑来判断形势。当前的改革运动势头很大。它唤起了这么多的希望，所以要叫它停止是不可

能的。杜布切克是不会让这个运动停止的，除非他被赶下台；而如果不发生什么突然事件，他也是不会下台的。因此，俄国人别无选择，只有入侵我国。因此，结论只能是：这场入侵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

可惜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能够看清楚形势的终究是极少数人。甚至那些已经预见到还会发生新的危机的人，也不愿相信苏联真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挂在口头上的一条理由是——现在是1968年，而不是1956年。20年来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在1956年赫鲁晓夫还能够搞垮匈牙利的话，那么到了1968年，勃列日涅夫已经搞不垮捷克斯洛伐克了。

且不论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切尔尼克当时对形势是如何估计的，但在1968年6月27日下午的现实情况却是：莫斯科愤怒地要求采取行动，并且成千上万的苏军已经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只要勃列日涅夫一声令下，雅库鲍夫斯基元帅的部队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战略要点；而部署在边界待命的好几个师的兵力也可以迅速前来支援。假如捷军进行抵抗（苏联估计此种可能性极小），苏联在几小时之内还可以再调几个师来。此外，强大的苏联空军还可以全力支援地面部队。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早已成了苏联砧板上的一块待斩的鱼。就在华沙条约国军事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名东欧记者就曾开玩笑地说过：“要知道，假如捷克人敢越雷池一步，雅库鲍夫斯基就会驱车直奔总统府，并对斯沃博达说：‘伙计，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国家被占领了！’”

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所面临的形势！

第五章

杜布切克说“不!”

● 杜布切克拒绝出席华沙会议

1968年7月1日，布拉格电台宣布，华沙条约军事演习业已结束。华约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也于7月3日宣布：这次演习达到了它预定的目标，华沙条约国部队已开始撤离。可是7月9日，捷国防部长楚尔却声称，只有35%的华沙条约部队已经开拔。这就意味着撤走的只是波、匈、东德的部队，而苏联军队几乎全部仍留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尽管事先柯西金已向杜布切克保证，演习结束后苏军即行撤离捷境，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雅库鲍夫斯基，却坚持要在捷共9月的十四大结束后才撤军。实际上，从苏军进入捷境内后不久，即可看出它们打算长期驻扎下去、赖着不走的意图了。一部分军官甚至带来了家眷，并在部队驻地附近的村镇里征用了舒适的住房。

此外，苏军还在捷境内安装了一整套通讯设施，甚至配备了广播电台和理论上能够干扰捷无线电广播的电波干扰设备。而在军事演习之前，苏军以演习需要为名，将一批最先进的微波通讯设施运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直到入侵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苏军早在入侵两个月前，就在为入

侵后在捷全境迅速建立起最先进的通讯设施作准备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一再催促下，苏联军方想方设法地制造出种种借口拖延撤军。开始他们以“为了避免引起周末公路上的交通混乱”为由，要求延期撤离。随后又说，他们感到有必要同地方上的人民举行告别集会。下一次他们又说，为了修理损坏的装备，必须召来新的部队。最后则又提出，因为从东德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机械化装甲部队要返回苏联，打算经由斯洛伐克东部穿越这个国家。对于苏军如此无赖的做法，就连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刊也忍不住开始给予公开的奚落了。

杜布切克意识到了局面的危险性。于是，他不惜冒着对抗莫斯科的风险亲自出面了。7月10日晚上，杜布切克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强烈要求苏军迅速撤出捷境。他最后甚至威胁说：“如果您那一方让这样的事态继续下去，那么，两国间保持着的友好关系，将因此而遭到全部破坏。”

这一威胁确实有了效果。两天之后，华沙条约缔约国发表了军事演习正式结束的公报，宣告撤军将开始。7月13日，苏军至少已从所占领的战略地区撤出，并开始拆除它的通讯设施。但一部分大部队却重新集结在斯洛伐克西部，在那里又磨蹭了三个星期才最后撤离。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莫斯科的缓兵之计。眼下的后退一步，正是为了日后的前进两步。

就在7月8日这一天，杜布切克分别从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五国收到了措词几乎一致的信件，邀请他于7月11日去华沙参加“最高级”会谈。会议内容是讨论“两千字声明”引起的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事业的威胁。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就是否出席华沙会谈举行会

议。会上，主席团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这显然不是一次什么协商会议，而是要对捷共领导进行新一轮的审判和围攻。在德累斯顿会谈中饱尝围攻苦头的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都表示不愿再次受罪。会议进行表决时，连“中间分子”也站在了杜布切克一边。只有比拉克、科尔德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卡佩克投票赞成参加华沙会谈。

7月11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又送来了一份可以说是强迫性的请柬。为了给这封请柬帮腔，《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捷国内局势的文章。文章指责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蔓延着“反革命”，并把当时的形势同1956年的“反革命”匈牙利事件相比拟。文章最后恫吓说，当年的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最终还是被苏联坦克消灭了。任何人都不难听出其弦外之音：如果捷领导人不接受华约邀请，那就只有进行武装干涉了。

但是，苏联的恫吓不但没改变捷共主席团拒绝出席华沙会谈的决心，反而更加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切尔尼克尖锐地指出，苏联领导人情急之下有可能作出任何事情，对此我们不可不防。为此他建议：“在目前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党的主席团不应该离开共和国领土，不应该去参加在共和国领土以外召开的任何会议。”

尽管杜布切克等人没有出席，但是，苏、波、东德、匈、保五国领导人最高级会谈还是在华沙照常举行，只是时间推迟到了7月14日。

苏联代表团的阵容非常强大，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乌克兰党魁谢列斯特以及负责与执政的共产党联系的书记卡图谢夫出席了会议。东道主哥穆尔卡以及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也都带着自己最高级的助手参加了会议。

就在会议举行期间，布拉格又打了克里姆林宫一记耳光。

7月15日，普尔赫利克中将发表谈话，建议彻底改组华沙条约。他说，华约的所有缔约国在决定问题时，都应有平等的一票。同时又提出决不应该用华约来为政治目的服务。有人将后者视作捷对华约准备入侵的一次警告。

但是，华沙会议在7月16日写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信中，却十分明确地坚持了华沙条约的这种政治作用：

我们深信，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对你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进攻，有使你们的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从而危害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

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引起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

这是华约组织向捷改革运动发出的最后通牒：立即刹车，否则就将干涉！

7月17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一封反驳这些指责的复信。复信在逐条驳斥联名信对捷改革罗织的罪名后明确写道：“没有任何现实理由把捷克斯洛伐克当前局势叫作反革命局势，没有任何理由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到危险。”复信坚定地表示，捷共将继续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复信并且指出，在一个兄弟党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会议来判断该党的活动是否正确的做法，是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的。这等于在警告华约各国不要去管别的国家的闲事。复信最

后表示，捷共领导人愿意通过会谈解决问题，可以首先由捷方同几个盟国举行双边会谈，然后再召开全体会议。

捷共主席团会议还决定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复信内容进行表决。这一决定的作出，反映了杜布切克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因为在此之前，由于中央委员里的改革派、保守派和“骑墙派”各占 1/3，杜布切克一直因害怕在表决中失败而不敢召开中央全会进行表决。

然而，到 7 月 19 日中央全会召开的时候，苏联人施加的高压政策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捷共中央委员会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107 名中央委员中有 88 人出席了会议，而与会者一致投票支持杜布切克和主席团拒绝华沙来信。这意味着就连在主席团会议上持反对态度的比拉克、科尔德和英德拉之流也已经意识到，在此关系到民族利益的关键时刻，只有投赞成票才是明智之举。

苏联军队一直赖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不走，无非是向捷共中央施加巨大的压力，企盼着在此期间能产生替代杜布切克的所谓“健康力量”。但是，捷共中央全会的表决结果却足以证明，莫斯科的高压政策只能适得其反。如果克里姆林宫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思想感情能有一点起码的理解，那么这件事就足以使它就此止步。但是，苏联领导人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听不进任何敦促他们谨慎小心的劝告。于是，勃列日涅夫最终傲慢无礼地拒绝了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建议。

7 月 19 日，即捷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当天，莫斯科又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发起了新攻势。这一天的《真理报》上同时发表了两条新闻，一条是揭露所谓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阴谋推翻捷政府的秘密文件；另一条是揭露在靠近西德

的捷西部地区索科洛夫县，破获一个“秘密军火库”案件，并说库里的美制武器是为西德复仇主义者准备的。后一条消息确有此事，只是包装这批美国武器的却是苏联制造的麻袋。这显然又是克格勃的杰作。莫斯科编造这些子虚乌有的消息，无非是企图给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扣上一顶“反革命叛乱”的帽子，为苏联最后的武装入侵制造“合理”的借口。

● 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

7月下旬，克里姆林宫在一心盼望的捷内部“健康力量”最终也没能挺身而出的情况下，被迫同意捷共中央关于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莫斯科向捷共中央发出了邀请信，建议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与苏共政治局成员于7月23日举行双边会谈。苏方提出了三个会谈地点供捷共选择：一是苏联首都莫斯科，一是乌克兰首府基辅，第三个则是靠近捷边境不远的乌克兰城市利沃夫。

出乎克里姆林宫意料，杜布切克对于苏方建议再次说了“不”字。捷共中央主席团的答复是：同意与苏共举行双边会谈，但拒绝前往苏联赴会。会谈必须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举行，并且只有到参加军事演习的苏军全部撤离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会谈才可以在捷境内举行。

捷共中央的这个态度自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担心当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都在苏联领土内的时候，苏方可能将他们隔离开；或者逮捕改革派成员，而强迫其余的人宣布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正统的统治者。这可绝不是庸人自扰，早在1948年，莫斯科就曾对铁托作过类似的尝试。铁托在他

80 岁生日时亲自证实了这点。

7 月 25 日深夜，捷克斯洛伐克人得知，命运攸关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谈将于 7 月 29 日在靠近苏联边界的捷克斯洛伐克某地举行。危机临头之感加深了。7 月 26 日，《文学通讯》出了一期号外，登载了捷知识分子对其领导人的《呼吁书》。由捷作家科霍乌特执笔的《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

在你们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的前夕，我们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这种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几百年来，我国的历史是一部受奴役的历史。除了短暂的两段时间以外，我们都被迫用非法的手段来争取民族生存。我们有好几次都走到了毁灭的边缘。

经过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并不是解决不发达国家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人类文明的惟一真正之出路。

我们曾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将第一个站出来热情欢迎这种发展。但事与愿违，我们被扣上背叛的罪名。那些给我们下最后通牒的同志们所发表的声明表明，他们对我国的局势发展缺乏了解。他们指控我们的罪行，我们并没有犯过；他们强加在我们头上的那些意图，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防止发生这样的危险。你们的任务是说服苏共领导人，使他们相信，根

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全部目标，可以用四个词来表达：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今后的几天里，我们将每时每刻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们也时刻想念着我们。你们正在书写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希望你们要审慎，但更要勇敢无畏。我们信任你们。同时，我们希望所有赞成我们意见的公民支持我们的呼吁。

7月26日晚上，杜布切克在布拉格接见了工人代表，并对他们说：“捷克斯洛伐克希望从苏联人那里争取到更多的行动自由，但同时也不想把它同莫斯科的分歧弄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你们放心吧，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将不仅能成功地捍卫我们的理想，而且还能赢得更多的行动自由。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对我们谈判的最大的支持。”

7月28日，莫斯科和布拉格的官员同时宣布，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谈，将于第二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

切尔纳位于斯洛伐克东南角，是捷、苏、匈三国边界交叉处附近的一个只有2000人的小镇。在它南边10英里处是蒂萨河，这条河从匈牙利流入斯洛伐克，然后蜿蜒曲折地沿苏匈边

界而下，最后重新折回匈牙利。切尔纳还是捷苏两国铁路的主要连结点，距离苏联边界只有2英里。这也就是它被最后选作会谈地点的重要原因。苏联方面既不愿意让他们的东道主供应膳宿（他们自带了食物、厨师甚至饮用水），更不愿意使用他们的通讯设施，于是苏联人每天乘专车来，当天工作结束后，晚间又乘同一列专车越过边界，返回到乌克兰的乔普过夜。

当一列由15节防弹车厢组成的专列从苏联载来9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列火车从布拉迪斯拉发载来11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来到切尔纳的时候，这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注意的中心。

苏联专列抵达后，杜布切克登上车厢去欢迎他们。当勃列日涅夫看到车外前来采访的大批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后，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他可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政治讹诈，所以当即斥责杜布切克不该公开会谈地点。勃列日涅夫光着头，面无表情地踏上月台，同在场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冷冷地握了握手。只是当走到斯沃博达总统面前时，才对这位“二战”时的老战友给予了传统的拥抱和接吻。

苏联代表团派出了强大的会谈阵容：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乌克兰党的领导人谢列斯特、拉脱维亚党的领导人佩尔谢、白俄罗斯党的领导人马祖罗夫，以及谢列平和沃罗诺夫。只留下两名政治局委员波利扬诺夫斯基和基里连科在莫斯科看家。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是杜布切克。代表团包括了当时还不是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斯沃博达总统。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总理切尔尼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比拉克、以及什帕切克、克里格尔、科尔德、

什维斯特卡、巴尔比雷克、里戈、皮列尔。

7月29日上午，捷苏两党的最高级会谈在戒备森严的切尔纳铁路工人俱乐部礼堂举行。两个代表团都住在自己火车的卧车里，火车并排停在铁轨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专列停在窄轨上，苏联的火车则停在宽轨上。对此，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能忘记我国人民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话，他们要我们提防这些铁轨，不要被突然弄到那边去了。我想，我国人民思想上产生这种不信任是很严肃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

会谈的第一天，是由勃列日涅夫把一捆厚厚的剪报放在桌子上开始的。这些剪报资料包括了从思想自由到西德的“军事威胁”，从未来的捷共领导机构到将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的一切主题。勃列日涅夫在他发言中不断地责难捷共中央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目标，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

接下来，杜布切克代表捷共中央主席团作主要发言。他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一切指责，并且坚定地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惟一目标就是建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当勃列日涅夫说捷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时，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72岁的斯沃博达总统气得满脸通红。

在第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是由双方代表交替发言。苏联代表反复提出来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和国内的“自由化”问题。最初，承担大部分发言的是杜布切克。他耐心地对上述责难逐一加以批驳。在外交领域，他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的忠诚。在军事领域，他力陈捷克斯洛伐克的坚定立场。至于内政的《行动纲领》，杜布切克把它叫作真正最好的社会主义来加以辩护。他还积极地否认指责他在做着有“复

辟资本主义”危险的事情。

为了证明捷克斯洛伐克是在搞社会主义，杜布切克和总理切尔尼克还拿出了详细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掌握的工业、农业、贸易所占的比重。随后，他们又将这些数字同波兰、匈牙利、东德作了比较，并且尖锐地指出，在苏联几个“可以信赖的”国家的经济中滋蔓着“私营企业部门”，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却是不存在的。

第一天的会谈就在双方互不相让的僵局中结束。晚上10点半休会，苏联代表团乘火车返回到边境那边的乔普过夜。

送走苏联代表团后，杜布切克并没有休息。这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切尔纳周围散步，同铁路工人们聊天。尽管工人们对他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但杜布切克却情绪阴郁。他原来希望花一整天开正式会议，大约再加上一个上午起草会谈公报，整个会谈就可以结束了。但从第一天会议情况来看，莫斯科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容易被说服。

杜布切克意识到自己失策了。因为当他们在布拉格准备会谈期间，他的一位顾问曾向他建议：代表团应带上配备整齐的顾问班子，并编制一个同首都联络用的密电码。但是，杜布切克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回答道：“搞这种玩意干啥！我们反正是在本国境内嘛！”

与此相反，苏联在边境的那一边则准备了大批专家和大堆资料，只要他们需要便可随时调来。而且克格勃从第一天起，就窃听了捷代表团与布拉格之间的全部通话。这样，莫斯科方面就掌握了捷共代表团第二天的会谈动向，从而争取了主动。杜布切克后来在解释这一重大失策时说道：“这要怪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真正自由的气氛。也许你们难以相信，我们早已把窃听电话这类丑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次日的会议，是由勃列日涅夫挥舞一份捷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开始的。勃列日涅夫翻开报纸，指着当中一张上的一则广告发起了攻击。这是捷克某个党支部征聘书记的广告，要求的条件只是大学的学位。勃列日涅夫咆哮道：“从没有经过共产党训练的普普通通的人中选用党的干部，这就是你们要搞的事情？请问，照这样搞，共产主义会搞成啥样子？”

杜布切克承认这种做法确实很荒谬。但同时又解释说，这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希望苏方不要抓住某些枝节现象，就对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轻易地作出结论。

勃列日涅夫又转而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他怒吼道：“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爪牙，至少也是干着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事情！”

随后，苏联代表团又将讨论的话题转到军事问题上。苏斯洛夫指责捷克斯洛伐克在过去的数月里多次辜负了对它的信任，竟将有关华沙条约部队的部署和计划的重要情报，泄露给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他由此引出结论：仅靠捷克斯洛伐克单独保卫与西德接壤的波希米亚前线，无论如何苏联是不放心的。为此，苏联军队应该进驻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

继苏斯洛夫的指责之后，兼任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的谢列斯特，又对捷共中央的国内外政策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他指责捷方印刷传单，并把它散发到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曾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州，战后被苏联割占过去。谢列斯特甚至还辱骂克里格尔是“哈里奇的犹太人”，不配作他的谈判对手，等等。

谢列斯特是苏共政治局中最强硬分子。他毫无根据的肆

意诽谤，使得一直作心平气和解释的杜布切克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不等谢列斯特讲完就站了起来，郑重地声明：“假如您继续用那种措词的话，我们将收拾东西回家去。我们将不再继续参加这样的会谈，因为即使再进行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捷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站了起来。斯姆尔科夫斯基向契尔沃年科走去，严肃地对他说：“请您把我——一个国民议会主席的话正式转告给您的政府，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

说完，他便紧随杜布切克走出了会场。捷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也纷纷退出了会场，回到了自己的专列上。

但是，第二天的会议并未因此而结束。因为勃列日涅夫很快就在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苏斯洛夫和谢列斯特的陪同下，来到捷共代表团的专列上进行了拜访。他们向捷共代表团道了歉，并且承认谢列斯特讲得太过分了。双方在捷共专列中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在经过一番调解之后，终于决定将当天的会议继续进行下去。

在随后的会谈中，捷共方面唱主角的改由斯沃博达总统担任。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与苏联军队并肩作过战的老将军，至今还受着苏联人民的敬佩和尊重。1965年，即在他70岁生日之时，苏联曾因其战时的功绩而授予了他最高的褒奖——苏联英雄称号。而这在外国人中，则是极其罕见的。

斯沃博达总统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他的发言是坦率、雄辩的，极其动人的。他首先指出，苏联所谓捷克斯洛伐克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是“不可理解”的。他还以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大讲特讲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与苏联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他说：“那封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在

帮助帝国主义者们的华沙联名信，它的大多数签字国在上次大战中，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呢？匈牙利、保加利亚这几个国家，都曾同希特勒并肩作战，民主德国就更不用说了。而另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却是和苏联一起对希特勒作战的。”

针对苏方攻击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界防御薄弱，并想以此为借口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将军雄辩地说道：“在今年初夏时节，我同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一起，巡视了那些防御地域的情形。就在那次视察旅行之后，这位苏联元帅曾亲口表示：部署在那里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士气、装备、临战状态，都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现在，你们竟然又说什么在为捷西部防御担忧。那么，是这位元帅在当时撒了谎呢，还是如今苏联领导人们竟然把自己的部队指挥官当作傻瓜来责备呢？”

随后，斯沃博达代表捷共代表团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他甚至公开指出，当前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危机”应由苏联负责，因为捷目前的形势完全是由苏联支持的诺沃提尼一手造成的。他最后甚至用辞职相威胁，他说：“只要苏联方面不改变态度，我就将辞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职务。我已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对于总统的职务毫不留恋。更何况这一职务也并不是我自己谋求的。我本是一介农夫，因此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挂冠归田的……”

在斯沃博达带动之下，捷共代表团转而采取了攻势，尝试依靠同样大胆的方法来坚持他们的立场。杜布切克在发言中继续追究责任。他拿出了许多能够证明诺沃提尼是从莫斯科接受直接命令、然后才行动的苏方文件。而且其中有几份文件，就是由此刻正坐在桌子对面的勃列日涅夫签署的。

双方的责难和回敬不知反复了多少回合，语气也开始越

来越激动。斯沃博达再次以辞职相要挟，甚至还说要把苏联英雄勋章退回去。据说，在激烈的争吵中，斯沃博达和勃列日涅夫都掉了泪。

面对捷代表团提出的铁证和雄辩的发言，勃列日涅夫感到理屈词穷，于是他只好借口“心脏病”突然发作退出会谈。苏联代表团中的几个人马上以团长缺席为理由，提出中止会谈，苏联代表团准备返回莫斯科。也有另一种说法说，勃列日涅夫当时真的是心脏病突然发作了。但不论是真是假，总之切尔纳会谈再次出现了重大危机。

第三天上午没有举行会谈。杜布切克独自登上苏联代表团的专列，去看望病中的勃列日涅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则邀请波德戈尔内、柯西金一起到小镇上去散步。即使在轻松的漫步中，双方也仍然没有停止讨论会谈中的各种问题，只是谈论的气氛要缓和得多了。

杜布切克与勃列日涅夫在车厢中进行了一上午的单独会晤，总算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分别开列出双方取得一致的以及至今仍有分歧的各点意见的清单。这个处理办法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得到了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切尔纳协议”。

当时克里姆林宫究竟想在哪些问题上逼迫捷共中央让步呢？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其回忆录中，将苏方提出的种种要求归纳为下面五点：不让克里格尔担任民族阵线主席；不让切·齐萨日担任捷共中央书记；不允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K-231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制度。

显然，莫斯科最为关心的是对宣传工具管制、人事问题的保证和对非共产主义政治活动的镇压这三个问题。究竟最后写上意见一致清单的有哪些问题，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双

方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另一种说法是，捷克斯洛伐克并未对人事问题作出保证，而只是在外交政策和加强捷西部边境防御（不依赖外国军队）问题上，与苏联取得了一致。

此外，对于所谓的“一致”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因为杜布切克的提法是捷方“注意”到苏方提出的某些问题。“注意”两字并不表示同意。也有人说，他虽然答应了要实行的那几点，但却没有规定时间的限制。

由于没有文字的东西可查，所谓的“切尔纳协议”便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

作为苏联方面，显然是确信杜布切克同意了各种交易，然后回国去等待杜布切克履行那些事情。会谈仅过了一个星期，勃列日涅夫就每天打电话责问杜布切克：为什么不执行“切尔纳协议”？杜布切克向他解释说：捷共中央将在8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研究这些问题。因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

而捷方代表团主要成员斯姆尔科夫斯基则根本否认有什么协议。他在回忆录中说道：“他们（指苏共中央政治局）脑子里先有了想法，然后再对我们讲，之后又说我们不执行决议和协议。这就是所谓的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协议。我们在会谈中只是讲过要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众说纷纭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真相。双方都是带着截然相反的目标来到切尔纳的。纵然达成过若干一致，那也只不过是口头协议而已。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主张已被对方所接受，但实际上，双方对于协议的内容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就是后来双方不断扯皮、并且最终成为苏联武装侵捷借口之一的“切尔纳协议”。

捷苏双方切尔纳会谈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在很迟

才发表的会谈公报中，照例没有讲到会谈的紧张空气和戏剧性的场面。除了写有双方“以同志式的态度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这类陈词滥调外，惟一真实的信息就是：双方一致同意于8月初在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捷共领导人和华沙信件五个署名国的全权代表联席会议。

捷共中央主席团于8月1日晚回到布拉格后，马上在党中央委员会大厦召开了干部会议，向与会者客观地报告了会谈的一切情况。捷共中央似乎认为危险已经过去。当晚，杜布切克对记者们说，他带来了好消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但是，布拉格居民却疑虑颇多，他们并没有对杜布切克的保证感到满足。杜布切克也同样没有感到轻松，两天后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还在等待着他。

1968年8月3日上午，华沙条约国领导人杜布切克、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纷纷步入了布拉迪斯拉发城堡的明镜大厅，开始了切尔纳会谈中确定的华沙条约国首脑联席会议。

召开这次华沙条约国会议，是勃列日涅夫在切尔纳会谈中向杜布切克提出的。这实际上是苏联整个阴谋的一部分。从苏联的立场上来说，它虽然代表几个忧心重重的盟国在切尔纳达成了协议，但这还远远不够，它还必须使它们也负起“集体的”责任来。这次会谈的任务绝不仅仅是盖个橡皮图章，而是在于为今后的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盖上一个同享光荣或同担罪责的铃记。莫斯科考虑得可谓天衣无缝：这样一来，既可以使武装入侵更具有合法性，又避免了由克里姆林宫单独承担入侵的罪名。

问题在于，一直惧怕遭到东欧各党围攻、并拒绝出席华沙

会议的杜布切克，为什么还是答应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个提议？原来，勃列日涅夫在切尔纳向杜布切克交了底：这次六国共产党会议只是想要显示整个东欧集团的牢固团结，捷内政问题将不作为会议讨论的议题。勃列日涅夫还向杜布切克许下诺言，保证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期间，任何人不得对捷内政提出批评。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此保证下才同意了召开这次会议。

果然，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期间，哥穆尔卡（波兰）和乌布利希（东德）两方都认为对杜布切克太“手软了”，对苏联起草的会谈声明草案提出了不满。乌布利希还拼命想写进对“西德帝国主义”更加强硬得多的词句，但是苏联最终压制了他的主张，最后声明只是泛泛地提出“西德的复仇主义、军国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势力更加活跃了”。

勃列日涅夫兑现了他的承诺，会议没有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内政，声明也绝口不提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存在着“反革命”危险。捷共代表团甚至还取得了一个小的胜利，即在关于论述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的自然段中，加上这样一句话：“同时各国党要创造性地解决今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并要考虑民族的特点和条件。”

声明虽然保证在“平等、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进行互相合作，但同时又强调：“在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多方面任务就比较容易在我们每一个国家中完成。”尤其致命的是这样一句话：“对各国人民付出英勇努力和忘我劳动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支援和保护，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是与会者全体一致的观点。”

围绕着这后一句话，捷共代表团与勃列日涅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捷方建议给这句话加上一个附加语——“同时要

尊重各国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并建议把这一附加语同前句用破折号连接起来，后面用句号圈住。

但是这一建议马上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反驳，可是他又提不出任何理由，只得胡搅蛮缠道：“在这种句子后面加破折号在俄语语法上是不通的！”随后又说：“反正主权、民族独立、平等、领土完整和兄弟合作，在后面第三段还要明确提到，为什么每句话都要提呢？”

最后在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和日夫科夫的支持下，上述用心叵测的话还是原封不动地写在了声明上。1968年8月后，捷共保守派正是把这句话作为苏联干涉的根据，并把它说成是杜布切克承担义务并同意干涉的证据。

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期间，杜布切克想采取拖延战术，争取力量对比对捷克斯洛伐克更有利一些。所以他又提出，如果联合声明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甚至阿尔巴尼亚代表参加签字，其国际意义将会大得多。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邀请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参加会晤的任务，并提议在此之前，声明暂不签字。但是他的建议如同捅了马蜂窝，立刻遭到勃列日涅夫、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等人的强烈反对，最终被否决了。

8月3日，六国党代表团全都在布拉迪斯拉发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当会谈公报发表时，全世界都从电视上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杜布切克、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等人，在庆祝宴会上交替进行着的兄弟般的微笑、拥抱、握手和接吻的长长的镜头。

这种“和睦”和“融洽”的场面，显然颇为成功地向世界表明了布拉格危机已经过去。于是，随着华沙条约国首脑们的散会和悄悄离去，捷克斯洛伐克报刊和西方报刊都在为这一胜利而欢呼。更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外出度假去了，

其中也包括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希克。外交部长哈耶克也到南斯拉夫度假去了。就连杜布切克8月4日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时也显得十分乐观和轻松。

就在这一片欢庆声中,有一些人并不乐观。因为事情顺利得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大凡政治家们都清楚,比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实际行动,而当时的现实则是,华沙条约40万大军仍布置在捷边境线上。在波兰和东德机场上至少集中了300架苏联军用飞机,它们只需几分钟就能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目标。西方情报机关还侦察到,截止到7月29日,入侵兵力的部署已经最后完成,只是这些部队还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

莫斯科又一次采取了引而不发的姿态。此时此刻,只有苏联人心里最清楚:让杜布切克头上吃一闷棒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 铁托访捷与乌布利希的“黑信”

尽管杜布切克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十分的乐观和轻松,但他心里却十分清楚,布拉迪斯拉发宣言并不代表着他的东欧盟国的回心转意,那不过是短时间的暂缓动手。杜布切克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过他却看错了时间表。他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后告诉朋友说:“我们赢得了6个月的时间。”而苏联人却不想等待那么久,甚至1个月都等不及了。

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过后,杜布切克改革派在国内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了。尽管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们在切尔纳并没有在关键性问题上让步,但他们毕竟被迫向歧路上迈出了三步:缓和捷国内报纸的反苏议论,把保守派代

表留在党的领导机关，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给予全面支持。

知道这一内情的仅限于少数捷共高级领导人，但是许许多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似乎感到，切尔纳会谈并不像杜布切克宣称的那样成功。8月4日晚上，5000多人聚集在布拉格老城广场，坚持要求杜布切克出来，向他们讲明会谈情况或重新作出保证。最后，还是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了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向广场上越聚越多的群众讲了话。

从嗓音和面容来看，斯姆尔科夫斯基疲惫不堪。他向群众介绍了切尔纳会谈的情况，极力想使固执的群众放心，相信在切尔纳一切顺利。他还保证捷共代表团在切尔纳没有“背叛”改革事业。但是人们还是毫不留情地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所谓“阳台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斯姆尔科夫斯基不断地高声回答着群众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已被搞得筋疲力尽了。到最后，他不得不大声叫嚷道：“你们的所有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呢？”

广场上立刻传来了众口一致的呼喊声：“说实话！说实话！”随后一些人又高声叫喊着：“请杜布切克同志给我们讲话！我们要见杜布切克！”

斯姆尔科夫斯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同志们，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三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要挑多重的担子。这些都是别人都无法想象的。我敢保证，即使杜布切克同志来了，他用斯洛伐克语对你们所说的，同我用布拉格人的捷克语告诉你们的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两人有着共同的语言。”

8月初的捷共领导人确实处于进退两难的困难境地。用“如履薄冰”或“走钢丝”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处境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就连他们在切尔纳向莫斯科作出的微小让步，

本国人民也不肯答应。而莫斯科却又在步步紧逼，要求他们立即兑现会谈时作出的“承诺”。杜布切克只能更加谨慎地行事，以便从莫斯科那里争取时间。

但是，莫斯科却并不准备给他们时间了。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自然更清楚捷克斯洛伐克此时的危险处境。其实早在6月份华沙条约国在捷境演习之时，这两位赞赏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外国领导人，就提出了访捷的要求，希望以此表示对捷共中央的支持。但杜布切克则希望将这种支持留到最关键时刻再用。

在杜布切克看来，现在是时候了。1968年8月9—10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来到布拉格，进行了两天的国事访问。作为向莫斯科挑战而得到成功的首倡者和象征性人物，铁托在布拉格受到了人们像对待英雄般的热烈欢迎。当铁托到总统府拜会斯沃博达总统时，几千名捷克人冲开了沉重的铁门，涌进了总统府的院子里。他们把这位南斯拉夫领袖包围在当中，还有人试图拥抱他。

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莫斯科却正在以极其担忧的目光密切注视着铁托的访问。

在与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的秘密会谈中，铁托向杜布切克吐露了自己心中的重大担心。这位南斯拉夫领袖认为，杜布切克在切尔纳给予了苏联过多的东西。这种“妥协”不仅丝毫无济于缓和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反倒给了莫斯科一个随时可以捷克斯洛伐克“背信弃义”而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当铁托从杜布切克口中听到，勃列日涅夫一再打电话催逼执行“切尔纳协议”以及捷国内人民的不满

后，他的这一担心就愈发加剧了。

铁托在密谈中还坦率地指出，他与大部分过于乐观的西方领导人相反，认为切尔纳会谈实际上是捷共中央的重大失策，杜布切克的“顺从”政策恰恰是引来灾难的根源。

铁托对捷克斯洛伐克遇到的困难表示由衷的同情，并劝告杜布切克应立即放弃两头讨好的想法。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杜布切克选择：要么不论国内反应如何，立即履行在切尔纳所作的让步；要么不管莫斯科作出何种反应，立刻加以拒绝。不过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作出后一种选择似乎更为有利，并表示如果是他，他宁愿选择后者。

铁托与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谈的详细情报，立刻就被主席团中一位心怀叵测的人物报告给了莫斯科。不过在他所提供的情报中，既包括会谈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掺杂着为挑拨离间而作出的种种杜撰。

就在铁托结束访问之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发言人又同时宣布，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将于8月15—17日访捷。又是一个同苏联唱对台戏的国家领导人要来捷克斯洛伐克。这在莫斯科眼里可决不是一个好兆头。

夹在铁托与齐奥塞斯库来访之间的，是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乌布利希主动提出来的。据说，他曾提出过访问时要享受“和铁托同等的礼遇”，但遭到了捷方的拒绝。

8月12—13日，杜布切克与乌布利希的双边会谈，在靠近东德边境的小城卡罗维发利举行。不要小看了这次会谈，因为这次会谈的破裂及会谈后乌布利希写给勃列日涅夫的“黑信”，最终导致了莫斯科痛下决心。

自从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中受到莫斯科压制后，乌布利

希对于上次会谈没有涉及捷内政问题和联合声明没有写上“西德帝国主义”一直耿耿于怀。这一次他显然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意，打算在双边会谈中为此再作最后的努力。

在会谈中，乌布利希再次干预捷内政问题，想要杜布切克保证在国内向“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斗争，并同意华沙条约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但遭到杜布切克的严辞拒绝。之后，乌布利希又将话题引向他最为关心的捷对外政策。在不厌其烦地大谈了一阵来自“西德的威胁”之后，他终于向杜布切克问道：

“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能不能向东德作出这样的保证，即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除非事先与东德取得一致，否则就不同波恩进行任何接洽？也就是说，我回去以后能不能告诉所有同事，乌布利希已从布拉格方面得到了这个保证？”

杜布切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行！”

随后，他向乌布利希解释说，布拉迪斯拉发联合声明中关于社会主义阵营一致性等问题的全部措词，已经在捷国内引起了相当困难。他说，尽管同所有各盟国全面“协调”外交政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是重要的，然而答应同特定的一个国家密切配合却是办不到的。

毫无所获的乌布利希怒气冲冲地走了。他已下定决心要彻底粉碎“布拉迪斯拉发精神”了。几天后，他就向勃列日涅夫送交了一封关于遭到杜布切克拒绝的详细报告。这便是所谓的乌布利希的“黑信”。

乌布利希在报告中汇报了杜布切克与铁托会谈的“内幕情节”。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事实、又含有多少水份，谁也说不清楚。总之，报告写道：

铁托叫杜布切克取消在切尔纳所作的保证，并劝他彻底反抗莫斯科。铁托还劝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以南斯拉夫为首的“不结盟国家”集团，并劝杜布切克：你现在因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事业而在国内外声望正隆，可以在不结盟国家集团里起到很大的作用。铁托还向杜布切克建议，为什么不邀请几个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到布拉格来举行特别会谈呢？为什么杜布切克不亲自去访问那些不结盟国家的首都，以便获得国外的援助呢？铁托甚至还公然向杜布切克提出，华沙条约组织已经到了实行转变的时刻，捷克斯洛伐克应该和罗马尼亚一起毅然退出这个组织。

乌布利希还在报告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叛变，转向中立，如果它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结合在一起，那就将会撕碎社会主义阵营的心脏。为此，乌布利希提出，华沙条约国酝酿已久的武装干预必须立即实施，否则局势将不堪设想。

而苏联人自己的情报，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乌布利希的担忧。例如，苏联听说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代表团为了取得长期巨额贷款，将于11月间访问波恩；听说为了要求同样的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长正在作访问华盛顿的初步准备。此外，以色列的特使也已经到了布拉格，并且提出，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同以色列恢复邦交，以色列将立即向捷提供2000万美元的现金贷款。

铁托的访捷和乌布利希的“黑信”，无疑对莫斯科最后下决心入侵捷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而布拉格方面迟迟不肯停止改革的态度，最终使克里姆林宫决定痛下杀手。

一场震惊世界的闪电式军事入侵，已经迫在眉睫！

第六章

突如其来的闪击入侵

● 克里姆林宫入侵决策的前前后后

苏共领导人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改革运动。捷国内局势已经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一块心病。如果说1967年底至1968年初的捷国内变化还没有引起苏共中央的足够重视的话，那么自从1968年4月捷共的《行动纲领》出台后，克里姆林宫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着手考虑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办法了，其中也不排除武装干涉的可能。

克里姆林宫及其东欧盟友，之所以不惜出动军队来扼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是基于多种的考虑。

首先，捷共中央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所谓的“人道社会主义”将严重地冲击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东欧集团国家的政治统治。这种民主思想的传播肯定会对各国领导人的地位构成重大威胁。

其次，杜布切克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的榜样，不仅令苏联担心其他东欧国家会纷纷效仿，而且还有传染给苏联的危险。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让克里姆林宫头疼的大问题。一旦让布拉格从苏联的控制中独立出去，苏联

国内各民族自治甚至独立的势头将更难控制。

第三，与政治危机密切相联系着的经济危机也正在迫近。杜布切克关于增加西方借款和西方贸易的计划，令人担心会搞乱东方集团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机构，成为极其危险的先例。

最后，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西部屏障的重要一环。它西连西德、奥地利，东接苏联。一旦捷克斯洛伐克投入了西方的怀抱，苏联的西部边界就将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直接暴露在西方国家的炮口之下。而对于其他东欧国家来说也同样不利。这意味着它们在未来的东西方战争中，将面临着必须进行两面作战的危险。

地处中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堪称欧洲的战略枢纽。100年前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说过：谁在军事上掌握了波希米亚大高原，谁就控制了欧洲。如今，苏军高级将领们又在勃列日涅夫耳边重复着类似的语言：“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欧洲防务的基石。但现在我们对于‘波希米亚钻石’还能否保持常态，已经没有信心了。”

西方不少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克里姆林宫之所以不惜冒着遭受世界舆论谴责和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的风险发动武装入侵，隐藏在背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于西方进攻的恐惧。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已经使得苏联人谈战色变。为了防止两次世界大战的制造者德国重演历史，克里姆林宫将不惜冒任何风险，也不借付出任何代价。

为了不受侵略而不惜发动侵略，这就是苏联的逻辑！

但是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不到万不得已，也是不会采取军事入侵的。因为此举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最初，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劝说和经济制裁等和平手段，迫使捷共领导人就范。但当这一切尝试不断受挫后，军事干涉才被作为解决布拉格问题的一种选择方案提了出来。此后，军事入侵方案被几经提出执行又被几经搁置，直到8月17日，才被作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最后杀手铜抛了出来。

那么，克里姆林宫最早是从什么时候产生了武装干涉念头的呢？对此，勃列日涅夫在入侵发生后的捷苏两党谈判中作了坦白。1968年8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谈判会议上所作的长篇发言中曾说过：把军事干涉也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这是在1968年5月决定的。

这就是说，苏共中央领导人当时已经决定：当其他一切手段都归于失败时，就必须使用武力来打破杜布切克所发明的新颖的共产主义。从那时开始，这个计划就在不断地具体化，而到7月间则已全部完成。

1968年5月初，当由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比拉克组成的捷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后，克里姆林宫又认为只要对捷共进一步施加些政治和经济压力就足够了。于是，克里姆林宫暂时放弃了入侵方案。这便是勃列日涅夫在8月26日讲话中所提到的“后来感到没有必要”的转变。

1968年5月中下旬，在华沙条约国五国首脑举行莫斯科秘密会谈，以及柯西金、格列奇科访捷之后，由于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的强烈要求和在捷“视察”的结果，克里姆林宫的决策再度发生变化，又作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即武装干涉是必要的，但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进行。在实践中，还要考虑到影响形势发展的其他因素。

1968年7月中旬召开的华沙会议上，由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和日夫科夫等人的强烈要求，武装干涉方案曾再度被

克里姆林宫考虑，但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1968年8月11日，苏军又沿着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东南部和北部边界开始了新的演习。部队已进入阵地并能随时发起进攻。人们相信几天之前，克里姆林宫一定又受到了新的催促，要它即刻开始武装干涉。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甚至表示，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布拉迪斯拉发拖延下来没有立即进攻，是犯了错误。8月12日，乌布利希在与杜布切克举行完卡罗维发利会谈后，又马上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说他认为采取行动的时间已到了。

而在此期间，布拉格的英德拉—比拉克集团也对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他们有能力迅速成立一个新政权，并坚决要求莫斯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契尔沃年科把这个意见转告了莫斯科，并附上了自己的建议。他甚至还向勃列日涅夫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欢迎苏军的到来。但契尔沃年科显然错误地估计了捷国内形势。当苏军入侵遭到捷举国上下的一致反抗时，勃列日涅夫直恨不得给契尔沃年科一记响亮的耳光。

克里姆林宫在入侵问题上的犹疑不决，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苏共领导集团内部意见的分歧。

人们在讨论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各个成员的不同态度时，往往习惯于把他们分成“鹰派”和“鸽派”。实际上这个概念并不十分准确，而且还容易使人发生误解。除了个别极端人物之外，在大多数苏联领导人身上都同时具有某种程度的“鹰派因素”和“鸽派因素”。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到某个人身上，究竟是哪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以及在什么时候哪种因素又占有优势。

毫无疑问，在保卫苏联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并

无原则分歧。他们的细微区别只是在于所采取的方法及步骤，是倾向于更为强硬些呢，还是主张更为稳健些。所以，如果将他们分为“强硬派”和“稳健派”，这样才更为确切。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指出，苏联中央政治局的 11 名委员中，有哪一位无论以任何理由、或在任何时候，曾经坚决地反对过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共领导集团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争论焦点，归根到底也只是“万一不需要动手”和“什么时候动手”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在一切打击早已准备就绪，但在下手之前，到底应给杜布切克多少“改邪归正”的机会？

对于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持的态度，西方记者曾作出了种种猜测。猜测终究不等于事实，我们姑且录之所闻。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始终是稳健派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一直主张在入侵前给予杜布切克多一些时间，准备再从旁观察一下布拉格事态的发展。而他最担心的是武装入侵会给即将举行的苏美两国关于核武器和裁军的谈判带来影响。

集合在柯西金背后的人物有沃罗诺夫，一个专家治国论者，可能对杜布切克的改革尝试较有兴趣；苏斯洛夫负责意识形态问题，担心武装入侵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利影响，并直接影响到 1969 年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开；谢列平，人们认为他对杜布切克的许多有关经济效率的论点感受颇深。

而强硬派则是以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为首。谢列斯特极端害怕捷克“病毒”从共同边界那一边渗透到他的故乡基辅来。他曾警告过他的同事们：假如不迅速收拾捷克的“自由主义”，就不能保证乌克兰的安定。此外，强硬派还有苏联第一副总理、白俄罗斯第一书记马祖罗夫。

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则处于中间状态。其中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倾向于强硬派，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波德戈尔内，则一直充当着两派之间的调节者。

但是，西德的米夏埃尔·莫罗佐夫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反对入侵的政治局委员是柯西金、马祖罗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和苏斯洛夫；投赞成票的政治局委员则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佩尔谢、谢列平和谢列斯特，并且勃列日涅夫是直到最后一刻，才加入了干涉派行列的。其根据是胡萨克上台后只给 11 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的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佩尔谢、谢列平和谢列斯特 6 人授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贡献”。

此外，苏联军界的态度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尽管他们的势力还没有大到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能够干政的程度，但是政治局委员们却很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代表苏联军队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据说，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早在 4 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两人就已经表明了强硬的态度。他们在发言中声明：“大家给了我们保卫祖国的特定任务。除非叫捷克跟着我们一道搞，否则我们就无法保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苏联军界也不尽一致。据说，一些苏军高级将领认为使杜布切克就范很有必要，但同时对于武装入侵又感到某种程度的担忧。有人甚至提出：“于苏联军队来说，这是一个不适当的任务。”还有人警告说，把那样一个倔强的“兄弟人民”作为敌人来打，这种经历也许会使千千万万的苏联军

人在思想上受到玷污。这种顾虑不幸被言中。后来侵捷的苏军士兵确实表现出空前的士气低落。但是，元帅们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终于支持了8月20日的强袭。

另外，华约伙伴国的态度，也是克里姆林宫决策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克里姆林宫吸取了1956年苏军坦克单独开进布达佩斯、独自背上了入侵恶名的教训，这次决心要拉上其他华沙条约国伙伴垫背。这样，就不能不考虑它们的态度。

在1968年7月14日召开的华沙条约国华沙会议上，东德、波兰和保加利亚三个盟国都希望在7月里就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严厉打击，尤其是看着莫斯科眼色行事的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更是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不排除给予军事援助”。

但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却属于“稳健派”。在这次华沙会议上，惟一对军事干预提出异议的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显然与他联想到1956年苏军对他们国家的武装干涉有关。据说，卡达尔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提醒勃列日涅夫勿忘前车之鉴。他在这次华沙会议上甚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过警告，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粗暴的措施，其结果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损害苏联，其效果也是弊大于利。卡达尔最后还声明，他将对此保留意见。

另据捷共改革派成员之一、当时的中央书记姆林纳日回忆说，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期间，卡达尔曾与杜布切克和他就当前捷局势谈了半小时。卡达尔用影射的语言提醒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形势是，如果自己不采取暴力来对付某些倾向的话，就有出现外来暴力的危险。卡达尔还谈到1956年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后他自己的感受，并一再提醒杜布切克，那种处境要比他尚能掌握局势时所遇到的情况，还要困难得无法比拟。

卡达尔一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看成是匈牙利发展的希望，并从内心同情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但他同时又不希望杜布切克步他当年的后尘，因此他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与东欧各国中充当着调停的角色。

1968年8月17日，当武装入侵逼近的最后关头，根据卡达尔的建议，杜布切克同卡达尔在边境城市科玛尔诺举行了一次会晤。卡达尔不敢向杜布切克透露莫斯科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但他已明确地作出了这种暗示。苏联出兵后，杜布切克本人也承认，对卡达尔的某些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并说当他俩在车站月台上告别时，卡达尔失望地问道：“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吗？”

勃列日涅夫自然清楚匈牙利领导人的态度，但只要不公开反对并拒绝出兵，他也就不把卡达尔的意见当作一回事。实际上武装入侵计划之所以一再推迟，只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感到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就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他们也还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据说，就在华沙会议之后，苏共政治局还曾以微弱的多数，否决了在切尔纳会谈之前就着手干涉的这一主张。

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的发展，苏共中央内部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切尔纳会谈后，捷共中央不仅没有停止改革步伐，而且也没撤掉切尔纳会谈中克里姆林宫点过名的改革派领导人。最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必须痛下决心的是，布拉格宣布将于8月26日召开党中央主席团会议，而这次会议的内容则是筹备9月9日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就给克里姆林宫规定了最后的时间期限。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捷共十四大的选举中，比拉克、科尔德、英

德拉等忠于莫斯科的保守派将被赶下台。代表大会还将给执政 9 个月的杜布切克政权盖上合法性和不可改变性的印记。到那个时候，克里姆林宫不说回天无术，至少干涉捷改革运动也将更加困难。

据说，就在这个时候，克格勃向政治局报告了重要情报，说杜布切克打算从捷军队、国内行政部门、外交部门以及党的领导机关中继续肃清诺沃提尼分子。苏联秘密警察头子们肯定对克格勃顾问被赶出捷安全机构，以及捷将克格勃过去的活动予以公开大为恼怒。他们提供的情报还指出，杜布切克已经拟出了一份 1200 名以上将被赶下台的旧保守派干部的名单，其中包括大约 250 名高级军官，并计划于 10 月 1 日前清洗完毕。

一直在观望形势并且踌躇不决的勃列日涅夫再也坐不住了：如果要予以打击，就必须抢在捷共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之前动手。克里姆林宫必须作出最后的决断。

8 月 15 日，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结束后到外地休假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突然中断了休假，悄悄地回到了莫斯科。而在此之前（8 月 4 日），什捷缅科大将接替了不愿意进行武装干涉的卡扎科夫大将，出任华沙条约国军队参谋长。

8 月 17—18 日，孕育着重大危机的 48 小时以 11 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会议开始了。据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柯西金再一次站在稳健派的立场上，主张将入侵继续推迟。理由是苏联已于当天向美国约翰逊总统发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信，并且相信，从这个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中，苏联将会获取到不少好处，而武装入侵行动无疑将使这些东西化为泡影。

但是，政治局会议还是作出了入侵的决定。使政治局最

终以微弱多数作出入侵决定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铁托和齐奥塞斯库访捷后出现的建立大巴尔干同盟的危险。这一同盟一旦出现，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就将被捷、罗两国断为三截，苏联的整个东欧防御体系也将随之土崩瓦解。因此有人认为，8月中上旬南、罗两国领导人访捷，才是克里姆林宫于8月17日痛下决心的最后原因。

另据分析，苏联军方也再次施加了压力，指出位于边境地区的60万大军的后勤已无法保障。提出要么全部撤回原驻地，彻底放弃武装入侵计划；要么立即发动入侵。此时此刻，入侵对于苏联来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一点可以从勃列日涅夫入侵后的谈话中得到证明。1968年8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曾对一位主张改革的捷共领导人说过：“如果我在政治局不投票赞成军事干涉的话，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大概甚至我也不会坐在这里！”

1968年8月17—1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最终作出了入侵的决定。据说入侵决定是以6：5的微弱多数通过的，一直犹豫不决的勃列日涅夫投出了关键的一票。

“强硬派”害怕入侵决议再被推翻，于是马上就行动了。他们的急躁做法使得入侵后的苏联陷入了更大的被动。

● 军事突袭的成功与政治上的失算

1968年8月15日，斯沃博达总统在捷总统府为来访的齐奥塞斯库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这是布拉格最后的一个气氛松快的夜晚。

几千名赴宴的客人在总统府的几个宽敞的大厅里转来转去，谈笑风生。斯沃博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同齐奥塞斯库等人坐在大厅的一角，边吃喝边交谈着。而在另一个角落里，契尔沃年科大使正单独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契尔沃年科心里一定在想，莫斯科尽管还没有作出武装入侵的最后决策，但是苏联驻东德部队已于昨天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弓已拉满，箭已上弦，杜布切克等人的改革已经没有几天蹦头了。

8月17日，齐奥塞斯库离捷回国之后，事态就如脱缰之马一般飞速发展。

当天夜里，当杜布切克正在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时候，一架苏联民航的专机在布拉格的鲁津机场着陆，送来了一批克格勃的高级专家。他们在与苏驻捷大使馆接触之后，立即与他们信任的捷内务部负责国家保卫工作的官员会晤，为军事占领以后应采取的措施作准备。此时任捷内务部副部长的沙尔戈维奇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保守派，但是出于对莫斯科压力的妥协，捷共中央主席团竟然仍让他留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8月18日，星期天，勃列日涅夫花了很长时间给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打电话，通知他们苏联领导已决定下达侵捷命令。由于这是一次华沙条约国共同行动，所以此事必须通知他们。

8月19日，当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侵捷决定后，勃列日涅夫于当天晚上给杜布切克发去了一封信。信中最严厉的语气强烈斥责杜布切克背叛了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精神，但并没有对即将入侵作出任何暗示。杜布切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一个重要信号，认为这

封信不过是莫斯科再一次表示不悦而已。当晚，他没有把信传给自己的同志，而是准备在第二天上午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再宣布这封来信。

8月20日，原定于当天上午的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又改在下午2时才召开，比原定计划推迟了4小时。

会议开始后，讨论9月召开的捷共十四大的准备工作，几乎占去了整整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的时间。之后，以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主席团会议的科尔德和英德拉，坚决要求主席团听取书记处书记扬·卡什帕尔的有关分析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以来政治形势的长篇报告。

科尔德和英德拉等正准备按照莫斯科周密安排的时间表行事。按照计划，在卡什帕尔报告之后，比拉克和英德拉就要提出一个决议案强迫主席团通过，而那时正是苏联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英德拉，还有主席团候补委员卡佩克前几天就曾向克里姆林宫保证，主席团将通过一项谴责“反革命”的决议，同时撤销杜布切克的领导职务。下一步就是由新当选的捷共领导和内定担任代总理的英德拉发表声明，邀请华沙条约的军队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

8月20日下午4时，即捷共中央主席团开会之后两小时，内务部副部长沙尔戈维奇在内务部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他信得过的各司、处长以上干部，以及三天前到达布拉格的以维诺库罗夫为首的几名苏联克格勃特务。会议开始后，沙尔戈维奇通知他的亲信们，苏军入侵于当天夜间即将开始，随后又向他们布置了当夜执行的任务。

负责布拉格地区国家保卫工作的莫尔纳日中校接到命

令：召集部下准备逮捕捷共改革派领导人，并由一个名叫穆欣的克格勃特务监督这次行动。第二司负责人里普尔中校负责在入侵后制止非法的无线电台广播，并特别要注意杜布切克的中央主席团可能搞出一个反对外国干涉的声明。为此，第二司第七和第十三处要与前文化部长、现任中央交通总局局长霍夫曼配合行动。第二处还负责派人在当天夜里看住驻布拉格的西方国家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大使馆，以防止捷公民进入这些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下午6时左右，捷通社社长苏列克来到办公室静候着入侵行动的开始。在他随身携带的皮包中装着若干份请求华沙条约国派兵入侵的“宣言”，以及侵捷五国部长会议早已拟定好了的声明。

1968年8月20日傍晚，布拉格市民们为躲避夏日室内的炎热，三三两两地在大街上散步遛弯儿。一些关心政治的市民已从电台广播中得知，当天下午莫斯科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更没有想到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决定的正是他们今后的命运。

此时此刻，庞大的侵略机器已经开动，罪恶的入侵计划即将执行。

1968年8月20日夜10点半，一架苏联民航班机从利沃夫飞抵布拉格鲁津机场的跑道上。它实际上是一台活动指挥塔，专等空运开始后负责指挥空降任务的实施。

夜里11点刚过，有一架苏联民用客机飞近布拉格的鲁津机场。根据捷航空主管机关事先得到的通知，这架客机的飞行计划只不过是途经捷克首都上空而已。苏联客机经过布拉格几分钟后，开始向鲁津机场发出无线电信号：由于客机发生机械故障，要求准许紧急迫降。鲁津机场对于老大哥的困

难有求必应。更何况它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机场，按照国际惯例也应给予帮助。

这架苏联客机安全降落在鲁津机场后，便径直开到机场新房子的玻璃门前。但从客机上走下来的不是手里提着行李箱的乘客，而是数十名身着便装荷枪实弹的苏军突击队员。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冲锋枪，迅速强行占领了机场指挥系统。几分钟后，第一架苏联第24战术空军集团军的AN—12巨型运输机，就在他们的引导下降落了。鲁津机场还来不及发出一声警报，就落入了“兄弟般的”敌人的手里。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再需要偷偷摸摸地进行了。从11点半以后，满载轻型坦克、装甲车和反坦克炮的AN—12运输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速度降落了下来。这些空降部队稍事集中后，便由事先安排好的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人员带领，向布拉格市内政府各要害部门开进。他们所要占领的目标包括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桥梁、斯沃博达总统在布拉格城堡的官邸、捷共中央大厦、政府主要各部的办公大楼、邮电局、布拉格广播电台以及特定的捷军事设施，等等。

与此同时，即8月20日深夜11点，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军队从北面、东北面、东面和南面分成18路，同时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向首都布拉格及其他战略要点迅速推进。

整个人侵都是按照华沙条约国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执行的。在6、7月份的演习中，苏联部队和通讯兵专家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经摸清了一切情况。

在入侵行动中，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大将指挥伞兵部队，马克亚辛上将指挥后勤部队。而担任这次入侵

行动总指挥的则是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全苏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早在一周前，巴甫洛夫斯基就已将一切安排就绪，其中大到为同西方作战的战术核武器，小到入侵部队所需的军用流动厨房。

在入侵开始后的 48 小时内，巴甫洛夫斯基投入了华沙条约部队 24 个师，近 20 万人（空军支援和空运部队不算在内）。投入这第一期行动的部队中有 16 个苏联师、3 个波兰师、2 个东德师、2 个匈牙利师、1 个保加利亚师。

为了封锁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的边界，主要的进军是由北而南。部队在几个星期前就已集结在东德。这一最重要的战区交给了苏联最精锐的 4 个装甲师。它们从卡罗维发利穿过捷克国土，经比尔森向捷克—布迭约维策挺进。跟着，苏联边防军的第 1 机械化装甲警备军司令员，在距离西德边界 40 英里的比尔森设立了该军司令部。

另外，苏联 4 个机械化装甲师和 1 个伞兵师，则由北波希米亚向南进军，包围了布拉格。被任命为占领军总司令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全苏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则携其司令部随同这支部队同时到达了布拉格。

上述两支苏联的主要进犯部队，都各自携带着东德军队 1 个师。第一支部队配备了德累斯顿的第 11 机械化师，第二支部队配备了也是驻扎在德累斯顿的第 7 机械化师。德国军队进入外国明显地违背了战后四国关于德国问题的协定，克里姆林宫因为担心西方会作出强硬的外交反应，不久又急急忙忙地把乌布利希的军队全部撤走了。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中部这类次一等的任务，则交给了由波兰军队和苏联军队混合编成的 4 个师。但是，苏联人对这一地区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反苏情绪甚

至比捷克地区更为强烈。

另一支由苏军喀尔巴阡军区 4 个师组成的突击集团，在比沙林上将的指挥下，由乌克兰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北部和东部前进；同时，苏军 4 个师的一部分部队和匈牙利军队的 2 个师，在库尔科特金中将指挥下，从匈牙利向北进军。在维也纳东面约 30 英里的匈牙利—奥地利边境附近，几天前开始集结的强大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浩浩荡荡地在公路上迅速前进。它们的进攻目标是占领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一名目击者报告说，入侵军的坦克以 35 英里的最高时速，冲进了还在沉睡中的布拉迪斯拉发，撞倒了街上的路灯柱子，碾碎了停在路边的汽车。

强大的华沙条约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在所有华沙条约国家中，拥有 20 万精锐军队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仅次于苏联的军事大国。但是，通过对入侵发起前的种种迹象的分析，莫斯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不会进行抵抗。有人分析，如果勃列日涅夫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将进行抵抗的话，那么克里姆林宫就有可能放弃军事干涉的方案。因为，为了毁灭“布拉格之春”而血洗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代价未免太高了。克里姆林宫很可能会去寻求别的解决办法。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天真的杜布切克根本就没有料到苏军会发动入侵，因此也就谈不上做任何抵抗入侵的准备。在捷共上层领导人中间，惟一考虑到入侵可能、并且主张一旦苏联入侵政府应选择防御的，只有 2 月份新上任的捷共中央安全部长普尔赫利克中将。但是，杜布切克由于受到反对派的压力，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前不久就已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使得捷克斯洛伐克成了一个对北约各国不设防的国家。

但尽管如此，苏军最高统帅部还是作好了作战的准备。在

第一期入侵部队之外，还有 30 万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一方面是为了应付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出现的抵抗，一方面是准备用来对付西方国家的反应。苏军元帅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此刻正深陷于越南战场的美军即使介入，50 万大军也足以打赢这场同北约国家的常规战争。

令人吃惊的是，苏联这次规模巨大的入侵行动，居然成功地瞒过了北大西洋公约各成员国。几个月来，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的部署，一直处于美国间谍卫星、U—2 飞机和北约雷达的严密监视之下。北约各国的情报部门还通过秘密电子设备，窃听着苏联军队的电传打字电报、微波通讯和军用电台并加以破译。应该说，北约对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周围的部署是完全了解的。但他们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情报，作出应得的结论。克里姆林宫成功地利用了西方心理上的弱点——他们不相信苏联真会发动一场入侵。

8 月 20 日深夜行动时，苏联人又开始了对北约雷达的有效干扰。而在近两个月华沙条约国频繁的军事演习中，这种干扰对于北约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它们并未把它当作一回事。结果，不论是美国还是西欧各国，直到入侵发生后，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还是两眼一摸黑。

为了稳住美国政府，克里姆林宫在入侵发动前夕采取了一项外交行动。在华盛顿，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要求在下午 6 点（中欧和华盛顿有 5 小时的时差），约会约翰逊总统。他的使命是通知美国政府，华沙条约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干涉，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局部事件，它不应该被认为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威胁。

克里姆林宫的另一项外交活动则是在布拉格。晚上 11 点

钟刚过，契尔沃年科大使驱车前往总统府。他奉命通知斯沃博达总统：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华沙条约五国部队已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斯沃博达总统当时的心情及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他在结束了近半个小时的谈话后，立即驱车赶往捷共中央大厦，希望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捷共中央主席团。但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杜布切克等人早就从电话中得到了入侵的消息，捷共中央主席团已然乱成了一锅粥。

中央主席团大约是夜里 11 点半得到了入侵消息。当时，切尔尼克被从主席团会议上叫到隔壁房间接电话。大约过了 10 分钟，他十分悲痛地回来了，面色惨白地告诉主席：“我刚刚接到国防部长楚尔打来的电话，华沙条约五国部队已从各个方向越过了我国的边界。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

切尔尼克的话立刻震惊了会场。大部分人都显得惊慌失措，被吓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有英德拉、科尔德、比拉克等人没有露出丝毫惊诧，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着内奸的角色。

杜布切克此时的神情则如同被人打了一个耳光。他拿出了勃列日涅夫前一天写给他的信，并在会上宣读了。信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入侵的暗示。他两眼含着泪水说道：“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我做梦也没有料想到，竟然会有人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反对我们。我一辈子致力于同苏联的合作，而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这真是我一生中的最大悲剧！”

但是，杜布切克很快恢复了常态，并用意外的沉着使会场镇静下来。斯沃博达来到会场以后，杜布切克下令立即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以便通过广播电台和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将它发表出去。

这时，英德拉悄悄从房间走出去，杜布切克立刻把他叫了回来。但最后他还是趁讨论文告时的混乱溜出了会场，驱车前往苏联大使馆告密去了。科尔德、比拉克等人则留下来胡搅蛮缠，长时间阻挠这份文告的通过。

为了粉碎他们的阴谋，斯姆尔科夫斯基提出进行表决。最后，文告以 7：4 的票数被通过，并被马上送到了宣传部门。捷共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全文如下：

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书：

昨天，1968 年 8 月 20 日晚 11 时许，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党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主席团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保卫我国的国界了。

根据同样理由，没有命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和工人民兵保卫国土。主席团认为，这一行动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党和民族阵线的领导干部都应坚守岗位，他们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和规章作为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组织的成员当选担任这些职务的。宪法授权的有关机关已召集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会议，党中央主席团也正在召集党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应付业已形成的局势。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

写着中央主席团声明的那张纸，急急忙忙地被送进了广播室。8月21日凌晨1时20分左右，布拉格广播电台开始用中波频道播送这个文告。但是文告只广播了一半，讯号就突然中断了。此时由鲁津机场开过来的苏军坦克还没有到达广播电台大楼，因此广播肯定是被广播部门里的苏联代理人给掐断的。

大约过了15分钟，斯姆尔科夫斯基被叫去接电话。电话是广播电台布拉格郊区的中心转播站工作人员打来的，说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主席团的公报，但是卡尔·霍夫曼说这个公报不是真的，是伪造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斯姆尔科夫斯基立即向他们说明了真实情况：“主席团关于军队入侵的公报是真的。霍夫曼拒绝服从主席团，拒绝把宣传工具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使用，已经表明了他究竟站在哪一边。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公报播送出去，通过所有的工具广泛播送，并且能播多长时间就播多长时间。”

很快，不仅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知道了苏军入侵的真实情况，而且这一消息也传遍了全世界。美国记者舒尔茨说，文告的上半部分他是从收音机中收听到的，余下的部分是从旅馆车库里的有线广播中听到的。由于捷共领导人巧妙地与人民沟通了情况，克里姆林宫迅速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初步受挫。

随后，苏联人又碰到了第二个难题，捷通社的电传电报员拒绝发送社长苏列克留下的、声称捷请求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的电稿。几名电报员在电传机上安上测试带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布拉格电台的广播员们也拒绝播发那篇骗人的声

明。这就使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功的苏联人陷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处境：一方面他们在军事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个国家，但同时又无法为这次军事行动提供任何“合法”的依据。

捷共中央和政府抢先一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确实把克里姆林宫精心策划的欺骗计划打得粉碎。他们本来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人在8月21日早晨醒来的时候听到消息说：“兄弟国家”的军队应新政权的请求进入了捷境。但结果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听到的却是：国家遭到了侵略。克里姆林宫期待的新政权一直也没有出现，这就使得苏联人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极为尴尬的境地。

到了天将破晓的时候，苏军坦克已经封锁了伏尔塔瓦河上的全部桥梁，将布拉格分割为二。一些部队包围了河左岸的总统府和外交部，在河的右岸，苏联部队和坦克陆续包围了党中央大厦、国民议会、位于高尔基广场的布拉格电视台、报刊和杂志编辑部、捷通社、作家协会和记者协会总部。显然，苏联军队首批占领的目标是布拉格的政治中心和思想中心。

尽管苏军已经控制了布拉格全城，但却有一个例外，那是布拉格电台。早晨4时30分，布拉格电台从它设在离瓦茨拉夫大街不远的维诺赫拉德大街的主要广播室，恢复了播音。它不顾布拉格以及捷全国已被占领的客观现实，仍然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工具镇定地工作着。电台反复广播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人民书，并且还源源不断地播送一些最新情况的报道。

于是，出现了一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况：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处于侵略军的占领之下，但却同时从广播和电视中听到了对侵略行径的严正声讨。而奇怪的是，苏联人没有能使这些自由的声音沉寂下来。捷克人和斯

洛伐克人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就证明了，甚至苏联的坦克也吓不倒他们。这一奇特的现象也足以证明，苏联侵捷在政治上的失败是何等惨重！

● 从“座上宾”到“阶下囚”

文告送走后，切尔尼克就离开了党中央大厦，乘车到河对岸的总理办公室去。他要在那里召开一次政府会议，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正在行使职权。不料在凌晨3点钟前，当他正在召集部长们来开会的时候，苏联军队冲了进来。一排伞兵上着明晃晃的刺刀逮捕了他。其他的官员被迫脸朝墙壁排成一行。切尔尼克被押上了一辆装甲车，不知被送到哪里去了。

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以及中央主席团中支持他们的人，则继续留在党中央大厦里，等待着事态的变化。这又是一件出乎克里姆林宫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以为杜布切克等人会急急忙忙地跑到外国大使馆去要求政治避难，这样就为他们组建一个傀儡政权扫清了道路。

凌晨2点钟，杜布切克强有力的支持者、布拉格市委书记西蒙冲进了党中央大厦。他建议立即召开原定在9月9日举行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组织一次总罢工，并且起草一份致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呼吁书。杜布切克开始有些犹豫，主要是怕在当时的情况下，大会代表有可能被苏军一网打尽。但在西蒙再三保证他将秘密组织这次会议后，杜布切克同意了他的这些建议。后来这些建议的实施很快扭转了局面，使莫斯科陷入了更大的被动之中。

此时，布拉格已经骚动起来，中央委员会大楼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新闻记者和党的干部。一些人急切地对杜布切克等人喊道：“怎么啦，你们是想等在这里让他们抓走吗？走吧，我们领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们给你们安排住处。”

但是，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坚决地拒绝了。他们说：“我们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等着。”

凌晨4点半左右，三辆苏联装甲车跟在一辆挂着苏联大使馆牌照的黑色伏尔加轿车的后面，开到了党中央大厦跟前。杜布切克等人站在窗前冷眼观看着外面的动静：又有一辆重型坦克沿着伏尔塔瓦河右岸开来，停在大楼主要入口处的前面，并将炮口对准了中央委员会大楼。几分钟之内，又开来了许多装甲车和几卡车伞兵，包围了大楼。端着冲锋枪的伞兵跳了出来，站在离建筑物20米处，不许任何人出入，并且封锁了大楼四周的路口。一批苏联官员和便衣人员在捷内务部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大楼。

突然，杜布切克办公室的门被冲开了，约有8名士兵和低级军官手持自动步枪冲了进来，从后面围着会议桌把杜布切克等人包围起来，枪口对着他们的后背。随后，又进来两名军官，职位高一些的是个矮个子上校。他胸前佩带着一堆奖章，可能还有一枚“苏联英雄”称号的金星勋章。他自信又十分粗鲁地宣布说：

“你们将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谁都不准离开，他们要进行清查。”接着便向他的部下开始发布种种命令。

这时，杜布切克不知说了句什么，苏军上校立刻大声喊道：“不准讲话！安静地坐着！不准讲捷克话！”

这最后一句话深深刺伤了在场的所有的捷共领导人。捷共中央书记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他提高嗓音用俄语命令式高喊道：“你们要懂点规矩！不准乱来！这里是党的第一书记的办公室！难道上面让你们禁止我们说话吗？不会有这种命令！你们不能违反命令！”

上校听后满脸不高兴，转身走了出去。但从那以后，就不再禁止捷共领导人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上校又带着一些人回来了，并开始登记所有在场人员的名字，其中也包括等在那里的首长秘书、司机和警卫人员。他们一直没有把杜布切克等人带走，大概是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还要等待上级的指示，或者是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早晨5点钟左右，斯姆尔科夫斯基走到窗前，观察着外面的动静。这时，中央委员会大楼前方出现了一大群青年。他们手里拿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排着队，想到大楼前面来。但走到拐角处被挡住了。他们与包围大楼的士兵发生了争执。突然，自动枪手们一齐朝天上射击。但一名自动枪手却向站在最右边的青年学生开了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倒在了血泊之中。

一名苏联中尉立刻把斯姆尔科夫斯基从窗前赶走，并且关紧了窗户。斯姆尔科夫斯基愤怒地冲向电话，要通了契尔沃年科的办公室。苏联大使显然正等在电话旁边，因为电话里很快就传出了他的声音。

斯姆尔科夫斯基立刻以捷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向他抗议道：“出事了，您，大使同志，您要对流血事件负主要责任！”

但是还没等契尔沃年科回答，一名苏联士兵就冲了过来，用枪托把电话机砸碎了。过了几分钟，杜布切克又拿起另一部电话，想打到政府大楼找切尔尼克。但站在旁边的苏联士兵跳了过来，扯断了电话线。此后，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所有的电缆，包括直通莫斯科的电缆也都被彻底切断了。

8月21日清晨，英德拉等人在契尔沃年科和苏联占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的陪同下，登上了布拉格城堡，面晤斯沃博达总统。英德拉递给斯沃博达一份切尔尼克签了字的辞职书后，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接受辞呈，并委托他们来组织新内阁。

斯沃博达立刻对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既然敢于公然践踏国际法准则，那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伪造一份文件又算得了什么呢？斯沃博达对英德拉说道：“总理的辞呈只能由他亲手递交，否则我是不会接受的。”

随后，总统又转向契尔沃年科和巴甫洛夫斯基，郑重声明道：“今后有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事情，我将亲自同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谈判。恕我冒昧，大使先生和将军阁下是没有资格来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命运的。”说完起身送客。

苏联军队和象征性的保加利亚部队虽然控制了布拉格全城，但由于布拉格电台工作人员拒绝与他们合作，因此一直无法与被占领的当地人民对话。苏联只好另寻它途。大约在21日凌晨4时左右，即在布拉格电台恢复播音之前，外国记者从收音机的短波频道中，偶然收到了一个自称是“伏尔塔瓦电台”的很弱的广播。外国记者根据广播员的捷克语中的德国腔调，估计这很可能是华沙条约国司令部设在东德的电台。

这个所谓的“伏尔塔瓦电台”广播了入侵五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声明称华沙条约国家部队是“应捷克斯洛伐克忠于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请求”，来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因为“这些成果正日益严重地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的威胁”。声明还声称，“他们不是来干预你们的内部事务，而是

来帮助你们打倒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消除对你们祖国的主权、独立和安全的威胁”，而“这一行动是根据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承担的集体义务进行的，是根据要支援、巩固和保卫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和要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义务进行的”。声明最后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和独立的危险消除以后，这些军队就撤离你们的领土。”

一个多小时之后，即8月21日5时25分，“伏尔塔瓦电台”又以苏联塔斯社声明的形式重复了类似的骗人鬼话。塔斯社声明全文如下：

塔斯社受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因为同外国仇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相勾结的反革命势力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

这一决定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中规定的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这一决定也完全符合我们这些国家为保卫欧洲和平，反对那些曾经不止一次把欧洲人民拖入战争的军国主义、侵略和复仇主义势力而进行的斗争的切身利益。

苏联部队和其他盟国的部队已于8月21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一旦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安全的威胁被消除，该国合法当局认为这些部队留驻该国已无必要，这些部队即将迅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目前正采取的行动不是针对任何别的国家的，而是服务于和平目的，是出于对于维护和平的关心。

我们各兄弟国家依靠相互之间牢不可破的团结来反对任何外来威胁。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一根毫毛。

但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都不会相信苏联人的连篇鬼话，也根本不相信他们所作出的关于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很快撤军的保证。

不过，精明的外国记者还是从塔斯社声明中听出了与华约五国联合声明中的两个不同点。首先，相比较而言，塔斯社的声明似乎更加“诚实”一些，因为它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而五国声明则没有承认这一点。这就等于承认，这次入侵行动并不像他们经常挂在口边的那样是所谓的“无私援助”，相反，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主权，是为了苏联的切身利益。

其次，塔斯社声明中，业已包含了几个星期以后被人们称之为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实质内容。因为它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实行人侵的决定，符合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

当克里姆林宫对军事入侵行动作出了其所能作出的最完善的解释之后，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在苏军控制下的布拉格，究竟该怎么办？

最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恼火的是，尽管他们从入侵一开始就打出了“应捷克斯洛伐克忠于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请求”的旗号，但是在占领布拉格以后，却没有找出任何一个捷共党员肯于承认向苏联发出过这种邀请。出乎克里姆

林宫意料的是，甚至就连最亲苏的《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斯特卡、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尔德和皮列尔等人，也不肯出面充当这种角色（一个月后，这几个人为洗清自己还特意发表公开声明，说他们没有干这种“背叛”祖国的事情）。

当克里姆林宫正为下一步行动绞尽脑汁的时候，此时正被看押在党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室里的克里格尔，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和轻松。他看了一下手表，时针告诉他现在是1968年8月21日凌晨5点一刻。他用等着看苏联人笑话的调侃口吻说道：“他们起码要忙到8点钟，8点以前不会有什么事。大家都疲倦了，我劝你们睡一觉。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头脑清醒。”

说完，他自己就站了起来，走到杜布切克平日主持会议的椅子后面，找了块空地躺在地毯上，枕着公文包就睡去了。克里格尔刚躺下10分钟，就打起鼾来。第一声呼噜把看守他们的8名苏联伞兵都吓了一跳。他们本能地把枪口同时指向了克里格尔。

兹·姆林纳日等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们都不相信克里格尔在这种情况下会真的睡着。他们怀疑他是在故意装睡打鼾，有意和苏联人搞点恶作剧。但是克里格尔却是真的睡着了，并且在苏联伞兵的枪口下继续心满意足发出着不断变换着声调的呼噜。当苏联伞兵也看出克里格尔不是装睡后，便把枪口又对准了其他捷共领导人。

克里格尔的估计是准确的，大约有3个小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杜布切克等人都在静坐沉思。相邻的人偶尔说上几句话，也有人在看书。当有人想上盥洗室时，总会有一名伞兵跟出去，守在盥洗室的门口。人出来后，他们甚至把手伸进抽水马桶里去进行检查。

1968年8月21日早晨，也就是克里格尔正在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办公室里心满意足地打呼噜的时候，躲避在苏联大使馆里的英德拉、比拉克、皮列尔、科尔德等7人，也正在同契尔沃年科大使和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按照莫斯科的计划，当把杜布切克等人看押起来后，就应该由英德拉于今天在布拉格召开党中央委员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但现在曾为此计划打过包票的契尔沃年科也已经看出，这个计划中的会议是开不成了，而且也开不得了。因为在眼下民族感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就连英德拉、比拉克这样的人都不敢出头来代表苏联接管政权，其他中央委员的态度就更可想而知了。如果硬要召集这个会议，即使是开成了，谁也不敢肯定会议将作出什么样的决议。其结果，很可能会使克里姆林宫更加难堪。

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筹莫展的大使馆会议终于作出了逮捕杜布切克等人的决定，这也是苏联人此刻惟一能做的事情了。

上午9点，参与策划入侵阴谋的捷内务部军官莫尔纳日中校，把他的10名亲信部下和3名克格勃特务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宣布了逮捕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以及内务部长帕维尔等人的任务。

随后，一名克格勃特务向那10个人问道：“你们谁是好样的？谁敢去对杜布切克说‘我以英德拉同志为首的革命政府名义宣布：你们被捕了’？”

沉默了一阵之后，一个名叫霍夫曼的人表示愿意干这差事。他随后带着6个人赶往党中央大厦。

9点钟过后，克里格尔睡醒了，精神焕发地又回到了自己

的座位上。这时，小个子苏联上校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两名苏联军官和霍夫曼等人。霍夫曼让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和什帕切克跟他们走。当杜布切克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以英德拉同志为首的革命法庭要对你们进行审判……”

斯姆尔科夫斯基当即火了，打断他的话质问道：“什么革命法庭！什么以英德拉同志为首！这算个什么机构？我作为国民议会议长，为什么对此毫无所知？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法中也没有成立这种法庭的有关规定……”

在他身旁的杜布切克拉了一下他的袖子，劝道：“算了吧，约瑟夫，这没有意思。不要说了。别理他！”

接着，霍夫曼又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斯姆尔科夫斯基哈哈大笑起来，自己装着翻衣服，甚至把口袋整个翻了出来。他把一把水果刀放在桌上，义正辞严地说道：“我们对自己的人民是不需要武器的！”

杜布切克也故意作出战场上被解除武装的滑稽样子，面带微笑地举起双手，说道：“来，搜吧，搜吧！”

霍夫曼当即被他们嘲弄得手足无措。苏联上校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话，但也看得出捷奸导演的这场戏并不成功。于是挥手打断了它，并示意杜布切克等人快走。

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克里格尔被带到了楼下的天井里，在那里已经停着两辆苏军装甲车。苏联士兵从后面把杜布切克和克里格尔推进了第一辆装甲车，把斯姆尔科夫斯基和什帕切克推进了第二辆装甲车，随后用力地关上了车门。

装甲车开到了鲁津机场，杜布切克等人被押上了一架AN—12运输机。斯姆尔科夫斯基称它为“运牲口的飞机”，因

为它们运来的都是禽兽不如的侵略军和苏联坦克。切尔尼克总理则在天刚亮时就被押送到这里来了，但是苏联人没有让他们在机场见面。

半小时后，杜布切克等人又被弄进了另一架军用飞机。当斯姆尔科夫斯基问那个小个子苏联上校想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时，他回答道：“同志们，在飞机上你们将会知道一切。”实际上，这时就连莫斯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处置这几个被捕的人。

下午2点钟左右，飞机起飞了。但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已经被押上了另一架飞机。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和什帕切克乘坐的飞机，先是降落在斯洛伐克的特里·杜比军用机场，然后被用汽车押送到离斯利亚奇矿泉疗养地不远的一个谷仓里，在苏军看守下过夜。8月22日，他们又被转移到外喀尔巴阡的穆卡切沃城，从那又被送到苏联的利沃夫，并被关押在山里的一处营房里。

在那里，斯姆尔科夫斯基终于见到了切尔尼克和西蒙。在关押期间，他们受到虐待和侮辱，不许他们换衣服，饭食也十分糟糕。究竟如何处理他们，此时就连克里姆林宫也还没有考虑好。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目前是被作为人质扣压起来了。苏联人可能也考虑过要进行一次公开审判。审判后或许还可能要枪毙其中的几个人。

1968年5月，当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人组成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曾受到苏联领导人贵宾般的接待。然而3个月后的今天，当他们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时，却是被苏联士兵们押送来的。转眼之间，昔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

第七章

捷克斯洛伐克的抗争

● 不屈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1968年8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正当苏联的AN—12巨型运输机吐出的一批批空降部队、轻型坦克和装甲车队,轰隆隆地列队驶往布拉格市区时,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涌上了黑夜笼罩的首都街头。有的人是被飞机的轰鸣声从睡梦中惊醒的,有的人是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他们互相打电话或者敲打对方的房门,告诉了这个可怕的消息。装满了青年人的汽车在街上飞驰而过,喇叭齐鸣,号召人们到老城广场和瓦茨拉夫广场去,向入侵军举行示威。

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像契尔沃年科预料得那样一触即溃,相反,他们正在被迅速动员起来,进行一场全民性的政治反抗。

21日清晨,布拉格电台仍在继续播音。早晨6时,电台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的呼吁,他号召人民照常去上班。6时35分,电台播音员以平静的声调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对占领军实行消极抵抗。7点差几分的时候,布拉格电视台通过郊区的楚克雷克发射塔恢复了播出。8时20分,电视台播出了捷科学院抗议被占领的声明。

早晨7时左右,苏军指挥部决定用武力夺取布拉格电台。

坦克开始从瓦茨拉夫广场向维诺赫拉德大街的电台大楼移动，另一支部队也从东郊向电台开来。但当时瓦茨拉夫广场挤满了几千群众，另外大批群众正在老城广场集合。7时15分，电台号召老城广场的群众散开，并且拆除他们用电车和公共汽车筑起的街垒。女播音员以平静的语调说道：“自我克制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几分钟后，女播音员又说：“我们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你们不要受人挑动！……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据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的布拉格大楼已经开始射击，那里有6辆坦克……部队使用了实弹，我们播音员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瓦茨拉夫广场的群众正在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

7时18分，布拉格电台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请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保持尊严。我号召你们保持平静。”广播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

7时25分，一队苏联坦克在布拉格电台大楼前摆开了进攻的阵势。但是，怒气冲冲的年轻人在它们前面筑起了街垒。广播员反复说：“几百名群众正在以自己的身体阻止坦克前进。”人们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现场的枪声和苏联飞机低空飞行的轰鸣声。

电台开始播放缓慢而悲壮的《摩尔多瓦组曲》。7时35分，女播音员庄严地宣布道：“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不久，收音机里终于传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人们眼含着热泪想到，一切都完了。

但是,10 分钟后,电台又开始广播了。播音员虽然换成男的,但却是人们熟悉的声音。他说,受到苏军包围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要求电台广播它的一项声明。声明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非法的”。而在此前,并不太同情改革的代理外交部长瓦·普列克,已向侵捷的各国政府提出了一份抗议照会。

上午 8 时 15 分,布拉格广播电台进行了最后一次播音,内容是斯沃博达总统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

在最近几小时里,我国出现了复杂的局势。此时此刻我无法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我以往在担任这项职务时所承担的全部责任向你们讲话,迫切地要求你们保持理智和完全的镇静。

希望你们记住自己作为我国公民的责任,为了祖国的利益,不要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希望你们像近几天来表现的那样庄严和遵守纪律,等候我国的合法当局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就在这时,布拉格电台沉默了。苏联伞兵冲进了播音室,打断了播音。苏联坦克在维诺赫拉德大街上疯狂射击,炮弹和机枪子弹击中了街上的建筑物和停着的汽车。与此同时,几辆坦克还用机枪扫射了瓦茨拉夫广场最高处的庄严雄伟的民族博物馆。一个捷克青年学生看着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民族博物馆,气愤地说道:“博物馆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象征。甚至连德国人在大战期间都没有干过这种事!”

布拉格电台虽然被占领了。但是,代表人民心声的广播却并没有停止。先是摩拉维亚的俄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

随后，比尔森、布拉迪斯拉发等几十个电台也相继投入了战斗。

这个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台长赫兹拉尔和国家电视台台长贝利康领导的地下广播网，在技术上运转正常，调度灵活。在布拉格电台中止广播后仅几个小时，即8月21日中午，“合法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就开始播音了。

苏军指挥部极力想破获这个地下广播网，他们派出了克格勃特务，并且投入了无线电追踪队，但却屡屡扑空，连一个秘密电台也没有查到。因为地下电台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掩护。就连捷内务部有时都打去电话，提醒他们说，俄国入正在接近你们，请赶紧转移。转移时，电台工作人员或者使用出租汽车，或者化装成医生和护士乘坐救护车。有时候播音员还要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听众：“我们要转移了，播音将中断片刻。”苏联入气得要死，但也毫无办法。

苏军的入侵激怒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8月21日，首都布拉格就沸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大中城市也都沸腾了。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利贝雷茨、科希策等几十个城市的大街上，市民们向苏联坦克和伞兵吐唾沫、扔脏东西，辱骂入侵军。苏联士兵原来从他们指挥官那里听到的，是去执行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反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光荣任务。而此刻所看到的，却是捷克斯洛伐克市民如此强烈的反应。苏联士兵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感到无法理解。

尽管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告全国人民书》中号召人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外国军队，但是一些冲动的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人，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向苏联坦克和装甲车发动了进攻。他们悄悄爬近苏联战车，把浸满了汽油的破布塞进坦克的排气管里，然后点燃。在苏军入侵的第一天里，就有几十辆装甲车以及T—55型坦克和崭新的T—66型坦克，在大城市的

广场上和大街上熊熊起火，发生爆炸。苏联入侵军对攻击者也进行了无情的镇压。仅在凌晨的几个小时之内，就有几十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被击毙，几百人负伤。

但是，更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还是采取了传统的抗争方式。就在苏军占领布拉格的第一天，即8月21日中午时分，布拉格所有工厂举行了一次两分钟的抗议罢工。12时整，各个工厂的汽笛突然齐鸣。整个占领军官兵都被这突如其来、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惊呆了。这响亮的汽笛声是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发自内心的怒吼。布拉格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连车辆都当场停驶。在这两分钟里，这座金色的城市陷入了可怕的沉寂。随即，当广播电台恢复播音时，人们听到了工厂、合作社、部队、文艺团体等发来的无数的抗议电报，似乎捷克斯洛伐克的每一个团体、组织都提出了抗议。

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了，布拉格以及所有大中城市的街头变成了反苏标语和漫画的海洋。在建筑物的墙上，到处刷满了反对侵略者的口号和标语。过去在捷克斯洛伐克盛行的政治口号“美国佬，滚回去”被换成了“伊万，滚回去”。有的标语是：“美国在越南，我们这里有苏联！”等等。有些人把苏联的捷克文缩写 SSSR 的前两个 S 写成闪电形状，使人一看到就联想到希特勒的党卫军。也有人画了个镰刀斧头，后面画了个大等号，然后画上一个纳粹的卐字。

在布拉格，一条标语援引列宁的语录谴责苏军的侵略。一幅用红布制成的大标语写道：“列宁你快醒一醒，勃列日涅夫疯了！”在民族博物馆的累累弹痕旁，有人用潦草的字迹写道：“这就是俄国的文明！”“俄国人留下的纪念！”

尽管苏联占领军采取许多措施禁止出版报刊，但地下报纸仍然使用原来的名称如《红色权利报》、《自由言论报》继续

出版着。报纸发送工作则由自愿前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警察和学生担任。报刊和宣传品不断地从各个印刷厂大量运送出来，不少人甚至公开地站在街头阅读着它们。苏联的武装入侵唤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全国人民正在团结一致地对外国入侵者进行一场非武装的、消极的反抗。

人们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旗、国徽图案装饰着街道和商店橱窗。在布拉格，有成千上万的人自豪地佩戴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的三色佩带和第一批出现的杜布切克纪念章。杜布切克、斯沃博达的名字和肖像被醒目地写在或挂在大楼和各处围墙上。对杜布切克、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表示信任的口号，构成布拉格等城市沿街装饰的主要内容。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心中，这些领导人已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

在被苏军子弹打死的人们牺牲的地点，摆上了简单的纪念牌位，牌位的旁边放着鲜花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标明街道名称的牌子或是被推倒，或是被换上了别的名称，如“杜布切克大街”，或是把许多街名的牌子加以调换。十字路口的公路标志被打碎了，有的指示箭头被调换了方向，有的则被涂写上具有讽刺意味的语句，如“去莫斯科——2000公里”。

在布拉格，在布拉迪斯拉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大中城市的街头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同坦克上的苏联士兵进行辩论的场面。他们企图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安定的事实、用国际法准则去说服苏联士兵。因为人们断定，这些“伊万”们是受自己政府欺骗的蠢人，他们是因为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才跑到这里来的。这不仅是当时大多数普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想法，而且就连高级领导人也认为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误会。捷克斯洛伐克人实在是太天真、太善良了。他们不知道苏共领导人早已抛弃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知道勃列日涅夫已经创造出了“有限主权论”，并将这一理论在捷克斯洛伐克变为了行动。

● 政治家们的顽强抗争

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大街上的反应已使得苏联人目瞪口呆的话，那么布拉格政治家们的态度，就更叫克里姆林宫吃惊了。

8月21日，当克里姆林宫打着应捷党和政府领导人邀请的旗号，占领了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后，却一直无法宣布据他们说是请求干预的领导人的名字，也无法组成一个亲莫斯科的捷共领导班子或政府。

克里姆林宫原定计划是想让斯沃博达总统出面，以维持表面上的法统延续性。但是，这位被拘留在总统府里的老将军却死也不干，坚决拒绝参与组织任何新领导班子的事。

在这一天里，斯沃博达总统向全体国民连续发表了两次讲话。如果说上午8时15分发表的讲话还主要在于要求国民“保持理智和完全的镇静”的话，那么第二次讲话就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政治内容。不过这个讲话直到第二天晚上才通过自由电台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见面：

亲爱的同胞们：

在这命运攸关的一天中，我第二次向你们讲话。我们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时刻。苏联军队、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一起，进入了我国的领

土。这一行动没有得到按照我国宪法建立的政府的同意，尽管如此，我国政府出于对祖国人民应付的责任，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应付业已出现的局面，以便使外国军队早日撤离我国。

在目前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我在这一天中为此目的努力进行了工作。白天我召开了国民议会的全体会议；晚上我同政府的一些部长们讨论了有关恢复国内正常局势的一些紧迫问题。明天我将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希望也能同切尔尼克总理商谈。我完全知道当前局势所引起的所有问题和困难。亲爱的同胞们，我再一次向你们呼吁，迫切要求你们保持最大限度的审慎，避免发生带来无法挽回后果的令人遗憾的任何行动。我特别恳切地向我们的青年呼吁。

我号召你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行动再一次表现出你们对社会主义、自由和民主的热爱。

我们决不能后退。党的行动纲领表达了我国全体人民至关重要的利益和需要。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完成我们业已开始的任務。我们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为了我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要跟共产党和民族阵线在一起，坚持这和团结。

8月21日上午，在布拉格的几十名议员大义凛然地走进了被苏军包围的国民议会大厦。议员们从10时零7分开始，举行了一次议会紧急会议，并且宣布将连续举行6天的会议。当天的会议通过了一份致华沙条约五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撤退入侵部队。随后，以80岁老人费林格为首的议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大使馆，递交了这份抗议书。

翌日上午9时，国民议会全体会议复会，到会的议员已有162人，其中大多数人在前一天晚上就睡在议会大厦里。捷国民议会议员总人数为300人，这样，当天出席会议的人数就达到了超过半数以上的法定人数。尽管苏联坦克和伞兵守在议会大厦门口，国民议会还是沉着地起草并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依法选举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由共和国总统按照法律程序召集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对华沙条约五国政府和议会提出坚决抗议，并且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合法机构都没有授权讨论外国军队进入我国的问题……没有批准进行这种讨论，也没有邀请华沙条约五国占领军前来我国。

国民议会坚决要求华沙条约五国速派一名或数名有资格、负责任的领导人前来，以便对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权力机关就业已发生的非法行动作出权威性的解释。

8月21日上午，捷政府的11名部长在消费部长马哈乔娃的主持下在总统府开会。会议严正声明，尽管切尔尼克总理失踪，但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仍然存在。12时55分，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广播了这次会议的声明：

一、我们坚决拥护合法选举产生的一切宪法和政权机构，我们坚决支持捷共中央主席团今天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

二、我们认为，在未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获得它同意的情况下而实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

国的占领，是非法的行动，它违反了国际法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

第二天，在马哈乔娃部长的主持下，政府再次举行了会议。下午7时，秘密电台广播了会议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长篇声明。声明宣称，虽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它仍将“行使宪法规定的职权，保证全国的正常生活”。声明再次要求华沙条约国军队撤退，并提醒全国人民决不要容许“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下选举产生的政府之外，再建立任何别的政府”。

如果说国民议会和政府的会议都是在苏军警戒下公开举行的，那么捷共中央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则是在占领军鼻子底下秘密举行的。因为杜布切克担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在开会时被苏联人一网打尽。

8月22日上午，捷共中央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布拉格的维索昌尼区的契卡德工厂礼堂秘密召开。这是一个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作用的会议。因为它的召开，表明捷共能够作为一个政党在多数群众心目中继续保持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是通过秘密电台公开召集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直言不讳地通知：全体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8月22日（星期四）上午11点之前，到布拉格的契卡德工厂集合。苏联人听了之后，把它看作是一个烟幕。他们认为大会大概是在另外的时间，并且肯定是在另外的地点举行，而决不可能在电台宣布的时间和地点举行。所以他们既没有包围契卡德工厂，也没有对穿着工装的进出

人员加以特别注意。

8月21日夜至22日凌晨,全国各地数百名党代表纷纷来到首都参加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他们乔装打扮,使用假证件通过了苏军的关卡,躲过克格勃的追踪,来到了布拉格。

22日早晨6点,随着上班的人流,身着工装的代表们进入了工厂。工厂大门口的厂警像往常一样检查着每一个人的证件,但实际上这些厂警也是大会秘密工作者扮成的。只有少数知名的领导人为了避免被认出来,而是装扮成病人、医生和护士被用救护车送进来的。为了保卫代表大会的安全,还动员了契卡德工厂的工人民兵。民兵们带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和步枪,还有他们惟一的——门反坦克炮,守卫着工厂的大门。如果苏军发觉后,民兵就准备保卫大会。

到22日上午11时18分大会主席符·卡尔宣布大会开幕时,夏天选举出的十四大的1543名代表中,已有900多名代表到会,而到晚上9点15分休会时,到达的代表人数已达1192人。

第十四非常代表大会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当前的形势表明了态度。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在8月21日夜间对侵略所进行的一般性的笼统谴责,被大会具体化为若干政治要求,即:撤走占领军;所有依据宪法就任的官员全部返回原职;遵守国际法准则,包括华沙条约的规定。大会没有提出退出华沙条约和宣布中立的要求,这显然是接受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

大会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同盟关系、华沙条约、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协议遭到践踏,党和国家的几位领导人被非法逮捕,同人民隔绝,不能行使他们的职权。一批中央机关被占领。这些都是严重的不正义行为。”《告人民书》郑重表示:“8月21日在我国形成的局势是不

可能持久的。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接受一个军事占领当局，也不能容忍一个靠军事占领扶植起来的伪政权。”

大会选出了一个 144 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由 28 人组成的扩大中央主席团。新当选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中有 18 人为上一届捷共或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或者是在政府中任要职，但有 15 人（过半数）不在布拉格，因而无法参加大会。而且最有威信的主席团成员当时都不在场，其中杜布切克等 6 人被劫持，希克在南斯拉夫，胡萨克在莫斯科，齐萨士在 8 月 26 日以前躲在布拉格郊区。因此大会选举一个不大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工厂经理希尔汉，在杜布切克恢复工作以前代理党中央第一书记。

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和什帕切克都再次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的选举表明，捷共已完全转向了改革路线。当选的委员中没有一个是知名的保守派。可是大会却在胡萨克缺席的情况下，把他选进了中央主席团。这就在无意之中，为后来克里姆林宫用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铺平了道路。

大会重申了全党对杜布切克的信任，并且给杜布切克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杜布切克同志：

今天在这里开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向你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问候。我们对你为我们党和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国的青年人手执鲜血染红的国旗在布拉格游行时，反复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这充分证明你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我国主权的象征。我们对非法囚禁你及其他几位同志表示抗议。

代表大会再次将你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继续把你当作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坚信，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一定会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也 将和我们重新欢聚一堂。

大会还通过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痛斥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提出了要求立即释放被苏联人囚禁的捷共领导人和立即举行关于撤退入侵外国军队的谈判的要求，并且声称，如果这两项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采取“措施”。告人民书全文如下：

同志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們：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建立在全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和支持的基础之上的拥有主权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它的主权却受到了侵犯，1968年8月21日，它被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军队占领了。

这一行动的根据被说成是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威胁，而且干涉是应一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请求进行的。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昨天发表的告人民书、共和国总统第二次广播讲话、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和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团的声明，都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有资格的党或法定的当局曾要求过这种干涉。

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反革命事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威胁。正如全国人民对以杜布切克同志为首的党的新领导的巨大信任所表明，我国人民和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这些行动将逐步实现

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思想。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背弃自己的条约承诺和义务，它丝毫也不想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为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却遭到占领国军队的破坏。

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同盟关系、华沙条约、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协议遭到践踏。党和国家的几位领导人被非法逮捕，同人民隔绝，不能行使他们的职权。一大批中央机关被占领。这些都是严重的不正义行为。

代表大会坚决要求立即创造条件使一切立法和行政机构能正常工作，立即释放被扣押的领导人，使他们能履行其职务。

8月21日在我国形成的局势是不可能持久的。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接受一个军事占领当局，也不能容忍一个靠占领势力扶植起来的伪政权。

毋庸置疑，我们的基本要求是外国军队撤离我国。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如果在24小时以内不与我国自由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开始谈判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如果不让杜布切克同志及时就此问题向全国人民讲话，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劳动人民在8月23日（星期五）中午12时举行一小时抗议罢工。代表大会还决定，如果它的要求不能满足，它将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 契尔沃年科的连续惨败

眼下，尽快地组建起一个服从于苏联占领军的捷共“合法机构”，已成为契尔沃年科的首要使命。

8月21日下午3点，当杜布切克等人被苏联军用飞机押往波兰西部，而拥护杜布切克的党代表们正匆匆赶往布拉格参加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比拉克和英德拉等人却在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党中央招待所“布拉格饭店”，召开了一次傀儡会议。会议的任务就是为苏联人的政治困境提供一条出路。

但这次在苏联坦克保护之下的会议却开得极为糟糕。整个会场始终乱轰轰的，人员也锣齐鼓不齐，直到晚上，参加会议的捷共中央委员才达到50人，仅占全体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

尽管英德拉、比拉克所网罗的与会人员都是些保守派分子，但这并不能保证每个人就真的忠于他们。例如，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瓦楚利克，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保守派。但当他第二天出席捷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却向大会报告了布拉格饭店开会的情况。

的确，在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形势下，任何人也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时候。瓦楚利克说：“虽然有占领军的军官在场，到会的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曾有任何个人或任何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要求过华沙会议信件的签字国派武装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就连英德拉、比拉克和科尔德也不愿意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苏联人的政治计划再次落空。布拉格饭店会议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发表了一个公报，而公报的主要内容则是表示支持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即要求人民保持安静、审慎和维护秩序。苏联侵捷的目的是要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但是这次会议却始终小心地提到：不允许恢复“一月中央全会以前的情况”，而且把行动纲领作为捷共今后工作的基础。

布拉格饭店会议惟一能使苏联人感到满意的，就是公报遵从了他们的旨意，建议与外国军队的指挥官建立联系。此外，会

议还给各州的党组织发了电报，号召它们“与占领军合作”。

直到 22 日凌晨 1 时 30 分布拉格饭店会议散会时，苏联的政治计划也未能前进半寸。会议既没有组成捷共新的领导班子，也没有告诉心怀疑虑的全国人民，所谓“请求入侵”的领导人究竟是谁。契尔沃年科不得不连夜通过电话，同莫斯科进行紧急磋商。最后决定于当天在苏联大使馆再举行一次小规模会议，建立起一个“党的集体领导班子”。

8 月 22 日上午，契尔沃年科邀请正在捷共党中央大厦的 11 名领导人，到苏联大使馆举行党中央会议。理由是党中央大厦的国际电话线已被切断，而在大使馆则便于在必要时同莫斯科通话。契尔沃年科还建议他们乘坐苏联的装甲车前往。但除了英德拉和比拉克两人外，大家都拒绝使用这一交通工具。于是比拉克和英德拉在院子里坐上了苏联的装甲车，而姆林纳日、萨多夫斯基等 9 人挤进 4 辆小轿车开赴苏联大使馆。

姆林纳日等人很快就来到了苏联大使馆，而乘坐装甲车的英德拉和比拉克却迟迟未到。此时的苏联大使馆已变成了一座兵营，到处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和克格勃便衣。

一名克格勃便衣向姆林纳日转达了他在莫斯科的老同学、克格勃一名中校的问候，并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可以帮忙。姆林纳日突然想起需要打个电话，同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保持联系，为此需要使用大使馆的保密电话。这位便衣马上把他带到了保密机的屋子里。于是，姆林纳日巧妙地利用苏联大使馆的保密电话，将契尔沃年科的阴谋捅了出去。

当他们在契尔沃年科的房间里等候时，姆林纳日打开了收音机，开始收听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突然广播电台报告说，主席团的亲苏派人士正在苏联大使馆商讨成立捷奸政府，并说在场的人有的想参加政府，

有的拒绝参加。

房间里的人都被惊呆了。科尔德几次大声喊叫着：“他妈的，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在场的人也感到奇怪，维索昌尼那边消息怎么会这么灵通？只有姆林纳日在一旁心里暗笑：这个功劳还得记在大使馆保密电话的头上。

就在这些人在苏联大使馆等候期间，上午11时30分，契尔沃年科大使和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来到了总统府。契尔沃年科首先向斯沃博达总统提出了成立一个以英德拉为总理和英德拉—拉比克—科尔德三人组成的党中央领导的建议，并要求斯沃博达同意。

之后，巴甫洛夫斯基又警告说，反革命活动正在蔓延扩大，“盟军”对此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只是由于“盟军指挥部”的忍耐、善意的谅解，才使占领部队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但是，时间正在消失。抵抗必须停止。如果到下午6时，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还不接受上述建议的话，苏军指挥部将别无选择，只好组成“占领军政府”，迫令斯沃博达辞职，实行军事管制。

但是，斯沃博达却断定苏联人是在进行恫吓。他太了解苏联人了，既然他们以接受邀请的名义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成立军政府只能戳穿自己的谎言。莫斯科需要的不是军政府，而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因此，斯沃博达决心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只要杜布切克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仍被囚禁，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

斯沃博达还告诉他们，目前局势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只同苏联大使和将军谈判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归根到底没有决定权。他说，眼下迫切需要安排他同华沙条约最高领导人会晤，只有这种最高级会谈才有可能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斯沃博达最后警告莫斯科的代表说：如果苏联再不释

放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那他就将无法控制住他的人民了！

3 个小时的谈判毫无结果。两名苏联使者表示，他们将向莫斯科转达斯沃博达总统的意见。

直到契尔沃年科准备离开总统府时，英德拉和比拉克才赶到苏联大使馆。原来苏联装甲车在横跨伏尔塔瓦河大桥时，一辆电车和苏联卡车相撞而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很快，周围就挤满了想看苏联人笑话的布拉格市民。因此尽管车长再三建议英德拉和比拉克换乘其他车辆前往大使馆，但他们却不敢在众目睽睽下从占领军的装甲车里爬出来。就这样，两个人在 8 月的烈日骄阳下，在闷热的装甲车里蹲了有一个小时。

人到齐后，开始开会。但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急于了解杜布切克等人的情况，并且认为在进行任何谈判之前，必须首先同被捕的党的领导人取得联系。为此，姆林纳日、萨多夫斯基等人，向契尔沃年科提出了同勃列日涅夫通话的要求。

契尔沃年科出去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说电话要不通。姆林纳日又建议他通过苏军的通讯系统转过去，但契尔沃年科断言那里也接不通。随后，苏联大使就转入了正题，他说：“你们看，坐等联系实在是毫无必要地浪费时间。电话迟早会联系上的，那时再商量杜布切克、切尔尼克以及其他主席团委员的事也不迟。我看，大家是不是应该利用现在的时间，具体讨论一下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非常机构来度过这一非常时期的问题。这个机构应该是把党和国家的职能结合起来，就是说，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在座的诸位可以构成新政府的基础，因为大家既有合法的身份，又享有苏联同志的信任。”

契尔沃年科提出建议后便离开了房间。会议刚开始时，场面显得有些僵，因为谁也不愿意提什么具体建议。后来有人建议，组建一个由比拉克和英德拉为首的新班子，比拉克主

持党务，英德拉主持政府工作。比拉克欣然同意，但英德拉却有些犹豫。萨多夫斯基抓住英德拉的态度插话说，英德拉的犹豫是有道理的，他不应该接受这个职务。姆林纳日则趁机提出让列纳尔特主持政府工作，理由是他在诺沃提尼时期当过总理。但列纳特尔却表示拒绝，说按照主席团的决议，任何人不得离开现有的职务，所以他不能出任总理。

就这样，会议虽在进行，但却始终没有讨论出任何结果。契尔沃年科再次出现在房间里，当他得知连总理人选还没有着落时显得很不高兴。他说，他刚和斯沃博达总统会晤过，并已告知总统，党的领导正在开会，很快就会把今后行动的建议告知他。因此，现在这个会议必须尽快作出决议。契尔沃年科当即建议：在选出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前，由比拉克、英德拉和科尔德三人组成三驾马车来领导。

苏联大使的这番话正好提醒了姆林纳日和萨多夫斯基。姆林纳日说道：“按照共和国宪法，在政府总理不能行使职权时，总统可以主持政府工作。因此我建议，在场的各位全都到总统府去，同总统一起继续会谈。至于我个人，我拒绝接受工农革命政府的任何职务。因为这样做，既变更了现存宪法机构，而且也违反了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和违背了总统在前天夜间参加主席团会议时表明的立场。总之，就目前看来，如果不讨论军事干涉和撤军问题，僵局是打不开的。”

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都同意到总统府去进行谈判。

抵达总统府时，已是夜里11点钟了。契尔沃年科自己先走进斯沃博达的办公室，想建议他出来主持政府工作。但办公室的门再打开时，里面走出来的契尔沃年科已是怒容满面了。

接着，身着威严军装的斯沃博达走了出来。他显得也很激动，但却极力地克制着，行动保持着军人的姿态，背比平

时挺得还要直。当皮列尔向他汇报党的会议的讨论结果时，老将军根本拒绝讨论政府问题，他说：

切尔尼克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总理，有关政府的事，我只能同切尔尼克商讨。这样的建议我决不接受，永远不会接受。如果我照这个建议办，我们的民族就会把我像癞皮狗一样赶出总统府！

现在惟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到莫斯科去，同勃列日涅夫会谈，向他们要回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我刚才已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契尔沃年科大使，并且表示这是我惟一可以接受的办法。现在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明天早晨就将起飞。三名政府成员——副总理胡萨克、国防部长楚尔和司法部长库切拉将跟我一起去。党中央主席团也应选出三名代表一起去。

我认识勃列日涅夫，同苏联元帅们也很熟。因此，我相信这一悲剧性的误会是可以说得清楚的。莫斯科的谈判会使事态平息下来的……到苏军撤退的时候，你们等着瞧吧，我国人民将像 1945 年那样用鲜花为他们送行的。

斯沃博达的这番话，对于比拉克、英德拉等人来说，不啻于兜头浇下了一瓢冷水，甚至称得上是一顿鞭笞。比拉克立刻蔫了下来，他原想趁机攫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计划彻底破灭了。此刻剩下的只有恐惧，一种在关键时刻突遭惨败的恐惧。但在当时，人们还是选派了他和英德拉、皮列尔作为党中央代表，陪同斯沃博达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谈。

1968 年 8 月 23 日中午 11 点钟，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已

经聚集起了大约两万人。这一天中午 12 时整，全国工人将响应捷共代表大会号召举行一小时的抗议罢工。广场上也将同时举行静坐示威。布拉格市民不等捷共代表大会的结果出来就油印了传单，告诉捷克人不要同侵略者有任何往来。广场上每一个人都手拿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或者佩戴着三色佩带，整个广场变成了波涛翻滚的红、兰、白三色的海洋。

突然，一个手拿扩音器的男子告诉大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们正在布拉格某处开会。群众听后立刻欢呼雀跃起来，随后又高唱起捷克斯洛伐克国歌。停在周围的坦克顶上的苏联士兵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宣泄声浪搞得坐立不安。有些坦克手钻进了坦克，接着，炮塔也开始转动起来。

中午 12 时整，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遍了布拉格。它标志着抗议罢工开始了。工厂的汽笛、车站和停车场上火车头的汽笛、楼顶上的报警器、小轿车和公共汽车的喇叭几乎在这一刻同时响了起来，汇成了一股高昂激越的强大声浪。这声浪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坚强意志，也尽情地发泄了几日来郁闷在心中的仇恨。

突然间，巨大的轰鸣声戛然而止。瓦茨拉夫广场数万群众席地而坐，在整整一小时的时间里一动不动。城市的所有交通全部中断，所有的行走中的人们都静立在原处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寂静吞没了布拉格。苏联士兵在这无边无际的巨大人群的海洋中显得是那样渺小和孤单。如果说沉默能够致人于死地的话，那么，苏联士兵就从这天中午瓦茨拉夫广场上的沉默中，体会到了这种可怕的力量。

斯沃博达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强有力的支持下，率领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的。

第 八 章

“有限主权论”与城下之盟

● 斯沃博达：“我去把杜布切克要回来！”

1968年8月23日（星期五）当地时间下午1时，斯沃博达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代表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

苏联人显然想把欢迎场面搞得隆重热烈一些。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全部出马，前往机场迎接。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在机场互致问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标志最高礼遇的21响礼炮，三军仪仗队，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机场和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上挂满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

当两国领导人按照惯例，共乘一辆吉尔牌敞篷轿车通过列宁大街驰向克里姆林宫时，斯沃博达、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有气无力地向一群群匆匆集合起来的群众挥手示意、强作欢笑。勃列日涅夫能如此沉着地演完这出戏，足以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无奈。而斯沃博达能够在克里姆林宫外维持住体面，则表明了他的气度。

对于报纸上刊登出的斯沃博达同欢迎他的苏联领导人热烈拥抱的照片，西方记者们议论纷纷，因为他们在机场谁也没有看到过这种场面，他们怀疑这些照片多半是用特技手法

拼凑出来的。联想到几十万苏军此时此刻正在捷领土上飞扬跋扈，苏联人作出的宣传姿态就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斯沃博达等人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的谈判桌旁落坐后，即同苏联领导人就杜布切克等人的命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沃博达向勃列日涅夫等人声明说：

“在会谈开始之前，我首先代表我方全体成员表明这样一个立场：在被劫持的捷领导人获得自由之前，我们拒绝谈判任何问题。”

勃列日涅夫马上予以反击，他坚持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出现了“反革命”，而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则应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他坚决表示，这四个人必须受到惩罚，最后甚至主动表示，愿意把这四个人交给斯沃博达带回国内去进行公审。

斯沃博达听后勃然大怒。这位患有高血压的老总统满脸通红地嚷道：

“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格里格尔，都是依法选举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党员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别的姑且不谈，单是在昨天布拉格秘密举行的捷共代表大会上，他们再次当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这件事，就足以表明直到目前为止仍得到捷克斯洛伐克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的拥护和爱戴。而且他们还是我的同事，我决不能容忍别人随意指责他们。”

斯沃博达恰恰主动提起了捷共十四大这个令克里姆林宫最为恼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当即指责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是“非法的”，并要求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

斯沃博达则回答说，只要他的同事还被关在监牢里，就

不可能讨论任何问题。随后他又反复向苏方说明了这四位领导人在捷人民心中的地位，说除非将这四人释放并让他们参加谈判，否则在莫斯科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对捷全国人民具有约束力。

整个 23 日的下午和晚上都用在了关于释放杜布切克等人的争论上。据说争论得最僵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甚至威胁斯沃博达，说：“如果我愿意，苏联军队可以随时将布拉格城摧毁。我提请总统阁下记住这一点：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那么必要时它会走得更远。”

斯沃博达也毫不退让，老将军把苏联授予他的英雄勋章和其他勋章全部摘下并扔在会议桌上，随后又拔出手枪说道：“这是斯大林同志‘为了我们反对希特勒的共同战斗’送给我的礼物，如果你们不立即释放我的同志，我就用这支枪死在谈判桌前。你可以向全世界说我是自杀的，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你。”

由于斯沃博达的拼死坚持，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考虑作出让步。最后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代表团退席出去自行商量，斯沃博达则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座配楼中休息。

在斯沃博达一行到达莫斯科后，代表团同布拉格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捷外交部想同总统通电话，国防部想同楚尔将军联系，结果都没有成功。斯沃博达对当天布拉格发生的一切都毫无所知。

但克里姆林宫对此却很清楚，这天中午，布拉格又举行了一次总罢工，而且比前一天的总罢工更为厉害。在整个一小时内，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一切均陷于瘫痪。千百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响应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号召闭门不出，大街小巷空无一人，使苏联军队完全陷于孤立。

与此同时，人民响应自由电台的号召，把全国，尤其是布拉格，变成了地理上的无人区。苏军入侵以后，人民就立即把各处路标都弄掉或者倒转过来，使占领军的行动陷入混乱。苏联、波兰、东德的部队多次走错了地方。一支波兰坦克部队奉命开往捷克某地，但在乡下转了几个小时，最后又兜回到波兰领土上去了。

在布拉格，市民们发动了一场“街道无名化”运动。他们搬走了街牌，去掉了门牌，使得苏联占领军根本找不到要去的地方。那天下午，苏联侦察兵和坦克兵拼命搜寻布拉格地图，甚至拦截外国游客的汽车索要布拉格旅游地图。一名苏联坦克兵大尉无可奈何地说：“我接到命令，让把部队带到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街上去，可是谁也不告诉我，这条街在哪里。”

城市和乡镇的政府以及居民们，还响应自由电台“不给占领军一片面包”的号召，拒绝向疲惫不堪、又渴又饿的外国军队出售任何食物和饮料，甚至连水都不给一口。当苏军的一个部队好不容易在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搞到一点水，并埋怨捷克人民对他们不友好时，镇长对部队指挥官说：“你们可以搞到水，但却得不到友谊。”居民们甚至把狗和猫都锁在家里不让它们出去，以免被饥不择食的占领军抓去吃掉。过了不久，许多苏联兵只好生啃田里的马铃薯，或是生吞蘑菇充饥。

就在斯沃博达在克里姆林宫进行极其艰苦谈判的时候，布拉格又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留在布拉格的惟一的副总理斯特劳加尔召开了捷政府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捷公安部中苏联主要代理人沙尔戈维奇的内务部副部长职务。会议不仅下令对他在8月20日配合苏军入侵的行为进行调查，而且还宣布凡是参与过入侵准备工作的公安部官员，统统都要撤职。斯特劳加尔宣称：“我命令国家公安机构的正副

指挥员们，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和党的行动纲领正常地履行职责，以便根据一月中央全会以后的发展方向恢复内务部各部门的良好声誉。”随后，在入侵那天夜间被捕的忠实于帕维尔的官员都恢复了自由。

星期六这一天，布拉格的气氛也显得格外紧张。一名妇女在克拉罗夫区政府大厦对面的一个电车站下车的时候，被坦克开火打死了。布拉格市整天都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上午10时左右举行的15分钟的罢工，发展成为一次小规模的反苏示威。苏军驻布拉格司令维利奇科将军发布了一项新的戒严令，内称：“一批苏联官兵被杀害，坦克起火……为了制止挑衅活动，我已命令部队指挥官对那些企图袭击盟军官兵的人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天一黑，苏联哨兵就对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开枪射击，数人被打死，两名部长的汽车遭到枪击。

斯沃博达总统在莫斯科的顽强不屈和捷国内抵抗运动的日益高涨，终于产生了效果。当午夜会谈再度开始时，勃列日涅夫突然宣布：为了苏捷“友谊”，苏联政府决定释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四人。并让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参加会谈。

老将军终于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换回了杜布切克等人的自由。

8月24日，布拉格整整一天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消息，只有胡萨克打来电话说，谈判还在继续。担心了一整天的人们，终于在晚上10时45分，从布拉格电台中听到了广播斯沃博达总统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胞们：

首先，请你们接受陪同我来的全体同志的衷心问候。

我在出发前曾对你们说，我希望能在这晚回国，并向你们报告谈判结果。你们要知道，在这困难的时刻，如果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的迫切需要，我是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在国外多呆的。到达克里姆林宫之后，我们立即同苏联领导人开始会谈。我们认为，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同志也应该参加谈判，这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可以向你们宣布，这几位同志已经和我们一起在为下一步谈判作准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延长在莫斯科逗留时间的原因。亲爱的同胞们，现在我再次以我本人的名义，并且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在这里的其他同志的名义向你们讲话，要求你们保持冷静、明智和自信心。在工厂，在田野，在一切工作岗位上，负责地做好你们的工作吧！你们这种忠诚的态度将是对我们下一步谈判的最好的支持。

8月24日（星期六）中午饭过后，被克格勃羁押在深山密林中的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西蒙三人，突然被带到了莫斯科。而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已经在莫斯科了。此时，只有捷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仍未获得自由。

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西蒙被带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厦的五层的一个大会议厅门前。门被打开以后，他们看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正站在里面等着他们。双方寒暄、握手后，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勃列日涅夫一开头就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指的是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谴责苏联侵略的决议。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自8月21日上午被劫持之后，对于三天以来捷国内发生的事情一无

所知。现在，他们从勃列日涅夫嘴里第一次得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举行，国内正在罢工，人民已奋起反抗。而且还知道了没有成立任何新政府，斯沃博达等同志正在莫斯科。

当得知准备让他们参加苏捷谈判时，斯姆尔科夫斯基问道：“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不再受软禁？我们是否重新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代表？”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都作出了肯定的表示，随后向他们问起，在十四大上当选为捷共代理第一书记的西尔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勃列日涅夫说：“你们必须立刻回去，宣布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打消它的意图，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

“当然，我们回去后将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斯姆尔科夫斯基回答说，“这个政策将符合我的良心和我国人民的意志。”

这句话使柯西金大为恼火。他斥责道：“像你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怎么能讲出这样的话？！”

“我这样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斯姆尔科夫斯基也毫不退让，“正因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人，所以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想实行真正符合我的良心的政策。”

双方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六个人全都发了言。最后，勃列日涅夫在发言时甚至不再称“您”，而用“你”这种极不尊重的语气了。斯姆尔科夫斯基也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同志们，正是你们破坏了我们民族之间100年来的友谊。我们民族在100年前建立了对斯拉夫民族的兄弟感情。过去我们热爱斯拉夫俄国。50年来，我们一直热爱苏联。我国人民是你们最忠实的朋友。但是，你们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一切都毁掉了。”

双方争论得毫无结果，而最高级谈判还在等着斯姆尔科

夫斯基等人的参加。勃列日涅夫只好建议，先把问题放下。斯姆尔科夫斯基表示同意，但最后又补充说：“历史将会作出判断，谁是正确的，谁犯了可悲的错误。”

当他们再走出大楼时，斯姆尔科夫斯基发现，门口站岗的苏联高级军官毕恭毕敬地向他们敬礼。他这才意识到，从这时起，他被再次当作了捷国民议会主席，而不再是什么囚犯了。

一辆海鸥牌高级轿车把他们送到了一所别墅小楼前。6月份，斯姆尔科夫斯基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访问莫斯科时，正是住在这里。他们已经有四天没有洗澡、刮脸和换内衣了。洗过澡、换上苏联工作人员拿来的新内衣后，肮脏的囚犯又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想起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自己由座上宾变为阶下囚，又从阶下囚被请出来参加最高级会谈，斯姆尔科夫斯基真是感慨万千。

当他们来到克里姆林官侧翼配楼斯沃博达的房间时，终于又见到了阔别多日的老战友。斯沃博达含着热泪拥抱了他们。房间里还有兹·姆林纳日、比拉克等20多个人。但是他们却没有同比拉克、英德拉和皮列尔等人打招呼。

之后，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来到隔壁房间，看望病榻上的杜布切克。几天来，捷克斯洛伐克所遭受的噩运及苏联人的囚禁折磨，已使得杜布切克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他曾在浴室中突然昏倒，头磕在洗脸池上时被碰破了。斯沃博达总统的私人医生已给他进行了治疗。

杜布切克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由于天热，被子掀开了一角，半个身子露在外面，毫无知觉。显然他刚服过镇定药。但当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进来时，他居然睁开了眼睛，并且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一束阳光正照在杜布切克的枕头上，这个画面不禁使斯姆尔科夫斯基联想到了《圣经》中所说的圣

徒殉道时微笑的样子。

由于杜布切克的健康状况使他根本无法说话，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坐了会儿后就又回到了斯沃博达的房间。在那里，他们向斯沃博达了解了前段会谈的情况，并且听取了姆林纳日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捷国内重大事件的汇报。随后，他们又在杜布切克卧床不起、不能参加会谈的情况下，选出了暂时由斯姆尔科夫斯基率领的代表团。

捷共中央代表团由 14 名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组成。其中改革派有 6 人，即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西蒙和姆林纳日。亲苏派成员则有 8 人，包括英德拉、比拉克、雅盖什、什维斯特卡、皮列尔、列纳尔特、巴尔比雷克和里戈。由于斯沃博达和胡萨克当时没有党内职务，故不算捷共中央代表团正式成员，但他们却参加了代表团内部的所有讨论。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被苏联当局逮捕以后，又在他的同事的压力下获释，并又恢复谈判者的地位，同原来关押他们的人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这样的事从来不曾有过。尽管勃列日涅夫强调这是为了捷苏“友谊”，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心里却很清楚，这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政治上的又一次失败。捷国内到处都洋溢着一种胜利的情绪。斯沃博达的英雄形象在他的同胞心目中，也显得更加高大了。

● “不签字就别想离开克里姆林宫！”

捷克斯洛伐克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获释，仅仅是真正谈判的开始。赢得第一分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不得不面对苏联人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克里姆林宫此时早已准备好了一个会谈公报草案，共有16点。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使入侵实际上合法化，说他们是来制止反革命，向捷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因此苏军将长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二是提出一系列压制捷改革运动的政治措施，其中包括加强捷共保守派势力，撤掉一批莫斯科特别讨厌的捷领导人的职务；三是坚持必须宣布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非法的，所作出的决议一概无效。

捷共代表团认为苏联提出的十六点草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首先，捷方不承认国内存在反革命动乱，并且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将这一点写上。基于此点，苏军也就没有理由在捷境内长期驻扎下去，因此协议书上不仅必须写上“暂时”这个字眼，而且还应确定具体的撤离日期。对于这些，就连亲莫斯科分子也不敢公开反对。

其次，改革派不能容许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就这样被克里姆林宫轻易地扼杀掉。尽管苏联的十六点没有具体否认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但它从否定捷共十四大的合法性及提出的撤换克里格尔、希克、齐萨日等改革派领导人的要求，便可引伸出全盘反对捷共改革政策的含意。因此，改革派坚持必须保证：以捷共《行动纲领》为依据的政治路线可以继续得到贯彻执行。

最后，改革派不同意否定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十四大是在苏联占领期间召开的一次非常会议，它对挽救捷共在人民中的威信，援救被捕的杜布切克改革派领导成员的生命和维持他们的地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这个会议又被杜布切克等人亲自给否定掉，那对于捷共全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都是无法交待的。但如果苏方坚持的话，他们也想好了

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不承认新选出的捷共中央（这也是苏共政治局最关心的问题）。

切尔尼克最后提出，捷代表团应该草拟一个自己的公报草案，并尽早交给苏共政治局。代表团对此表示同意，并在8月24日下午对草案内容进行了讨论，最后由姆林纳日和西蒙两人形成了文字。当天晚饭前，姆林纳日赶到克里姆林宫秘书处，请苏联工作人员将这一草案打印了出来。

据姆林纳日回忆说：捷共代表团所提出的草案，“实际上只是将7月间捷共主席团给华沙会议五国的复信中所持的立场，加以改头换面而已。当然，某些论据和整个调子都根据新形势有所改变，那就是某些消极现象有所突出，特别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对那股强大的政治压力已失去了影响和控制。我们仍然不同意把局势说成是‘反革命’的。我们认为全民族运动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趋势是主流。我们同意，五个邻国对我国局势的忧虑是事出有因的，而捷共对此低估了。但我们认为，干涉本身于事无补，实际上是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所以，五国首先必须撤军。在撤军的基础上，应该照顾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拉迪斯拉发的结论是可以作为出发点的。至于国内政策，我们强调捷共《行动纲领》仍然是以后制定路线的基础”。

但是，当切尔尼克将捷共草案递交给苏共政治局后，却惹恼了苏联人。他们立刻把草案退了回来，并且指责捷共代表团这样做，完全是在给苏共政治局下最后通牒。苏共领导人强硬地指出，就捷共代表团目前的处境来说，它根本无权向苏联递交什么最后通牒。而苏联人却在此之后又提出了自己的最后通牒式的方案。这也就是后来签订的《莫斯科协议》的基础。

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根本不想同捷共代表团进行什么会

谈。它惟一的目的是迫使对手在自己提出的协议文本上签字投降。在 23 日和 24 日两天的时间里，双方代表团实际上没有举行任何会谈，而只是在会谈草案上进行着连续的修改、递送和驳回。

在之后的几天里，双方就公报草案展开了频繁的拉锯战。捷共代表团也记不清先后搞了多少个方案，修改了多少次。每次搞出的新方案或建议，都是由代表团中的两三个成员出面，交给苏方一个或两个代表。而苏方代表们也不管自己是否系全权代表，总是立即表态予以否定，并且当场或过一会儿就把文件退了回来。

经过多次反复后，捷共代表团只好讨论苏联的方案了。在相持阶段，捷共代表团中的亲莫斯科分子大体持被动态度。他们既没有对苏联方案表示明确支持，也没有反对切尔尼克等人的修改，而且也不提任何建议，只是在一旁静观事态发展，等着看杜布切克集团最后如何收场。但实际上，他们对于苏联写进的任何内容都会无条件接受。而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改革派自从汇合后就已经商定好，在会谈中五个人要统一步调，当然，等杜布切克能重新参加会谈时，这个集团还将包括他。

在双方相持不下的两天里，苏共政治局不断地向捷共代表团施加压力。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分别同捷共代表团某些成员进行了个别交谈。在谈话中他们时而进行恫吓，时而又施以对个人的恩惠和许诺。

勃列日涅夫的恫吓也可谓直言不讳，曾多次声称：“反正你们现在不签，过一个星期也得签；一个星期后不签，过十四天再签；如果过十四天还不签，那就过一月再签。总之，你们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必须签字。”苏联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捷共中央领导人已被扣作人质，倘若不在苏方的最后通

牒上签字，就别想离开克里姆林宫！

苏共领导人还不断地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相威胁，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旦同苏联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就会得到开枪还击的命令。他们还警告说：只要达不成一项政治协议，莫斯科是决不会让步的；如果事情一再拖延并最终发生流血事件，那么全部责任将由捷共领导人承担！

克里姆林宫的威胁和恫吓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就连捷共改革派对于莫斯科是否真的敢于屠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感到吃不准了。

改革派一方面觉得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根据是莫斯科实际上是不会轻易走出这一步的，因为那将给苏联在国际上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这种分析成立，即莫斯科确实仅仅是在恫吓，那么只要他们顶住了，这将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在经历过历史上一连串的投降以后，终于有一次能对占优势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反抗，这无疑将使这个民族从此挺直了腰杆。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把希望寄托在即使达不成协议，也不会发生大屠杀的假设上面。他们必须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命负责。实际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承担对血腥战争的责任。

姆林纳日在其回忆录（《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中，详细地记述了自己当时那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他甚至举例说，“一个强盗用枪吓唬人时，如果不开枪也能达到目的的话，那么他确实只是在吓唬而已；但如果他的情况不妙，被逼到无路可走时，仍然说他只是吓唬人而已，那就是一种幻想了。”

如果说坚定的改革派还在举棋不定的话，那么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斯沃博达首先作出了决断。他表示只要能够

避免屠杀，他愿意接受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条件，尽快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政治家与军人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用姆林纳日的说法，斯沃博达“不仅不是改革派的政治家，而且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家”，只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把他推上了国家元首的最高位置。因此，当改革派绞尽脑汁想在夹缝中求生存，以便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事业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斯沃博达却宁肯牺牲改革来换取国内和平。

所以，在捷共代表团讨论方案修改的每次会议上，对改革派频频施加压力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胡萨克，另一个就是斯沃博达。当然两个人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胡萨克是想讨好克里姆林宫，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斯沃博达则是担心，每一小时的拖延都会导致国内的流血冲突。

在苏共领导和捷共内部强大压力下，改革派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让步。至此，克里姆林宫也感到举行双方会谈的时机熟了，时间定在了1968年8月26日（星期一）。在这次由捷共中央代表团同苏共政治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将敲定会谈公报的最后成文。

由于克里姆林宫坚持会谈结果必须保密，因此世人对于其内容不得而知。不过，1968年9月8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却刊登过一个文本要点。据搞到这个文件的美国记者塔德·舒尔茨说，这是 he 从一个捷共高级干部手中弄到的，并且说这是“俄国人星期日向斯沃博达总统提出的要求”：

1. 按照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来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方向。
2. 宣布（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

3. 通过书报检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
4. 捷方宣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过反革命活动。
5. 群众性的舆论工具不得进行反盟国宣传。
6. 在军队撤离时,其他小组(指苏联秘密警察机构)也将离开。
7. 要求解除帕维尔内务部长的职务,因为他不愿同苏联的保卫机关合作。
8. 可以由(华沙条约)五国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决定(对入侵造成的损失)哪些应予赔偿,哪些不予赔偿。
9. 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必须根据布拉迪斯拉发协议加以调整。
10. 捷克斯洛伐克将发表一个文件,申明政府过去没有要求,今后也不要求联合国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11. 部长安排问题:撤销希克和哈耶克教授的(部长)职务。
12. 发表一项声明,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在同西德接壤的边界线上防御力量不足,必须由盟国保证其安全。
13. 莫斯科谈判的结果应严格保密,不得公布。
14. 应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友谊和同盟关系。
15. 发表一项声明,保证为苏联工作过的人……不会受到迫害。
16. 宣布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的声明,将在外国军队撤离该国之后发表。

8月25日(星期日)夜里,捷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再次聚会在会议桌旁。虽说是全体会议,但实际上还是有三个人缺席:杜布切克因身体虚弱一直没有参加;英德拉因患美尼尔综合症也一直缺席;克里格尔则一直被苏联人看押着拒绝释放。

会议由切尔尼克主持,就明天是否在协议上签字的问题逐个表态。姆林纳日提出,协议尚未最后成文,明天还有可能作出某些改动,因此现在就要每个人明确表态,哪怕仅仅是原则上的表示赞成也为时过早。

但斯沃博达却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对所有人大发雷霆地喊道:“你们老是不停地空谈,已经谈得让人家把国家都给占领了,还在谈!现在应该是正视现实的时候了。我这一辈子见到的死人能堆成山。我决不允许再让你们的空谈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胡萨克则在一旁敲边鼓,催促人们赶快表态。

姆林纳日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和自己的痛苦心情:

当时的气氛是令人异常痛苦、紧张的,甚至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味道。在这次会议上,我仍然拒绝表示“赞成”,想待第二天看看最后一次会谈取得什么结果,再决定自己的态度。其他的人当时都已表示“赞成”。至于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人,英德拉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克里格尔的态度尚不得而知,杜布切克表示明天再表态。当时只有杜布切克的态度有可能对情况的转机发生比较大的影响。

会议在8月26日凌晨两三点钟时宣布结束。我在三点钟以后来到列宁山上的政府别墅。像在克里姆林宫一样,这里大厅的桌子上摆着伏特加、白兰地、鱼籽酱、鲑鱼和其他美味。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后,便疲惫不堪地倒

在了床上。没过一会儿，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我开了门，只见来了一个身着剪裁合体的睡衣（看来里面没有再穿什么内衣）的小姐。“同志，您需要点儿什么？”这个宝贝妖里妖气地问了这么一句，然后诱惑地一笑。我真不知道，作为克里姆林宫接待的政府客人，我还会受到什么优待，也根本无意去证实这个问题。我厌烦地说道，我只希望让我安静一会儿，说完就关上了房门。

自从8月20日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以来，我只睡过三次觉，每次不足四小时。我吸了成百支烟，喝了几十杯咖啡。在那些不眠的日子里，气氛始终是紧张的。无论是在杜布切克办公室里被人用冲锋枪对准后脑勺，还是在苏联大使馆和维索昌尼，或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气氛都是一样地紧张。我感觉到异常疲劳，盼望能睡一觉，但是办不到。我脑子里思想零乱，只有某些意象、感觉、无穷无尽而又不合逻辑的画面和幻影，虽然期间偶尔也出现过一些清晰和简单的认识。

.....

一周之前，任何不合逻辑的事情均未发生，莫斯科仅仅是决定不再继续容忍改革共产主义的尝试，因为对它的切身利益来说，这实在太危险了。照莫斯科看来，惟一合乎逻辑的是，把我放在克里姆林宫被告席上并且质问我：你是否“永远”跟着我们走？须知近二十年来你一直是这样讲的呀！他们想听到的只是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的话，他们对细节一概不感兴趣。他们不仅对我如此，对扮演人质和政府代表双重角色的其他人也是这样。

斯沃博达老将军骂我们，希望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这样做是对的，他明了当时的处境。他对莫斯科明确

“赞成”，他要求大家也照此办理，谁若不愿意这样做，就请表示“不赞成”，只是不要再拖延时间了。苏共政治局竟然像是一群匪徒，这真弄得我们茫然不知所措。但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卡达尔曾这样问过杜布切克：“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吗？”他认为杜布切克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确实都是些白痴，我们的痴心就在于有那么一套改革的共产主义思想。

我的腿有些发麻，于是靠近窗台，坐在敞开的窗子前。这时，一个着便衣的男人从附近柏树丛中走过来。此人是在干什么的，不言自明。他走近窗子，和那位小姐一样，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同志，您需要点儿什么？”我告诉他，什么都不需要，随后离开窗子，躺在床上。从花园里这个男人的出现也可以看出，莫斯科对诸事的考虑要比我们周全得多。在那里布置这么一个人，大概是怕万一我不愿明确表态时会跳窗子的。也许只要这个人吹一下口哨，立即就会再跑过来两个克格勃人员。窗户不高，他们会毫不费劲地在底下接住我，我的腿肯定不会摔断的。

8月26日上午9点，姆林纳日来到克里姆林宫，把自己考虑了一夜的决定告诉了捷共代表团：他决定不在协议上签字。

比拉克面色阴沉，冷冰冰地说道：“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而切尔尼克、什帕切克、斯姆尔科斯基和西蒙则一致劝说姆林纳日，最好在协议书上签字。他们并且告诉姆林纳日，他们四个人刚被释放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切尔尼克说道：“诚然，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有一点你必须看到，你这样做不过是在为自

己的良心寻找个最好的归宿。作为党的领导人，你在考虑问题时必须把解决国家政治前途问题放在首位。如果现在你退出党的领导，这只能加重我们处境的困难，使尚有可能挽救的许多事情受到损害。你的决定还可能会影响到代表团其他成员，使人觉得签字似乎仅是个人的事情，签字是对人的荣誉和良知的背叛，而不是把签字看作一种义务——为摆脱当前的局面寻求一条政治出路。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是负有责任的。”

最后，他们又告诉姆林纳日，杜布切克将要参加今天的谈判，他将坚持对条文作若干修改，其中特别涉及到从捷撤军问题。切尔尼克等人的劝说多少打动了姆林纳日。他答应自己再认真考虑一下。

姆林纳日对今后的政治前途曾作过如下的设想：不管协议作出怎样的修改，它毕竟是对莫斯科有利的，而且莫斯科还将以此为根据，通过不断地施加压力来反对捷共的改革。但同时他又天真地幻想，只要捷共领导班子不被换掉，那就还是为改革政策争得了一席之地。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不取决于协议文字本身，而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力量对比，也取决于莫斯科的力量对比。归根到底，完全取决于杜布切克周围的改革派是否牢不可破地团结在一起。尽管前途未卜，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中午时分，当姆林纳日宣布自己将改变自己的态度、要和其他人一起签署协议的时候，切尔尼克带着毫不掩饰的愉快心情，热烈地拥抱了他。令切尔尼克高兴的是，再也没有一个人和他不一样了，这样将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没有签字”了。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克里格尔很快就扫了他的兴。

自从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被释放后，捷共代表团就一直

在要求释放克里格尔，并且把既是中央主席团委员，又是民族阵线主席的克里格尔选进了捷共代表团。但是苏方总是找出种种借口拒绝释放，并在同捷共中央领导人个别谈话时极力孤立克里格尔。但是到了要最后签字的时候，克里姆林宫也感到不能再拖延了，这才在8月26日下午把克里格尔带到克里姆林宫来。

对于克里格尔来说，他的处境是极具屈辱性的。而且对于捷共代表团来说，这也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毕竟是在克里格尔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通过了协议书，而现在又要求他承认既成事实，并且在上而签字。克里格尔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克里格尔回到代表团后，斯姆尔科夫斯基第一个同他谈了话，希望他能够与他们共同承担起政治责任。但是，用姆林纳日的话来说，克里格尔“还停留在我们昨天开始讨论时所处的阶段。克里格尔没有进入下一阶段，他坚持不签”。

随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都轮流与克里格尔进行了谈话，试图最后说服他。斯沃博达在与其单独谈话时，甚至像对待一个小兵一样大声训斥了这位60岁的老先生。克里格尔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向他提出抗议：“我不是一个小孩子，我懂得如何思考。请不要对我大喊大叫！”

斯沃博达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叫喊：“可你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地不负责任。你不应该拒绝签字，否则国内尸体就将堆成山！”

最终，所有人的劝说都没能说动克里格尔，他固执地说道：“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或者把我枪毙？这三天来，我一直像犯人一样被他们关押着，我早已经估计到了这一切。但即便我注定要死，我就更不愿意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用违背良心的行动来玷污自己的生命。因此我是决不会签字的。”

克里格尔还拒绝参加同苏共政治局的任何谈判。但苏联方面却主动提出，要他参加谈判。苏共政治局显然是想看到捷共之间的公开争吵，以及其他同克里格尔的分道扬镳。但是杜布切克坚决反对，结果会谈还是在克里格尔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

克里格尔是捷共代表团在与克里姆林宫的抗争中，坚持到最后的惟一的人。当捷共中央的改革派在莫斯科谈判中经历了犹豫和动摇、并最终一致地选择了妥协之路的时候，克里格尔却以反潮流的精神，独自顶住了来自克里姆林宫和捷共内部强大压力。

姆林纳日曾经说过，克里格尔在当时的行动没有给人以政治家的印象，“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行动的”。然而两年之后，当姆林纳日被捷共保守派开除了党籍的时候，他终于认识到了克里格尔当时的选择才是惟一正确的。他在其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道：

事后证明，他的行为比我们更适合于当时的形势。我们的确像是受到了强盗讹诈的人。但我们却陷入了幻想，以为我们是政治家，是在同另外的政治家讨论政治问题。

● 勃列日涅夫大谈“有限主权论”

克里姆林宫提出的十六点方案，经过捷共改革派领导人两天的修改和不知多少回合讨价还价后，最终形成了一个双

方基本认同的初稿。至此，自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获释后即由苏方中止了两天的捷苏最高级会谈，终于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了。然而，双方的分歧与争斗却并没有最后结束，只不过是昔日的笔战转为了面对面的较量。

1968年8月26日下午4时许，捷苏两党最高级会谈正式开始。杜布切克亲自挂帅，抱病参加了这次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最后一战。

会谈由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他首先毫不脸红地用极其愉快的语调，说了一大通关于同志关系和共同利益的话。他又强调，双方将以此为出发点，就复杂和严重局势中的下一步行动，达成一致的意見。

接下来，勃列日涅夫谈到了苏共领导又是如何带着惋惜和痛苦的心情，决定搞军事干涉的，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地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对于苏联来说，社会主义利益高于一切。随后，他又赞扬了苏联的忠实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斯沃博达，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并且再三表达了他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热爱之心。勃列日涅夫本人似乎也被自己的一番雄辩演说感动了。

按照商定的会谈议程，捷方也要回答几句类似的话后才开始逐条逐段地讨论协议文本。而且作为对等，捷方理应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言。但是，杜布切克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坏，为准备谈判，医生给他打了镇定针。于是，这个发言由切尔尼克来作。

切尔尼克讲得很实际，没有讲那些关于同志关系和永恒友谊的废话。他在自己的发言中，十分小心地捍卫了捷共《行动纲领》的路线，并且运用巧妙的言词，对于军事干涉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行动的说法，予以了否定。

苏共政治局马上有人插话表示反对，切尔尼克则根据国际法基本准则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随着勃列日涅夫最后也投入争论，会谈开始时由他所营造出的轻松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会谈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了。切尔尼克在对方的不断插话打断后，总算作完了全部发言。

这时，杜布切克突然提出要求发言，并且不等会议主持人勃列日涅夫表态，自己就讲了起来。开始的时候，杜布切克讲得结结巴巴、吐字不清，显然镇定药物还在起作用。但他渐渐地恢复了常态，开始能够使用流利的俄语，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杜布切克满怀激情地谈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复兴过程”，随后话锋一转，他的讲话逐渐变成了对入侵者的控诉。杜布切克的即席讲话，是他几个月来日臻成熟的改革思想的表述及入侵后几天来真实思想的流露，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极其雄辩和感人的。

杜布切克话音刚落，勃列日涅夫马上发言，对杜布切克的发言进行了驳斥。由于勃列日涅夫讲得也都是心里话，因此他的这个即席演说也就成为整个会谈过程中苏方所作的惟一真正有意思的发言。

勃列日涅夫在发言中简要而明确地回答了三个基本问题，即莫斯科最不喜欢“布拉格之春”的是哪一点？莫斯科是如何看待东欧集团国家的主权的？莫斯科认为什么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东西？

勃列日涅夫这一番演讲，竟然让捷共改革派听得目瞪口呆，大开眼界。它不仅使得捷共中央领导人，而且让全世界都懂得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究

竟是个什么货色。

在谈到捷国内改革运动时，勃列日涅夫这一次没有就“反革命势力”和“社会主义利益”发表老生常谈，而是具体和明确地指责杜布切克在处理内政问题时，没有事先征得他的批准和同意，甚至全然不顾他的指示和劝告。他说：“我是从一开始就愿意帮助你反对诺沃提尼的。在1月份我就问过你：他的人对你有威胁吗？你想换掉他们吗？你想换内务部长吗？想换国防部长吗？你还想换谁？可是你却说，不用换，这都是些好同志。然而以后，我们突然听说你把内务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其他部长都撤换掉了，你还撤换了党中央书记。”

勃列日涅夫接着又说道：“早在今年的2月份，我就对你的报告提了意见，我曾提醒你说，有些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你竟不作修改！你们怎么能这样工作呢？在我们这里，甚至连我自己在准备报告的时候，我还要请全体政治局委员提意见呢。是这样吗，同志们？”

勃列日涅夫明知故问地说，并用眼睛望着坐在他两侧的苏共政治局的成员。那些人频频点头，并在嘴里咕噜着什么，表示赞同自己首长的讲话。勃列日涅夫深表满意，接着又说：

“我们这里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其前提是，每个人的意见、包括第一书记的意见，也必须服从大家的意见。推而广之，既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各国共产党中央之间也应该实行集体领导。”

勃列日涅夫是真的生气了，因为杜布切克辜负了他的信任，没有将自己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提交克里姆林宫批准。他指责杜布切克说：“我信任你，并在别人面前维护你。我曾多次对我们的同志，当然这也包括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等说过，我们的萨沙（杜布切克名字亚历山大

的昵称)是个好同志。可是你却使我们大家太失望了。”

就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的声音总是痛心地颤抖着，他断断续续地说着，简直要哭出来了。他好像是一个因被自己的孩子欺骗而深受损害的家长。他确实认为自己是一家之长，家庭的其他成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听命，因为他的意见和意志自然是最大的权威，他是为大家好。如果认为这一切应该是另一个样子，那他是决不容忍的，他很自然地把这看作是敌对和叛逆的表现。

随后，勃列日涅夫从“布拉格不是任何时候都向克里姆林宫请示”这一条主要的罪状，又引出了所有的其他罪状：反“社会主义的倾向”泛滥；报刊随心所欲；“反革命”组织正在产生；捷共领导在这些势力的压力下不断地后退，等等。

勃列日涅夫总算对“布拉格之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概括起来就是说，如果没有得到他这个家长的批准，杜布切克就什么也别做。换句话说，如果当初杜布切克从自己的报告中删去了勃列日涅夫建议他删掉的词句，如果他只任命勃列日涅夫同意的部长和书记，那么，任何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于是，长期以来维护了“我们的萨沙”的勃列日涅夫本人终于改变了看法：鉴于这一切，莫斯科最后才明白，不能信赖杜布切克的领导。因为这已经牵涉到另外的、最根本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问题了。

勃列日涅夫广泛地谈到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谈到牺牲的战士和被杀害的平民，谈到巨大的物质损失和苏联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苏联以这样的代价赢得了自己的安全，其保证就是战后欧洲的分治，具体地来说，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结成了“永恒的”联盟。

在勃列日涅夫看来，由于数以万计的苏联士兵已经为捷

克斯洛伐克的解放付出了生命，因此对他们的坟墓，捷克斯洛伐克人不仅不应玷污，而且应当尊敬。勃列日涅夫最后明确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界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的边界。苏共政治局也没有权力使这次战争的成果遭到威胁，因为它也无权坐视苏联人民的牺牲遭到亵渎。

稍作停顿后，勃列日涅夫又说道：“在军事干涉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是困难的，人们很动感情。捷共领导班子现在有些事情看不清，这也是可以原谅的。这一切在今天对你们来说，好像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可是如果你们再看看哥穆尔卡，就会明白一切、哥穆尔卡在1956年的时候，也像你们一样反对我们的军队帮助波兰。但如果我今天对他说，我们要从波兰撤走苏军，哥穆尔卡就会马上坐着专机到这里来，请求我不要那样做。”

在为什么要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勃列日涅夫称得上是第一次坦率直言。尽管他的即兴演说滔滔不绝，但却从没有提到一句“西方帝国主义”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陈词滥调，也没有引用任何一句当时充斥苏联报刊的种种谎言，例如什么西德复仇主义者已经动手准备进行军事袭击，到布拉格去的旅游者当中充满了美国军官等等。《真理报》和塔斯社编造出来的谎言，不过是用来为入侵制造舆论的。既然现在入侵已经发生，而且被人侵国家的领导人已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了克里姆林宫，那么他也就无须再去重复那些废话了。

勃列日涅夫的逻辑是简单的：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已作出了结论，不能再信赖你们了。你们在内政上为所欲为，甚至做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好言相劝你们又不听。你们的国家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士兵到过的地区，这是我们用巨

大牺牲换来的，我们决不会放弃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边界。由于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感到受到威胁。为了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为你们的自由献出了生命的死者，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向你们派兵，以便使我们在我们共同的边界内感到安全。这是一个不取决于外部条件的原则问题，至于是否有人在威胁你们，这并不重要。这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永恒的”定局。

勃列日涅夫本人似乎也感到很惊奇：这么简单的事，你们怎么不明白呢？这是怎么回事？在他的通篇讲话中，诸如“主权”、“民族和国家独立”这类词汇根本没有出现过。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思想：战争中我们的士兵到了易北河，那里也就是我们苏联的边界。

“对我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要维护它，哪怕冒着发生新的战争冲突的危险。”勃列日涅夫明确地说道，“退一步讲，即使真的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仍然会进行。”

勃列日涅夫接着又补充说：“可是现在不存在发生这种冲突的危险。我问过约翰逊总统，美国政府今天是否完全确认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8月18日我得到回答说，如果只涉及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美国政府将毫不保留地承认决议；至于南斯拉夫，则需要谈判。你们看，会发生对你们有利的事吗？不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同志可能会出来讲话，贝林格同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作者注）也将出来讲话。但他们又能讲些什么？你们寄希望于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可是它在50年内是不会有意义的！”

直到这个时刻，捷共中央领导人才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全

部真相：捷克斯洛伐克又一次被大国间的交易出卖了！姆林纳日曾悲痛地调侃道：“当时，我似乎有点理解哈哈了。”哈哈于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取代贝奈斯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并于1939年奉召去柏林签署了卖国条约。数年之后，姆林纳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这又是简单而明确的语言。勃列日涅夫给我们共产主义改革派们上了真正有价值的一课。我们，这些傻瓜们，还在考虑什么适合于欧洲（包括西欧）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他，一个现实主义者，却知道它在50年内是不会有意义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边界，或者说苏联的边界目前是易北河吗！这是美国总统也同意的，因此，也许50年都不会变。贝林格算什么？他有坦克吗？难道他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吗？

3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曾被自己的盟国英国和法国，无情地出卖给了希特勒德国。30年后的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成了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勃列日涅夫采取了当年希特勒的做法，而美国总统约翰逊则扮演了类似当初张伯伦的角色。

勃列日涅夫发表完宏篇大论后，他感到他已经把全部内心话都倒了出来，而且道理又阐述得如此明确和易懂，他相信，此刻就连杜布切克也应该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从而有可能开始讨论即将隆重签署的文本了。

但是，随后出现的情况却出乎他的意料，杜布切克马上对他的“侵略有理”的论点进行了反驳，他说：“任何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国际公法的起码准则！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之间，即便是为了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也是如此！否则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公理可讲……”

杜布切克的固执把勃列日涅夫惹火了。他脸变得血红，怒气冲冲地打断了杜布切克的发言，高声叫喊道：“迄今的全部谈判显然毫无意义。切尔纳的事件又在重演。会谈是多余的，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我宣布中断谈判。”说完，他和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都站了起来，准备离开会谈房间。

面对发生的混乱，斯沃博达试图重新平息风暴。他劝说双方不要再互相指责，因为这样下去将会是毫无结果的。

勃列日涅夫愣了一下，但听完斯沃博达的讲话后还是转身走了。他抛下了一句话：“下一步怎么办，还要协商。”说完就走出了会议大厅。其他苏联政治局成员也紧随勃列日涅夫之后，鱼贯而出。

● 在屈辱条约上签字画押

杜布切克差不多又垮了。他发抖，神经紧张，语无伦次。医生过来要给他打针。他把医生赶走了，说什么也不要。他突然向留在会议大厅里的捷共代表团成员宣布：“我不签字了！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我不签字了。”

切尔尼克、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姆林纳日跑到他跟前，接二连三地劝他说：“这不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采用这种办法来改变谈判，现在已经不行了。”大家轮流同他谈，目的是要说服他，以便使谈判能够继续进行。

杜布切克听着他们的劝说，虽然没有反驳，但仍不肯改变自己的态度，只是一再地重复着：“难道你们看不出来，他

们一点都不明白，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总之，我不签字。”

如果杜布切克昨天夜里参加了捷共代表团的讨论、并采取现在的态度，就会从根本上影响谈判。但现在已经不行了。最后他还是让人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并且在大家的第二轮压力下，最终屈服了。

在上述情况发生以前，双方都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以使谈判能够继续下去。不论是斯沃博达、切尔尼克以及比拉克和雅盖什，都跑出大厅到旁边的一些房间里去了。苏斯洛夫、波罗马廖夫及其他一些人也在哪里。斯沃博达最后还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接见，他们一起谈了些什么。

这一切使谈判中断了大约一小时。谈判重新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复会后的谈判已不大具有戏剧性了。双方代表团逐段讨论了文本。斯沃博达在发言中甚至说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苏联军队从我们那里离开，撤离我国的时候，人们还将像二战结束时那样，用鲜花来欢送他们。”苏联方面总的来说，也比原来要缓和一些。

据姆林纳日回忆，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曾对文本作了两处重要的改动：一个是关于军队在“暂时”驻留后撤退的问题，其条件是“正常化”的进展程度；其次是关于苏联方面支持捷共中央一月和五月全会政治路线问题。

在后一个问题上，在谈到四月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捷共《行动纲领》）时，发生了争论。像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时一样，勃列日涅夫从修辞学的角度拒绝接受在“一月”和“五月”全会之间加上破折号的建议，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包括四月全会了。勃列日涅夫坦率地说道：“苏联政治局认为，《行动纲领》中的某些提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这个纲领。”

捷方则表示，他们也认为需要对《行动纲领》作出一定的修改。不过苏联政治局显然对捷共中央的五月决议更感兴趣，并明确地表示了支持。这是因为五月决议虽然认为《行动纲领》是正确的，并宣布它为基本路线，但它也同时提出了捷国内存在着“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苏方最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个提法，因为它为苏联等国的武装干涉提供了理由。总之，直到最后，在双方签署的《莫斯科议定书》中也没有包含明确支持捷共《行动纲领》的内容。

接下来便是富有戏剧性的签字仪式。姆林纳日在其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闹剧场面：

在午夜前一切都准备就绪，签字的时候到了。突然，通向大厅的门敞开了，大约有十名摄影师简直是奔了进来。好像听到了口令一样，整个苏联政治局一下子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都向长桌对面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张开了双臂，准备拥抱。这是一个由摄影师的闪光灯照耀着的荒谬绝伦的场面：苏联政治局委员们的十几双手臂依次张开越过长桌。

我突然感觉到，这好像是一种奇异的植物想用自己的带粘液的爪子把我们抓住似的。我没有站起来去履行相应的动作，而是抵着会议桌的腿向后退了一蹬，我坐的椅子在打蜡的地板上朝离桌子3米远的墙滑过去了。我在墙边挨着柯茨基大使停住了。他同那些没有上会议桌的人坐在一起。柯茨基的眼里露出了真正恐惧的神色，悄悄地对我说：“你疯了！”我没有理会这点，但是我说，我不愿意拥抱，总之，我不能够。桌上的拥抱仪式已经结束了，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个场面。

然后，双方主要领导人签字的场面也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接着，摄影师和记者们像冲进来时那样，一下子又都消失了。当大厅的大门刚被关上时，我突然从桌边听到波德戈尔内讲话：“姆林纳日同志，您不签字吗？”他注意到了我在逃避，因为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大约他的拥抱对象也正是我。那些尚未注意到什么事情的人，也都向我这张望起来，看我怎么办。我说：“我签字。”我站了起来，最终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民主改革的判决书上，加上了自己的亲笔签名。

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克里姆林宫终于如愿以偿。

而捷共代表团的改革派成员的感受却如同五内俱焚。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每个当事人或许都曾为之痛哭过。这种神经性的休克在布拉格时就已经降临到某些人的头上，并且挫伤了他们。我现在还记得，当我们在布拉格等着那些坦克时，我看见斯拉维克和姆林纳日是怎样哭泣。在莫斯科，当我们拿到苏联最初的草案并要求每个人来读它的俄文本时，我们一个个都气昏了。”

此时此刻，捷共改革派真不知道自己的抉择，究竟是拯救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还是继慕尼黑之后又一次出卖了他们？

当《莫斯科议定书》签定仪式结束之后，双方又围绕着释放克里格尔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于是，刚刚出现在勃列日涅夫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消失了，会谈气氛也再度紧张起来。

勃列日涅夫拒绝释放克里格尔，他说：“克里格尔最好不要和代表团一起回布拉格。你们应该把他留在这里，因为他没有签字，他会给你们找麻烦的。”

但是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先后表示了自己强硬的态度：

捷共代表团必须全体回到布拉格，他们是决不会抛下克里格尔一个人而返回布拉格的。

勃列日涅夫又解释说：“克里格尔没有在《莫斯科议定书》签字。他回去后很有可能会组织起一个反对派来破坏协议。他还会把自己打扮成为惟一未签字的英雄。请你们想想，那时将使你们陷入何等的困境？”

斯姆尔科夫斯基回答道：“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我们会妥善解决的。”

而此刻并非政治家的斯沃博达，却似乎理解了克里姆林宫的想法。他向勃列日涅夫表示，回到布拉格以后，他将会为克里格尔及其妻子在兰尼猎场安排住处。勃列日涅夫立刻心领神会，知道斯沃博达这是在向他保证将软禁克里格尔。但他仍不放心地问道：“他会从你们那里逃跑的！你们谁能为他担保？”

什帕切克、西蒙和姆林纳日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愿意为克里格尔担保。但是，勃列日涅夫似乎仍不放心。于是双方再次举行了“四巨头”会谈。在几天的谈判中，凡遇到重大问题总是由苏方的四个人同捷方的四个人来会谈的。苏方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捷方是杜布切克、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

捷苏双方“四巨头”会谈的结果是，再次达成了令捷共代表团丢脸、对克里格尔来说则是屈辱性的协议：俘虏将直接在机场交接，而不能放他到克里姆林宫来。

当一切问题都解决完之后，苏共要人的脸上再度出现了“阴转晴”。就连一向古板的柯西金甚至也谈笑风生地建议道：“我们俄国有个古老的习惯，当亲近的客人们离开主人家的时候，一定要从容地坐一坐，喝杯告别酒。”

然而，柯西金的这番话却使姆林纳日联想到了另外一种风俗。他记得曾在哪本书上读到过蒙古某氏族的一种奇怪的习惯。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特别喜欢的俘虏跑掉，就在他们的脚掌上穿上一段马鬃。这段马鬃慢慢地就长在了脚掌上了。只要俘虏不想站立和逃跑，马鬃对他是无妨的。他心里想道：柯西金所说的俄国人挽留客人的习惯，真算得上是人道得多了。

双方代表团的成员们手端酒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随意地交谈着。苏联方面显然想通过一种更为轻松友好的气氛来结束整个会谈。

柯西金朝姆林纳日走了过来，交谈了几句闲话后便切入了正题。他问道：“协议已经签字，但您认为实施起来是否现实？其中又存在着哪些困难？对于今后的人事安排您又有什么考虑？”

姆林纳日坦率地谈到了自己的考虑，他说：“根据我的看法，如果莫斯科的政治局把那些企图建立‘革命政府’的人视作自己的主要支柱的话，那未来将是可怕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

当听到比拉克、英德拉等人的名字时，柯西金不屑地把手一挥，表示出了对这两个人的极度轻蔑。这些人在入侵前和入侵后的表现太让克里姆林宫失望了。如果不是他们保证将组建起一个“革命政府”来响应苏联军队，或许克里姆林宫还不会下决心出兵；如果不是他们在关键时刻疲软，克里姆林宫也不会落到现在这种尴尬的境地。

围绕着人事安排问题，姆林纳日明确指出，协议中规定的克里格尔、齐萨士、帕维尔、哈耶克可以离职，但前提应该是，那些在8月里名誉扫地的人也必须离职。柯西金未置可否，但却表现出对胡萨克情有独钟，他说道：“胡萨克同志

既有才干，又是好党员。我们以前不了解他，这次印象很好。”

姆林纳日立刻意识到，自己关于只要领导班子不改变，改革就有可能继续下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克里姆林宫早已找到了替代杜布切克的人物。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着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目标。

在大厅的另一侧，正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与苏共政治局的几个人交谈时，列纳尔特跑了过来，悄声说道：“主席同志，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同志正在隔壁的大厅里等着我们。他们想同我们一起干杯，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是否去几个人，代表大家满足他们的要求？”

斯姆尔科夫斯基看了列纳尔特一眼，对他大声地说道：“喏，列纳尔特同志，你去吧，去告诉他们，我们连看都不想看他们，更谈不上同他们共饮白兰地了。我们不去！”

站在周围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听得目瞪口呆。武装入侵确实深深地刺伤了捷共改革派领导人的自尊心。尽管他们被迫向苏联“家长”屈服了，但对于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小兄弟，却还敢于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怒。当斯姆尔科夫斯基把这件事告诉了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的时候，他们也都有一种出了口恶气的感觉，并且连连夸奖斯姆尔科夫斯“做得很对。”

莫斯科时间1968年8月27日凌晨1时左右，准备返国的捷共代表团抵达伏努科夫机场。勃列日涅夫率领的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已经等候在贵宾候机室。斯沃博达发现克里格尔并没有在场，当即询问了苏联人。苏方谎称克里格尔病了，因此已无法与他们同机返国。

克里格尔有糖尿病不假，但是只需服用足量的胰岛素就没有问题。因此斯沃博达拒绝了接受苏方这种解释，并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表示：只要克里格尔不走，他们也不走。

这又是一次摊牌。苏联领导人经过商量后决定让步。大约1个小时后，克里格尔被带到了机场。一位苏联工作人员告诉捷共代表团，克里格尔已经在飞机上了。但是斯姆尔科夫斯基仍不放心。他让一位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赶快跑到飞机上去看看。直到得到最后证实后，捷共代表团才登上了飞机。

凌晨2时许，飞机起飞了。最初，大家都是默默无语地坐着。捷共改革派成员都在考虑着飞抵布拉格后，如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解释这次签订的城下之盟。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乐观的。

抵达布拉格之后的主要角色都已经分配好了。斯沃博达将首先作公开讲话，接着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早上将去政府，斯姆尔科夫斯基去议会。杜布切克抵达后将马上同捷共中央维索昌尼的主席团谈判，并尽可能在下午就发表讲话。为此，姆林纳日和西蒙在飞机上为他赶写讲话稿。

8月27日早晨6时零几分，捷共代表团的飞机在布拉格鲁津机场着陆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把他们从机场送到了总统府。国内并没有得到正式通知，苏联人显然不希望让布拉格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斯沃博达总统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代表团在总统府里暂住几天。因为就在代表团飞回捷克斯洛伐克途中的时候，苏军驻布拉格的装甲部队才开始从各战略要点撤退，而驻总统府的苏军直到代表团抵达前的半个小时才刚刚撤离。

上午8时零5分，布拉格电台宣布了斯沃博达等人业已回国的消息。接着，总统旗从总统府屋顶上升起。

8时15分，电台广播了斯姆尔科夫斯基的一个简短的录音谈话。从讲话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都快累垮了。他说：

“现在叫我讲话是很难的。我想通过广播电台向作出了这样巨大贡献的我国人民表示深切的敬意。我们都回来了，克里格尔也回来了。”

然而，此时已疲惫不堪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却还不能休息。他必须赶到议会大厦去向议会作关于莫斯科协议的报告。

议会大厦前已聚满了人群，斯姆尔科夫斯基的黑色轿车只能很缓慢地行进。一张张焦急不安的怀有疑虑的面孔窥视着轿车。人们向他挥手致意并微笑着。但是看上去老了许多。斯姆尔科夫斯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欢迎。包围议会大厦的苏联坦克是在夜间才撤退的，建筑物前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被坦克履带压起的松土。

当斯姆尔科夫斯基登上议会大厦的台阶时，周围的人群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但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自从上星期三以来就一直在举行会议的议员们，却只是简单地站起来，默默地向他致敬。斯姆尔科夫斯基告诉他们谈判的情况及达成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要重新实行新闻检查，要取消各种政治组织，等等。

当天上午，切尔尼克在总统府举行了内阁会议。斯沃博达总统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捷政府通过了实施莫斯科协议的第一批决定。

与此同时，杜布切克也来到党中央委员会，同那些在索维昌尼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当选的主席团委员们进行谈判。他们向杜布切克汇报了代表大会的情况，杜布切克则向他们介绍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以及《莫斯科议定书》中关于不承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条文。由于要从根本上推翻这次代表大会，因此谈判进行得极为艰苦，双方也都相当地激动。但是最后，代表大会的负责人还是接受了杜布

切克的结论。

下午2时40分，布拉格电台广播了莫斯科公报。公报的内容立刻激起了首都和全国群众的愤怒和失意的情绪。党组织和其他团体的自发集会开始向布拉格电台发出抗议电报。广播员宣读了其中的一些，然后就呼吁公众安静，并通知说，斯沃博达和其他领导人很快就要向全国讲话。

在等候讲话期间，布拉格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乐。它那具有自豪和反抗的高尚情调更加激起了人民心中的愤怒。

斯沃博达在讲话中谈到，他们在莫斯科谈判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曾面临着流血的危险。他号召人民面对现实，通过尽快恢复国家生活正常化来保证苏军的尽早撤退。同时他还向全国保证，政府将不放弃1968年的改革纲领。

但是，共和国总统的讲话并没能消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痛苦和失望。越来越多的抗议、决议和电报，如同雪片般地飞向布拉格电台，而且马上就被广播了。在瓦茨拉夫广场和老城广场上，年轻人聚集了起来，有人喊叫着（这是）“第二次慕尼黑”的口号。

下午5时30分，布拉格电台又发表了杜布切克的广播讲话。这位改革首领用自己的真诚暂时稳定住了布拉格和全国迅速高涨起来的紧张气氛，并且保证将努力使外国军队尽快撤离和将捷改革事业进行下去。

然而，事态的发展之困难却完全出乎杜布切克意料之外。虽然他在此后坚持不当傀儡，但也只能在苏联人导演的舞台上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跳着坚持改革的小步舞，直到最终被苏联人安排的继承人胡萨克取代。

第九章

入侵引起的反响及恶果

● 勃列日涅夫坐到了刺刀尖上

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等东欧五国公然武装入侵一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事件发生后，立刻激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报刊，也都以最强烈的言词谴责苏联入侵，并称其为“帝国主义的行为”。苏联作为和平战士和反帝英雄的形象已损毁无遗。

但最强烈的反应却是来自共产主义世界，其中又当属有可能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二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铁托总统8月21日发表声明指出：“外国军队既未受到合法政府的邀请又未经同意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此事引起了我们的深刻忧虑，这种措施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遭到侵犯和践踏，使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他对侵略行径表示“愤慨”。

第二天，南斯拉夫政府发表声明，认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权决定别国的命运和它国内的发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和对它的领土的入侵，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是正当的，参加对捷进行军事干涉的各国政府对它们这一行动的深远后果必须承担责任。声明还要求苏联等入侵国家撤出

其军队，立即结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

南共联盟中央也于8月23日通过决议，拒绝华约五国企图为侵略进行辩护的所有论点，谴责依仗军事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压力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务是霸权主义的行径。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齐奥塞斯库于8月21日召开党中央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感情最激动的一次公开演说。这位在入侵发生前刚刚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书记告诉本国人民，他在捷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成为以社会主义名义或以任何名义入侵这个国家的理由，并且愤怒地谴责五国军队侵捷是“对欧洲和平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严重威胁”。

8月22日，齐奥塞斯库又召开了大国民议会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称：“结束业已产生的冲突的惟一途径是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并创造条件，使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能够不受任何外界干涉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

几天之后，齐奥塞斯库和铁托举行了会谈，针对苏联等国军队向罗马尼亚边境集结的迹象，研究了如果苏联真的下决心用武力压服罗马尼亚，罗、南两国将采取何种联合防御措施来对付入侵。随后，齐奥塞斯库向罗马尼亚人民和军队发出了团结一致、击退任何可能的外来干涉的号召和总动员令。

8月2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苏联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强权政治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

入侵发生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发表声明，指责用华沙条约的名义对捷侵略表明“华沙条约已从一个和平的条约变成一个侵略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条约”，并于9月13

日毅然正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意大利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入侵发生之时，陶里亚蒂的继承人、意共总书记路易·隆哥正在莫斯科。当他听完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拐弯抹角的解释之后，愤怒地收拾起行装，离开了莫斯科，并对侵略行径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英国、瑞士、比利时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共产党也对侵略加以谴责。法共这个大党此时正经受着战后最严重的党内危机。在以罗·加罗迪为首的进步派的强大压力下，法共中央也通过了一项谴责侵略的决议。

苏联一直希望把武装入侵装扮成一次众望所归的合法行动。但在入侵发生后的头两天里，苏共中央除了听到上述各国共产党的强烈谴责之外，只能举出一个袖珍小国——圣马力诺共产党对入侵行动公开表示支持。在此之后，苏共中央又不断地列出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对它的支持，例如莱索托、卢森堡、马里、美国、马提尼克和巴拿马等国的共产党。但明眼人却不难看出，这些组织或是仰仗着克里姆林宫提供活动经费，或是干脆流亡在莫斯科寄人篱下。因此，它们所表明的支持最多也只能视为滥竽充数。

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举，引起了美苏紧张关系的升级。尽管苏联事先已把侵捷的可能通知了美国，但美国政府还是作出了令莫斯科不快的反应。

1968年8月19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通知他说，苏联领导人已经接受了美国长期坚持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议。当天晚上，苏联提交了一封函件，建议预发一条这样的消息：“已经达成一项协议，

美国总统林登·贝·约翰逊将在1968年10月上旬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就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约翰逊立即召集会议，讨论了苏联的函信，并同意接受这些建议，计划在8月21日早晨发布新闻。

第二天，白宫新闻官员就约翰逊总统计划中的苏联之行，准备了一条要发布的新闻稿。但还未等到拟好后的新闻稿发到记者手中，8月20日深夜，多勃雷宁大使又匆匆赶到了白宫，说是要将苏联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令面交美国总统。

约翰逊见他神色紧张，为缓和气氛，主动同他谈起了在葛拉斯堡罗会谈时的往事。几分钟后，大使的表情再次严肃起来。

“现在，总统先生，”多勃雷宁说，“我从我国政府得到了一个紧急指令，告诉您一个严重的事件。我现在就宣读这个指令。”

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就下列事项当面通知约翰逊总统。鉴于国际国内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现存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根据该国宪法建立的国家政权的势力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局势，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请求各盟国，其中包括苏联，提供直接的援助，包括军事力量的援助。

我们确认，当前的事态将不会损害苏美关系，苏联政府一如既往地认为，发展这种关系有着巨大的重要性。

当天夜间，约翰逊与副总统汉弗莱、国务卿腊斯克、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惠勒将军等人再次坐到内阁会议桌边，就眼下发生的苏联五国的入侵事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会议

结论是，美国政府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目前还无事可做。但约翰逊指示腊斯克当晚召见多勃雷宁，通知他美国政府将不再发表关于总统访问苏联或举行技术性核谈判的公告。这就意味着柯西金最为关心的苏美两国关于军备控制的谈判、以及进一步削减部队的计划，已因入侵事件而中止。

之后，美国国会也作出强烈反应，决定暂时停止实施进一步削减部队的计划，转而要求欧洲盟国把国防预算增加 2.5% 到 15%，并且向盟国提出了加强防御力量的具体建议。美国政府还要求苏联及其盟国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他们的军队，并指出华沙条约盟国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美、英、法等国还将苏联出兵侵捷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

苏联等国的出兵行动，也使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骤然紧张起来。

总的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于入侵的发生感到突然，因为它们也像杜布切克分析的一样，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争取到了几个月延期动手的时间。在入侵的当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秘书长布罗西奥正在休假，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尼兹尔也远离盟军总部，跑到希腊的萨洛尼卡海湾去了。

8月21日清晨，另一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人物正在收拾行装，打算乘当天的渡船去英国。为了听听天气预报，他打开收音机收听了比利时广播电台的清晨广播。

天气预报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接下来的简明新闻却不对头了。比利时广播员说道：“布拉格的广播宣布，20日晚上23点，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

这位官员慌忙换上了军服，丢下旅行用的行李，驱车赶到了位于布鲁塞尔飞机场公路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

此刻，崭新的北约司令部大楼里，已经是灯火辉煌了。北约决策集团立即修改它的防务计划，并且拟就了在联邦德国靠近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地方驻扎更多军队的计划。

9月4日，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发表声明：由于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北约和华约共同均衡裁军问题受到严重影响，这不能不引起北约的严重关注；北约组织已开始全面彻底地估价事态发展对于盟国的防务政策、特别是力量态势所带来的影响。北约组织军事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苏侵捷后把作战部队普遍西移，使苏对西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该委员会敦促成员国整顿后备役，增加作战演习的规模和次数。9月14—16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北约军事力量的措施。

针对苏联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声称，联邦德国反动势力正构成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可能最后导致苏联行使干涉权，西方国家在9月份致苏联的照会中根本否认这种干涉权的存在。

9月27—28日，戴高乐总统访问联邦德国，同德国总理举行会谈。戴高乐在会谈中表示，如果苏联集团把冲突扩展到西欧，法国将支持联邦德国。

10月17日，西欧联盟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改善北约理事会、成员国、盟军最高司令和美国总统之间的通讯联络系统，以便就使用核武器问题迅速地交换意见和作出决定。

11月14—16日，北约组织部长理事会提前在布鲁塞尔召开年会。会议发表的公报指出：一个国家对于他国事务的任何干涉，都是非法的；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苏联的干涉已经威胁到东西方的缓和。公报还提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质量、效能和部署

均将予改进,以便提高在前沿防御的能力,在这方面已批准具体措施来增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常规作战能力。

北约组织的一系列备战行动使华约组织各国惊恐不安。华约组织一方面呼吁早日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讨论欧洲安全与和平合作问题;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军备,强调欧洲现有边界(包括民主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边界以及两个德国之间的边界)的不可侵犯性。1970年1月,苏联又宣布建立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

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矛盾愈演愈烈。苏联自60年代中期开始的谋求欧洲缓和的努力,由于侵捷事件而化为泡影。

如果说入侵行动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是预料之中的,那么它在苏联国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勃列日涅夫始料不及的。

1964年10月中旬,勃列日涅夫通过宫廷政变推翻了赫鲁晓夫,登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宝座。当1966年3月召开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时,曾有100多名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向他致贺。但8月入侵事件发生后,这100多名老布尔什维克中只有3个人,直到9月22日才表明支持态度,绝大多数则以沉默予以反对。

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在苏军入侵行动的第二天(1968年8月21日),在莫斯科红场上就发生了7名苏联知识分子参加的示威游行,抗议苏联政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要求还给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自由。其中的语言学家帕维尔·李维诺夫,正是列宁时代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外交部长马克辛·李维诺夫的孙子。苏联警察立刻逮捕了7名游行示威者,并判除他们以长期徒刑。帕维尔·李维诺夫被判除5年流放,

而流放地点恰恰是 60 年前沙皇流放他祖父的村子。

但是，苏联国内的麻烦却还远远没有结束。5 个月后的枪声，才真正让勃列日涅夫惊出了一身冷汗。

1969 年 1 月 22 日，正是莫斯科多雪的隆冬季节。

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上已聚满了欢迎者的人群。人们正准备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将从太空归来的 4 名苏联宇航员。为此，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率领一批党政官员也来到了机场出席欢迎仪式。在这些官员中包括前宇航员格奥尔基·别列戈沃伊少将。这位前苏联宇航英雄是一位漂亮的黑发男子。他那浓重的黑眉毛，使他远看起来酷似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

从苏联宇航基地飞来的银白色的伊柳辛-18 座机，平稳地降落在伏努科夫机场的跑道上。当 4 名字航员潇洒地踏上红地毯，大步走向检阅台时，军乐队奏响了“飞行员进行曲”。登上检阅台后，这次宇航飞行的负责人沙塔洛夫上校向勃列日涅夫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随后响亮地报告道：“总书记同志，任务已经完成！”

接下来便是例行的热烈拥抱和接吻、握手和简短的欢迎词。然后，大家一同经由机场贵宾候机大厅，登上数十辆等候着的吉尔牌和海鸥牌高级轿车，开始向克里姆林宫作 20 英里长的传统游行，并将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一次正式的招待会。

车队在夹道欢迎的人巷中疾驶而过。开在最前面的是 4 名字航员乘坐的轿车，而勃列日涅夫的座车则紧随其后，处于车队的第二号位置。眼前闪过的是无数挥舞着的红旗和一张张笑脸，传入耳膜的是狂热的欢呼声。

在克里姆林宫的周围也早已是人山人海。人群中一位年轻英俊的警察军官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

刚刚从列宁格勒卫戍部队驻地秘密赶到莫斯科的 21 岁的苏军中尉伊林。此刻穿在他身上的警察上尉的制服，则是从他的当警察的姐夫那里借来的。尽管他的衣袋里藏着两支压满了弹的手枪，但凭借着这身制服和自己的沉着，他居然顺利地通过了严密的层层警戒线，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鲍罗维茨基城楼的拱道里，静候着车队的到来。

从机场开出的车队驶抵莫斯科河时便停了下来。宇航员们离开他们乘坐的轿车后登上了一辆敞篷汽车，以便在从莫斯科石桥至克里姆林宫的路程中与欢迎人群见面。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领导人的汽车则离开了车队，疾驶入克里姆林宫。他们将在克里姆林宫的大会堂迎接英雄们的光临。

于是，随着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领导人专车的退出，别列戈沃伊少将等人乘坐的吉尔-111 型轿车，便紧随 4 名宇航员的敞篷汽车之后，处于整个车队的第二号位置。

当敞篷车在警察摩托车左右护卫下驶抵克里姆林宫时，它降低了速度，以便急转弯，然后爬上通过鲍罗维茨基大门的铺着鹅卵石的陡峭的斜坡。在敞篷车后大约 5 米远处，吉尔-111 型轿车跟了上来。透过霜气弥漫的车窗，可以隐约看到有波浪型黑发和浓密黑眉毛的别列戈沃伊。

当吉尔-111 型轿车刚刚驶到拱道时，伊林突然拔出双枪，连发 6 枪，打伤了一名摩托警察，重创了司机。汽车的防弹玻璃也被打碎了，碎片溅落在路旁人群的身上。但是还没等周围的人们反应过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便衣就已在刹那之间将伊林击昏，并把他拖走了。其速度之快，竟使得他来不及咬碎和吞下带在身上的剧毒的氰化物药丸。

刺杀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莫斯科乃至世界。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谁也不怀疑伊林的刺杀对象就

是勃列日涅夫。因为伊林根本不会去刺杀受人爱戴的前宇航员别列戈沃伊少将。对他开枪只是因为他长得酷似勃列日涅夫，而且他所乘坐的汽车又恰恰排在了车队的第二号位置上。

事发之后，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西方记者和外交官说，伊林是个疯子。但是，苏联法庭却不敢对这位年轻的军官开庭起诉，而是很快地就以“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由将他关进了一所“特种”精神病医院进行无限期的强迫治疗。这是当时苏联对待政治犯们的常用手法。

这个发生在列宁死后45年零1天、入侵布拉格后5个月零1天的刺杀事件向全世界表明：苏军武装入侵布拉格的野蛮行径，已经使得一些有正义感的苏联人也对自己党和政府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为此被迫转而采取暴力的手段。

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当年赫鲁晓夫同铁托一起走进莫斯科一家饮食店去吃冰淇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感到担忧了。为此，他搬到了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所住的大楼里，让两位公安官员一家在楼上、一家在楼下保卫着自己。

更令勃列日涅夫感到不安的是，刺客竟然是一名苏联军官。这使他想起了格列奇科对他谈起的一件往事。5个月前，当克里姆林宫在同捷共代表团缔结城下之盟的时候，捷共中央书记姆林纳日曾对格列奇科说过，他个人认为苏联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住下去，思想会被瓦解的。格列奇科当时曾神气十足地回答道：“那也可能，但没有关系。如果瓦解的话，可以换防。换10次都可以。”姆林纳日则不客气地继续问道：“换10次就够了吗？”

想到这里，勃列日涅夫额头不禁沁出了冷汗。这次军人行刺事件使得他对苏联军队充满了狐疑，感到武装干涉行动

对于苏军官兵思想的瓦解确实不可低估。他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并要严防军队发生哗变。于是，1969年的“五·一”劳动节例行的阅兵式被暂时取消，而庆祝活动中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的讲话，也为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所取代。

接下来便是对苏军将领的“大清洗”。自1969年4月22日到5月22日短短的一个月中，竟有18名苏联将军和1名上校死亡（4人“猝然”去世，3名“惨死”。6名死者不到60岁），其中包括马尔基安·波波夫和瓦连金·潘科夫斯基2名大将以及6名中将。

显然，勃列日涅夫无论是在对外政策还是在对内政策上，都在亦步亦趋地向老沙皇们靠拢着。但是，这些暴力不但没能解决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反而使内外矛盾更加激化。入侵之后的1969年，终于成为勃列日涅夫内外交困、处境最为困难的一年。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你可以用刺刀干任何事情，就是你不能坐在刺刀尖上而。勃列日涅夫此刻的感觉，也正像是把屁股坐到了刺刀尖上。

● “布拉格之春”的结局及其领导人的命运

获释回到布拉格的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改革派领导人，仍然想在苏军占领和莫斯科的强大政治压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并将捷改革继续下去。但在实际上，《莫斯科议定书》的签订以及他们对履行协定内容的保证，早已使得他们这一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入侵前曾是一名坚定改革派的切尔尼克总理，此刻正在

逐步地转向顺从克里姆林宫。在共和国最危机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斯沃博达，此时也已筋疲力尽、力不从心。而被克里姆林宫看中的胡萨克，则在一步一步地迈向捷共的最高权力机构。

1968年8月28日，在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声名狼藉的亲苏派领导人比拉克丢掉了第一书记的职务。代替他的则是早已觊觎着这一位置的胡萨克。当时人们还普遍把胡萨克看作是一个改革派，因为他曾在诺沃提尼统治时期坐过8年牢。而且在1968年1月，当杜布切克集团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敦促他们起来执行更迅速的改革政策的第一批人中间，就有胡萨克。

但是，克里姆林宫心里却很清楚，胡萨克是他们的人。苏联人正是想利用胡萨克的欺骗性来从内部夺取捷共领导权。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英德拉和比拉克等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克里姆林宫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他们采取了温火炖肉的烹调方法，不急不忙、经验十足地做着捷克斯洛伐克这道大菜。

9月1日，捷共中央委员会两天的会议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由21人组成的自由派主席团。除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姆林纳日和西蒙等老改革派之外，斯沃博达也被选为名誉委员。此外，符·卡布尔纳这位宣布十四大开幕的人以及杜布切克的朋友瓦·斯拉维克等人，也被选进了主席团。新选出的主席团中，只有比拉克、皮列尔等4名保守分子和另外4名中间分子。新的中央委员会也吸收了绝大部分第十四次秘密代表大会选出的进步分子，把中委人数扩大到了187人。

这是自 1968 年 1 月以来出现的第一个改革派占绝对优势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即使在“布拉格之春”时期，杜布切克及其同事们也未能做到这点。而现在，在苏联强大压力下，他们竟然创造出了这个奇迹，这不能不使得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感到惊讶不已。

然而，这不过是苏联人放长线钓大鱼的表面现象。中央委员会结束之后，《红色权利报》的一篇文章便第一次将胡萨克的名字，排在了杜布切克、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之后，并称其为“在最严峻考验时刻证明值得我们充分信任的”领导人之一。

随后，便是苏联人不声不响地索取代价了。首先，克里姆林宫恨之入骨的克里格尔离开了中央主席团。紧接着，9 月 3 日，继改革派内务部长去职之后，又是经济改革主要设计师希克副总理的“辞职”。齐萨士也不再是中央书记，转而去当主要是装饰门面的捷克议会主席去了。至此，《莫斯科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剔除名单中，只剩下外交部长哈耶克仍留在原位置上。但他正在国外，而掌管部里工作的则是亲苏的副部长普列斯科特。因此，莫斯科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着急。

9 月 6 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来到了布拉格。苏联派这位前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到布拉格来，显然是想通过这位谈判老手取代力不从心的契尔沃年科，来控制布拉格的局势。

库兹涅佐夫到达布拉格后立刻会见了斯沃博达总统，声明他的任务是来监督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正常化的”。与此同时，苏联军队的行动也变得更具有威胁性。在布拉格以东 7 英里处，100 多辆中型坦克排成一圈，似乎一旦有令即可立即行动。周围部队的榴弹炮和迫击炮口也依然指向这座城市，城

中街道上的装甲车在加速移动。这一切都是在提醒杜布切克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9月11日，切尔尼克总理在副总理和外贸部长的陪同下，飞往莫斯科进行了一天的访问。他在莫斯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布拉格的外国记者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切尔尼克是莫斯科选来进行一切重要谈判的官员，胡萨克则被指定监督国内政治事物。而这一切都被当作是孤立杜布切克的一个组成部分。

胡萨克和切尔尼克的工作显然使库兹涅佐夫感到满意，“正常化”终于有了进展。苏联撤军的第一阶段可以开始了。9月11日，即入侵后3个星期，苏联坦克离开布拉格开到乡间营地。自8月21日清晨以来，布拉格市民第一次看不见威胁人的坦克了。但是，步兵和装甲车却仍留在城内。

9月19日，哈耶克回到国内后的第10天，终于被迫辞去了外长的职务。更令克里姆林宫感到满意的是，新近担任党的法律委员会负责人入的姆林纳日也被迫承认，电台和电视台在入侵的日子里转入地下是“非法的”。

捷共中央主席团曾授权杜布切克于9月底访苏，就撤军问题同莫斯科重新开始谈判。但由于莫斯科派来的“总督”库兹涅佐夫不同意，这次访问就被取消了。接着，就由切尔尼克宣布，华沙条约国军队可能在几天内撤离，但“少量部队……将留在我们这里”。这似乎又在向人们证明切尔尼克的地位。

9月26日，苏联《真理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的文章。这篇由评论家谢·科瓦廖夫撰写的文章，一方面是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辩解，另一方面也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理论化。文章厚颜无耻地宣称：

必须着重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正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每个共产党不但要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用列宁的话来说，就犹如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不能摆脱社会一样，一个单个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处于由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大家庭的体系之中，它就不能脱离那个大家庭的共同利益。

为了履行他们对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和捍卫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成果，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坚决行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阻止外国对捷输出反革命，这就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真正主权，反对了那些想要剥夺它的主权、把国家奉送给帝国主义的人。

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臭名昭著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此正式诞生。

9月底，莫斯科出版了一本题为《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书。书中根据苏联记者收集和拼凑的内容，断定在捷国内存在着“反革命”。这本书很快以“苏联白皮书”闻名于世，并被译成了多种语言。

10月3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胡萨克飞往莫斯科。这次访问由于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否应是代表团成员的争论，而被推迟了。莫斯科方面则认定他是延迟“正常化”的罪人而拒绝接待他。这一谈判班子使得杜布切克成了孤家寡人。谈判的结果则是签署了一项责成布拉格实行新闻检查、以及进一步清洗进步分子的协议。在经过6周抵抗之后，杜布切克终于用这一明显的投降，换取到莫斯科愿意签订一项撤出占领军的协议。

杜布切克已将撤军视为当务之急，为此甚至不惜作出任何让步。这显然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作出的决定。10月11日，杜布切克在电视讲话中承认“自由化”纲领有缺点，任何破坏同社会主义大家庭联盟的事情都是有害的，任何破坏党的领导作用和任何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事情都是有害的。接着，他又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懂得了，不能忽视我们国内活动对“我们社会主义盟国”的影响，而无视“它们的意见和担心”是行不通的。

克里姆林宫对杜布切克的让步给予了报偿。10月14日，切尔尼克到莫斯科去同柯西金总理讨论驻军条约问题。两天以后，柯西金来到布拉格，签署了《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协定规定，大部分华约部队撤出捷境，但面对西德军国主义势力，为了“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一小部分苏联军队将长期留驻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界。这实际上是使苏军长期占领合法化。

从10月21日匈牙利部队首先撤离开始，到11月初，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部队以及大部分苏联部队都已撤出。但是，以加强捷西部防御为名而留驻的苏军，却分布在从西到东南形成的一条对角线上，把这个国家切成了两半。一位西

方武官在研究了苏军的分布后，评论说：“活见鬼，这是什么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免遭西方进攻！”

10月下旬的最后几天，捷国民议会在布拉格城堡庄严开会，准备通过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邦化法案，这是四月行动纲领提出的一项保证。

在议会开会期间，正好赶上10月28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布拉格全城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从早晨一直到深夜，大学生们和工人们手拿捷克斯洛伐克国旗，高喊着“俄国佬滚回去！”、“打倒“勃列日涅夫！”、“我们要自由！”等口号，在首都大街上举行了游行。而在瓦茨拉夫广场，愤怒的群众一边高喊着“俄国杀人凶手滚出布拉格！”，一边向身边驶过的苏联军车吐唾沫，扔石块。一些青年人还试图越过伏尔塔瓦河，冲到苏联大使馆去，但被警察设置的路障和消防车阻止。

紧随其后，又是11月6日的十月革命节纪念日。在俄国革命51周年前夕，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从布拉格许多建筑上撕下了苏联国旗。到11月7日，挂在政府建筑物上的苏联国旗，至少有10面被烧毁。这一天，捷警察第一次使用催泪弹来驱散示威者。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外交使团（除希腊和法国），也都在这天抵制了苏联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布拉格几天内连续出现的骚乱，实际上已为苏联部队被重新召回首都城内提供了借口，但是苏联“总督”库兹涅佐夫却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进一步挑起群众的激愤，并将危机无限期拖延下去。苏联人想通过政治解决，即利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来削弱杜布切克及其伙伴的力量。

11月14日，捷共中央全会开幕，尽管杜布切克在他的政

治报告中答应，党的新纲领应把“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同苏联军事存在的严峻现实调合起来，但是全会最后发表的决议却是充满了矛盾，并且斗争双方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随意加以解释。

十一月全会是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苏联人的精心策划下，这次全会通过设立一个由8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重新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杜布切克虽然仍担任执委会主席，但在这个新的最高机构中，他的真正盟友只剩下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个人了。执委会的真正权力实际上已经掌握在胡萨克、切尔尼克和斯特劳加尔三人手中。斯沃博达则精力越来越差。即使出现摊牌的局面，也不可能再指望他站出来支持杜布切克了。

1969年1月16日，一名年仅18岁的布拉格查理大学学生扬·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中心自焚。他在遗书中写道：他要以此来抗议苏联军事占领，而他只是一青年自杀小组的“火炬一号”。他们要震动全世界，让全世界都了解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发生的事情。

帕拉赫由于烧伤严重第二天死亡。几十万捷克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布拉格学生把查理大学哲学院对面的红军广场改名为帕拉赫广场。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殉死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不断出现，使世界目瞪口呆。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仍在用沉默表达着对军事占领的抗议，但这是火山爆发前的沉默。人民心中的怒火总要发泄出来，而苏联和胡萨克所需要的则是彻底换班的借口。

1969年3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在斯德哥尔摩世界冰球锦标赛上以四比三击败了苏联队。几百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电视前观看或在收音机前收听了这场比赛的实

况。冰球队的胜利是对苏联象征性的胜利和对 8 月入侵的报复。在布拉格、布尔诺、比尔森、布拉迪斯拉发等许多大城市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庆祝这一胜利。这一庆祝活动很快就变成了强烈的反苏骚动。

在布拉格，位于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民航办事处成了首要的攻击目标。示威者砸碎了它的霓虹灯，打碎了玻璃窗，冲进了办公室，把家具和文件拿到广场搞起了营火大会。有人爬到了圣瓦茨拉夫塑像上，把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插在上面。在国内其他地方，苏军司令部遭到了袭击，军车被烧毁。在冲突中有 65 名捷克斯洛伐克警察受伤。

克里姆林宫终于找到了下手的口实。3 月 31 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近日来的事件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右翼反社会主义势力又在使局势严重”。文章还攻击说，“参加反苏示威的人当中”有斯姆尔科夫斯基。

1969 年 4 月 1 日，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和外交部副部长谢苗诺夫来到布拉格。谢苗诺夫交给斯沃博达总统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并且口头警告说，如果捷政府不能维持和平，又不愿请求苏联帮助，苏军就要直接干涉，示威者将被坦克压碎。经过通宵会议之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了一份公报，批评报纸对待冰球骚动的态度，宣布了恢复平静的强硬措施。

4 月 17 日，中央委员会在布拉格举行。而在此之前，胡萨克已经使出了他的高招。他私下会见了包括改革派在内的主要中央委员，说服他们相信，由于杜布切克威信已降低到不能再有效地同莫斯科打交道的程度，因此业已变成了对党和国家不利的因素。为此，他希望中央委员会能够选出一位两派信任而又能为莫斯科接受的领导人。

于是，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上，杜布切克被迫“要求解除他的第一书记职务”，并“建议中央委员会选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斯塔·胡萨克博士担任这一职务”。胡萨克终于登上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宝座。

新的党中央主席团由 21 人减少到 11 人。新的领导人意识到，由于杜布切克声望仍然极高，他的离职可能会在国内引起新的骚动。为此，胡萨克和斯沃博达立即发表了电视讲话，号召人们在向被他们赶下台的杜布切克致敬时要保持平静。斯沃博达在讲话中甚至说道：“杜布切克同志的名字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中将永远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月全会以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胡萨克则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不准备放弃我们一月全会以后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我们一定要知道，该做什么和什么时候去做。”

杜布切克虽然仍被选进了中央主席团，但那不过是稳定局势的暂时之举，斯姆尔科夫斯基则被排挤出了中央主席团，担任联邦议会民族院的主席。

果然，在 1969 年 9 月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被解除了主席团委员的职务，斯姆尔科夫斯基则失去了议会中的职务。1970 年初，杜布切克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而斯姆尔科夫斯基、帕维尔、哈耶克以及其他数十名改革派领导人，则干脆被清除出党。在随后由胡萨克主持的所谓“正常化”进程中，计有 50 多万捷共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人数的 1/3；全国有 200 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占总人数的 1/7。

1969 年 12 月，杜布切克出任驻土耳其大使。当时苏联正要求将杜布切克以鼓励“反革命”罪加以审判，因此胡萨克希望杜布切克会利用这一机会，寻求在土耳其要求政治避难，然后呆在西方。这可能是胡萨克最希望的结果，他将为此而

失去一个最危险的政敌。但是，杜布切克这位有纪律的共产党员不仅没有叛逃，而且在土耳其居留期间，在公开场合也没有讲过一句不该讲的话。

诱骗不成，胡萨克只好再想办法。1970年1月，捷共宣布停止杜布切克的党籍，对其进行审查。此后不久，曾积极配合过苏联“正常化”的切尔尼克也被解除了总理职务，而去担任联邦技术委员会主席。

1970年5月25日，在捷共中央主席团的秘密会议上，以7比4的票数通过开除杜布切克党籍的决议。在6月24日召开的捷共中央委员会上，第一个动议就是要求正式解除杜布切克大使的职务。两天后，中央全会又讨论通过了将杜布切克开除出党和解除切尔尼克联邦技术委员会主席职务并停止党籍的决议。

到此为止，勃列日涅夫和胡萨克之流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被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严寒彻底摧残了。

● 苏军入侵埋下的祸根

“布拉格之春”遭到苏联东欧五国的军事镇压，是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悲剧，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苏联东欧五国的坦克不仅碾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而且，也碾碎了捷克和苏联东欧国家许多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20年后苏联东欧发生的强烈震荡和急剧变化，显然同这一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布拉格之春”的悲惨结局使得捷共心有余悸，在之后的

十余年间一直不敢再言改革。直到 80 年代初期，在东欧的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在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巨大压力下，才又开始进行一些局部调整。

在 1986 年 3 月举行的捷共十七大上，捷共中央确立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要深化社会主义民主，重新解释民主集中制，实行公开性原则，加强党内民主，劳动集体实行自治；注意发挥民族阵线和工会的作用；大规模精简政府机构，调整干部队伍，实行干部有限任期制；实行党政分开，党组织不能代替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等。

捷共十七大虽有不少进步，但饱尝过改革失败苦头的捷共对于改革却十分谨慎，既缺乏探索精神，在基本理论和经济模式上不敢有所突破，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仍然忌讳甚深，也未能真正确立企业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尤其是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对捷“正常化”领导人来说仍如刺在喉，只能继续称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事件。

总之，在“勃列日涅夫主义”和“布拉格之春”失败阴云的笼罩下，捷克斯洛伐克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愈发严重阻碍了国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76—1980 年的第 6 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均未完成；1981—1985 年的第 7 个五年计划，平均年增长仅为 2%。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就已进入世界工业强国之列，排名于各工业国第 10 位，但进入 80 年代后期，其工业实力竟已降至第 40 位，从而引起了捷国内人民的强烈不满。

进入 80 年代后期，曾百般压制过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尝试的苏共，终于为改革开出了绿灯。东欧各国再度掀起改革浪潮。但是，这时 1968 年事件的后果充分显现出来了。以胡萨

克为首的所谓“正常化”领导人不敢面对历史，为“布拉格之春”平反，而国内反共势力则利用 1968 年事件，打着为“布拉格之春”平反的旗号，大肆进行反对捷共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活动。20 年前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埋下的祸根，终于在 20 年后结出了资本主义在捷复辟的恶果。

1987 年以后，10 年前成立的“七七宪章派”等反对派加紧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在他们的煽动下，群众示威也愈演愈烈。1987 年 12 月 17 日，在捷共中央十七届七中全会上，胡萨克辞去捷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由雅克什接任。

1988 年 8 月 21 日，在苏联、东欧五国出兵捷克 20 周年之际，捷政治反对派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组织了 3 万群众的示威集会。他们叫喊“我们要民主、自由！”、“俄国人回家去！”、“杜布切克万岁！”、“雅克什下台”等口号。捷政府派出大批警察驱散游行集会，逮捕了 77 名示威者，第二天又逮捕了 15 人。

1988 年 10 月 28 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独立 70 周年纪念日之际，反对派再次组织群众示威游行集会，高呼“要杜布切克，不要雅克什！”的口号。政府派出大批军警，用警棍、催泪弹、高压水车、防暴装甲车驱赶示威者，逮捕 87 人。捷其他大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集会。

自 1989 年年初开始，欧洲爆发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这就是随着超级军事大国苏联的衰落而发生的东欧剧变。这场政治地震之强烈、影响之深远，恐怕只有本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与之相比。

东欧剧变的风暴首先于 1989 年 1 月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刮起，随后便波及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政局的动荡也是以对历史事件平反为发端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每年的1月16日，即帕拉赫自焚抗议的那一天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日子。此后，每逢此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到这个大学生的墓前祭扫致哀。1989年1月16日，这种纪念活动照例进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恰恰赶上帕拉赫自焚20周年。“七七宪章派”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于苏联军事入侵的仇恨，很快将这一活动演变为一场公开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游行示威者高喊着“要人权”、“要自由”的口号，并将示威活动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七七宪章派”所利用的，正是广大人民对捷共领导人长期高压政策的不满，因此当捷政府出动警察和警车驱散游行队伍、逮捕包括“七七宪章派”领导人哈维尔在内的几百名示威者后，群众的反抗情绪不但没被压下去，反而愈加高涨起来。

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又有许多人走上街头游行，要求保障人权和释放哈维尔。6月9日，“七七宪章派”联合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发表了题为《几句话》的呼吁书。呼吁书明确提出为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平反、给反对派组织以合法地位等要求。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人数达2万之多。

到了8月21日，即苏军人侵21周年之时，又有数千人在瓦茨拉夫广场举行抗议入侵集会。一些波兰和匈牙利以及意大利的有关组织也派人来捷声援。示威游行者与警察再次发生冲突，并被警察驱散。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纪念日时，反对派再次组织近万人的游行示威。示威者公开反对捷共，并要求更换现联邦政权。当局派警察拘捕数百人。捷政局发展到了决定性时刻。

半个多月之后，又迎来了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反对德国法西斯暴行遭镇压的纪念日，布拉格大学生举行的纪念集会再一次演变成了一场有三四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矛头直指捷共当局，要求捷共领导人下台和取消一党专政。示威活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参加者也由学生扩展到工人、农民和市民。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性示威浪潮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开始分化。捷共中央于11月24日召开非常全会，讨论国内形势。面对严峻的政治动乱局面，捷共中央总书记雅克什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也以缓和紧张局势为借口，宣布集体辞职。之后，原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乌尔班内克宣布，要在民族阵线（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各政党和群众团体联合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基础上，建立赞成社会主义的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的广泛的政治联合。这标志着捷共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开始显露出妥协的意向。

11月26日，捷政府与已被释放的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组织（1989年11月19日成立），就如何解决动荡的时局问题举行会谈，最后达成协议：现政府在12月3日前实行改组，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实行自由选举，恢复多党制。

11月29日，捷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原宪法第四条中关于捷共在社会和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内容。两天之后（11月30日）举行的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捷共宣布放弃领导权，承认捷共已失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地位，声称要作为捷社会中的政党之一，同其他政党平等竞争。

1989年12月1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公布了“行动纲领”草案，重新评价了1968年事件。纲领草案指出，苏联等华约

五国 1968 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捷共已对 1968 年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对 1970 年捷共中央通过的否定“布拉格之春”的“正常化”纲领《从捷共十三大后党内和社会危机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持否定态度。

接着，捷共中央总书记乌尔班内克宣布，将为那些因 1968 年事件遭受打击迫害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后来，捷共非常代表大会正式撤销了“正常化”纲领和 1968—1969 年间党的各级组织所作的有关决议，广大因“正常化”受到迫害的捷共党员得以平反，重新回到了捷共队伍中来。

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在 1989 年 12 月 3 日就 1968 年事件发表声明。声明指责苏联和东欧五国 1968 年进兵捷克斯洛伐克破坏了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准则，要求通过外交途径谈判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条约问题。

第二天，即 12 月 4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称：“1968 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围绕客观上已成熟的任务的内部争论中，接受了一方的立场。而为这种不平衡的、不适当的立场和对一个友好国家事务的干涉进行辩解的理由是，当时东西方存在着尖锐的对抗。”声明承认：“我们赞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观点，即 1968 年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没有理由的，从现在众所周知的全部事实来看，关于出兵的决定是错误的。”

同日，正在莫斯科会晤的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五国的领导人宣布，华沙条约国的军队“1968 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内政的干涉，应当受到谴责”。

12 月 20 日，捷苏两国外长签署了关于苏联从捷克斯洛

伐克撤军的协定，规定 1991 年 7 月 1 日前分三个阶段将苏联军队全部撤离捷克斯洛伐克。

重新评价 1968 年事件应当属历史性的进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本应沿着当年被苏军入侵而中断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继续前进。但由于长期以来，胡萨克、雅克什等捷共领导人拒绝顺应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顽固坚持“布拉格之春”是反革命事件、苏联等国出兵是“国际主义援助”的错误立场，而且他们这样干的时候又是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帜，这就从根本上败坏了捷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于是，当对这个事件重新作出公正评价的时候，捷共和捷人民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反对派势力借此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迫使共产党交出政权。

12 月 3 日，捷政府实行改组。政府总理阿达麦茨曾想以吸收五名非捷共人士进政府的方式实行改组，但遭公民论坛反对。公民论坛再次通过组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对政府施加压力。7 日，阿达麦茨宣布辞职，由原政府副总理恰尔法出面组阁。在新政府中，非捷共人士比捷共人士多一名。之后，恰尔法总理宣布退出捷共，另有一些捷共政府部长或退党或被撤换。

1990 年 6 月 8—9 日，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自 1948 年以来的首次多党选举。结果，公民论坛及其斯洛伐克盟友“公众反对暴力组织”获胜，赢得了联邦议会两院中 170 个席位，共产党仅获得 47 个席位，并被排挤出内阁。

1989 年捷政局发生剧变后，杜布切克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11 月 24 日，他在布拉格出席群众集会。这是他 20 年来首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过，杜



布切克已不再代表共产党了。12月28日，捷议会选举“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为联邦议会主席。第二天，联邦议会选举哈维尔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经过更换总统、改选议会主席、改组政府这样几个大动作之后，捷共彻底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也已江山易手，政权换主了。

1990年3月29日，联邦议会决定更改国名，将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改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干脆去掉了社会主义的字样。之后，由于斯洛伐克民族的不满，又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2年9月1日，身为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杜布切克，因意外车祸被撞成重伤。11月17日，即71岁生日的前10天，杜布切克撒手人间。

1993年1月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苏军坦克不仅无情碾碎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碾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而且，也是葬送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祸根。恰好也是23年后，苏联以及以它为家长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包括华沙条约组织，也相继解体。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为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有限主权论”、“干涉合法论”、“侵略有理论”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下了结论。